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2024年1月

第1期

卷2

VOL. 2

NO.1

JAN. 2024

JOURNAL

OF

DEMOCRACY

是什么使得中国民主转型特别困难

裴敏欣 / 王天成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性宿命

王飞凌 / 秦中音

中国经济困境：原因、出路与政治意蕴

罗谷 文贯中 史桔 夏明
盖思德 李少民 乔山

民主的中国化与中国的民主化（上）

张崑

非暴力抗争的未来

艾瑞卡·切诺维斯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主编 Chief Editor

王天成 Wang Tiancheng

副主编 Deputy Editor

滕彪 Teng Biao

运营协调 Operational Coordinator

芮朝怀 Rui Zhaohuai

编辑 Associate Editors

张杰 Zhang Jie

余浩风 Yu Haofeng

技术、发行总监 Tech & Promotion Director

杨子立 Yang Zili

主办、出版 Organization & Publisher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电邮 Email: cjd@chinademocrats.org

网址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

电子版刊号 ISBN (electronic): 979-8-9875925-0-2

印刷版刊号 ISBN (print): 979-8-9875925-2-6

2023 本刊版权属于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2023 by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国际顾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戴雅门 Larry Diamond	文贯中 Guanzhong James Wen
陈健民 Kinman Chan	盖思德 Roger Garside	吴国光 Guoguang Wu
陈奎德 Kuide Chen	胡平 Ping Hu	吴介民 Wu Jieh-min
陈志柔 Chih-Jou Jay Chen	许田波 Victoria Hui	许成钢 Chenggang Xu
郭丹青 Donald Clarke	林培瑞 Perry Link	杨凤岗 Fenggang Yang
孔杰荣 Jerome Cohen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戴大为 Michael Davis	王飞凌 Feiling Wang	

国际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阿古智子 Tomoko Ako	廖雨诗 Yushih Liao	楚克斯 Rory Truex
蔡霞 Xia Cai	李酉潭 Yeau-tarn Lee	曾建元 Chien-Yuan Tseng
陈杰 Jie Chen	李玲 Ling Li	王兴中 Hsing-Chung Wang
陈育国 Yuguo Chen	罗世宏 Shih-hung Lo	吴玉婷 Andrea Worden
程映虹 Yinghong Cheng	艾华 Eva Pils	吴强 Qiang Wu
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任思梅 Johanna Ransmeier	许秀中 Vicky Xu
柯蕾 Chloe Froissart	石小琳 Katrin Kinzelbach	叶耀元 Yao-Yuan Yeh
郝志东 Zhidong Hao	古思亭 Kristin Shi-Kupfer	张崑 Kun Zhang
郭汤姆 Thomas Kellogg	艾美丽·庞 Amelia Pang	赵荔 Li Zhao
卓玛加 Dolma Kyab	贡嘎扎西 Kunga Tashi	

目录

访谈

8 · 是什么使得中国民主转型特别困难

裴敏欣 / 王天成

28 ·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陈健民 / 滕彪

48 ·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性宿命

王飞凌 / 秦中音

笔谈

72 · 中国经济困境：原因、出路与政治意蕴

罗谷 文贯中 史桔 夏明 盖思德 李少民 乔山

当代问题

88 · 民主的中国化与中国的民主化（上）

张崑

110 ·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

王柯

130 · 教会的抗争：基督教会与韩国民主转型

张彦华

公民抵抗

144 · 非暴力抗争的未来

艾瑞卡·切诺维斯 文

言晓义 译

制度设计

166 · 当今的选举制度：全球一览

理查德·W·苏德里埃特 安德鲁·埃利斯 文

徐行健 译 王天成 审校

读书

182 · 从思想到制度：陈奎德《自由中国谱系》

夏明

商榷

192 · 国家主义还是党国主义

海山

简记

202 · 全球民主人权事件

弥正平

212 ·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213 ·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 **致谢：**吴海波为本期所有画作作者

Contents

INTERVIEWS

- 8. What Makes it Particularly Hard for China to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Minxin Pei / Tiancheng Wang

- 28. Chinese Civil Socie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Kin-man Chan / Teng Biao

- 48. The Institutional Fate of the CCP
Wang Feiling / Qin Zhongyin

CONVERSATION

- 72. China's Worsening Economy: Causes, Ways Out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Dexter Roberts, Wen Guanzhong, Shi Jie, Xia Ming, Roger Garside, Li Shaomin, Qiao Shan

POLITICS AND SOCIETY

- 88. The Chineseiza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Part 1)
Zhang Kun

- 110. The Carriers of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Han Chinese Society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Wang Ke

- 130. The Church's Resistanc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South Kore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Zhang Yanhua

- 144. CIVIL RESISTANCE
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Erica Chenoweth, Yan Xiaoyi(trans.)

INSTITUTIONAL DESIGN

166. Electoral Systems Today: A Global Snapshot
Richard W. Soudriette , Andrew Ellis
Xu Xingjian and Wang Tiancheng(trans.)

BOOKS

182. From Ideology to Institution: Chen Kuide's A Genealogy of Free China
Xia Ming

192. INTERACTION

- Statism or Party-statism?
Hai Shan

202. NOTES

-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vents
Mi Zhengping

212. Call for Submissions

213. How to Subscribe

© All paintings in this issue are by Wu Haibo

访谈

裴敏欣 / 王天成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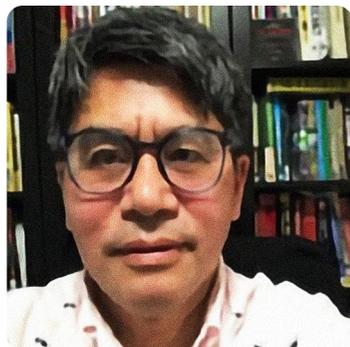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是什么使得 中国民主转型 特别困难



裴敏欣



王天成

编按：为什么中国不同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民主化？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是新毛泽东主义还是新斯大林主义？中国经济一度的高速增长是专制体制“制度优势”的体现吗？中国的极权统治是否能免于苏联极权体制最终覆灭的命运？为什么对于共产党政权监视控制社会而言，人力资源比高科技更重要？中国民主化会乱吗？《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华裔政治学家、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

王：裴敏欣教授，非常感谢你接受这个专访。我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爱国者。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所以希望她自由、民主、有持久的繁荣。

这个访谈所提的问题，大部分基于你近些年的部分著述和中国最近的情况变化。您近些年的著述包括你2020年所做的、第17届“塞缪尔·马丁·李普塞特演讲”（Seymour Martin Lipset Lecture）。你很快要出版一本新书，叫《监控国家：监视与中国专制的存续》，也请你分享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应邀做李普塞特演讲是杰出成就的体现，是作为政治学者很高的荣誉。祝

贺你，虽然祝贺有些晚。

裴：谢谢。

王：我们先从你所说的“中国之谜”（China Puzzle）开始，它涉及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在《中国民主季刊》上一期中，我与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的对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角度并不完全相同。

为什么中国不同于许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与民主化？是什么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

裴：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政治科学有关民主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花了很大精力来来探讨这一难题。我个人的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中国共产党体制本身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许多民主化转型发生在专权或者说威权体制统治的国家。威权体制其实包括相当多的政权体，有军人政权、一党专制和个人专制的政权。但是共产党政权跟它们不一样，是极权体制，就是所谓totalitarianism。

如果极权体制本身没有倒台，它自我改造变成民主政权，这种例子至今是没有的。除非被革命推翻，例如前苏联，极权体制没有通过改革而转变成民主政体的例子。当然，前苏联比较复杂一点，一开始是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改良来促成政权的转型，但是他的尝试失败了，最终苏共是被革命推翻了。一个国家要出现民主政权，如果它是极权体制，没有例外最终是通过革命把前政权推翻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极权体制下，经济可能发展到了所谓“转型的临界点”（一般都是年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中国现在是1万多美元，用购买力平价来算已经差不多快2万美金了），但你却看不到李普赛特以前看到的、所谓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权的相关性？你看前苏联、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它们转型之前人均收入早就在五六千美元以上了，也就是肯定超过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转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为什么极权体制统治下的国家，它要向民主转型是那么困难？有许多政治学家并不认为极权体制是一个很独特的专制体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怎么一回事。他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不像我们都是在那种国家生活过的人，知道威权跟极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威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深度、规模远远不如极权。极权体制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当中的，从而对个人一切行为控制的严密程度、范围，远远是威权体制没法比的。

在这种体制下，你要靠渐进，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良来进行民主转型，难度很大，因为它对社会控制强。这种体制对信息的控制也很强。你要把中国跟一般的国家，比如说跟埃及等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根本就没法比。人家有教会、有宗教自由，社会中有相对的空间是政府、国家控制不到的；和极权体制相比，威权体制统治下的社会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教育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如果说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程度，像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控制程度，中国民主转型就会容易很多。

另外一个层面，是领导人。从这个层面看，1989以前、1980年代，中国是有希望的。因为要搞民主转型，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结构条件，就是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另外一个就是政治精英条件，即政治精英必须要有意愿进行民主改革。如果政治精英没有民主改革的意愿，结果肯定是会出现革命转型，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在中国1980年代，虽然国内自由派力量不大，但是毕竟共产党党内有自由派声音，有一部分人像赵紫阳，是有意把中国先往威权方向改良，然后最终朝民主方向的发展。但1989年之后，共产党内根本就没有这类的人。1989之后的共产党政权里没有任何有地位的政治精英有意愿进行民主改革。一方面是极权主义的体制基因，或者说体制因素，另一方面缺少改革派。这两个条件下，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再怎么快，也不可能出现在政治改革、民主改革方向的突破。

王：中国的极权主义到现在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是毛时代的极权主义，而毛死后的后极权主义，也就是胡安·林茨(Juan Linz)所说的“封冻的极权主义”，然后就是现在的习近平新极权主义。

为什么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更准确地说是新斯大林主义，而不是毛时代、文革式极权主义的某种新翻版？为什么在所谓“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它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轻易地崛起了？

裴：许多人把习看成毛泽东的2.0版，是不对的。他有些方面很像毛，个人崇拜、终身制、一言堂、个人专制，绝对是毛的翻版，就是说2.0。但是习政权跟毛政权还是有根本差别。

一是习依靠官僚机制。习的政权、统治基础，是共产党庞大的官僚机制。毛泽东对官僚机制恨之入骨，因为官僚机制处处给他设置障碍，不让他胡

作非为。习是通过官僚机制来统治，毛有时会通过官僚机制，但同时又把官僚机制当成是自己的敌人。毛最喜欢的还是群众运动，习最不喜欢的是群众运动。习上台10多年来，从来没搞过群众运动。他完全是通过国家机器的运作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毛到统治后期，最主要的还是通过群众运动，文革就是这样。大跃进也是一半群众运动，一半国家机器。毛不怕乱，甚至认为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习很怕乱。

王：毛一度搞所谓“砸烂公检法”，习相反，严重地依赖于警察、法庭。

裴：对。所以，习近平的做法跟斯大林更像，因为斯大林从来不搞群众运动。他在苏联的恐怖暴政，最严重的是1930年代，不搞群众运动，完全靠秘密警察，靠那种所谓法庭的形式，英文叫show trial（展览性审判），来把自己的政敌搞掉。习的手段跟斯大林更像。他跟毛有像的地方，但从采用的手段上说，和毛有本质上的差别。

王：群众运动对于习是危险的。

裴：对。他怕失控，毛不怕失控。毛毕竟是乱世出生的。习虽然也经历过文革乱世，但是他对乱世的理解跟毛完全不一样。

王：那么，为什么在毛死后这么多年之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没有什么障碍就轻易崛起了？

裴：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毛泽东后、习之前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触动极权主义制度的根基。

极权主义的核心是对国家机器，特别是专政机器的完全控制。极权党内缺乏制衡机制，即没有所谓“党内民主”。所以，没有任何体制内约束最高统治者的机制。同时又缺乏社会上对执政党的平衡或者制约的机制。所谓“改革开放”，经济上改变最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层面，党通过国家对经济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比如说，金融体系是党控制的，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其他许多主要行业，电信、能源、交通，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它也可以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

如果给经典的极权主义列一个单子，再看改革开放的30年，对这些极权主义的体制基本特征有什么重大改变？几乎没有。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只是改了皮毛，没有触及极权制度的根本。这样，那个极权制度要回来很容易，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改变。

我有一个比喻，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把中国极权主义那架机器的电源给切断了。虽然开关没开，但是那个机器是完好的。所以，习上来了，只要把电源开关打开，那台机器就照样运转。

所以，全面倒退马上就出现了。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意识形态的控制，党内一言堂，个人崇拜，终身制，一下子完全又回来了。根本就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就可以让极权体制复辟。

王：用你在李普塞特演讲里面的话说，这是“极权主义的制度遗产”。这些遗产他们都继承下来了，就是他们的资产，可以随时用起来。

裴：对。所以，实际上，对共产党改革本身的目的，我们不要抱任何幻

想。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改革是保证共产党能够长久执政。改革是手段，一党制的长治久安是目的。如果改革是这样的目的，就不可能改变共产党的制度基础。

王：如何解释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顺利崛起，是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解释中国数十年——主要是1990年代到2012年前后——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它不是一党专制的“制度优势”的体现？

近年来中国经济越来越显示它失去了活力、遇到了麻烦，现在整个社会陷入焦虑、对前景没有信心。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多大程度上负有责任？

裴：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也就是“江湖”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20年。这20年当中，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飞猛进、达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有一系列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

在国内层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他的讲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1991年的苏联垮台。1990年代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宗旨，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共产党全心全力都集中在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一个政治任务，经济发展压倒一切。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的机制，只要从上而下动员，只要目标明确，官员就会干这个事情，就会就招商引资。

1990年代，共产党的确是打破了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约束。1993年共产

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决议，就是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路线图给勾画展示出来。

1990年代，共产党的确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说，财政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同时又想建立的一个比以前更有效的一个资本市场、金融体系。1990年代末，让大批的无效的、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倒闭。这一系列改革，的确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

所以，从改革层面看，从政治精英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

再就是国际层面。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孤立中国，而是企图通过把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来慢慢改变中国。这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外部条件。

即使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后，一开始中美关系很紧张，但是，“911”之后，由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失误，又给中国创造了许多空间。所以，20年当中，中国的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相当有利。

中国在1992年的时候，它的对外贸易只有160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20年当中，它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变化。

还有是经济层面。这20年当中，中国发展最有利的因素，在于劳动力充足又便宜，同时，又有很高的储蓄率，再加上外资大量的投入。这20年当中，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都是高质量的投资。所以，中国在这

20年当中全球化、技术引进和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在经济层面，经济因素远远大于所谓一党专制的体制本身的优越性。一党体制本身的优越性很难从数据里看出来，你没法去计算这个东西。但是，储蓄率，生产效率的提高，人口红利，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城市转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是可以从数据里看得出来的。

王：所以，实际上，一党专制这种体制本身，它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系不大。经济发展更多地与政治精英、领导人的政策选择有关，还有国际上对华政策的机遇，以及劳动力供应等。

裴：对。所以，为什么经济现在开始下滑了，也可以看三个方面。从政治精英、决策角度来讲，习上来后没搞改革。一开始，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了60条改革。但是，改革的那一部分一条都没做到，倒退的那一部分全做到了。你仔细去看那个决议，一半是改革的，一半是倒退的，也就是加强党的统治那些内容。他重新讲政治了，不讲经济了，从政策取向讲，是跟1992年之后共产党的基本国策完全相违背的。

它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投资者、民营企业家们对中国的政治是很敏感的。李嘉诚可能是最敏感的。他是什么时候撤资的？2013年。他比人家都跑得早，看出来新领导跟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民间、民营企业家。从许多政策层面来讲，习近平不仅没搞改革，他还要把无效的国企做大做强做优，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国际关系层面，跟中国最需要的西方贸易伙伴地缘政治关系搞那么僵，对

俄罗斯的关系搞那么好。很明显，中国的外部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到一个不利于甚至是有损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在经济层面，也有一些因素。一直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其实习上来后这段时间当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是政策失误。在胡锦涛后期，中国的经济政策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让房地产泡沫大得不可收拾，越吹越大。

习以来的10年左右，他也没有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改进措施。中国经济的总体债务率，在习时代涨了大概是GDP的100%左右。最主要的是中国以前大量举债造房地产，造基础设施，现在来看，这些投资许多是无效投资，但这些债是要还的，这就出现了债务危机，出现房地产泡沫，是对最近经济影响最大的负面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人们没有信心。这很简单，因为民间投资者一看现在这个领导在位是遥遥无期的，以前是每10年一换，现在看不到任何换领导的可能性，所以就失去信心了。

另外，地缘政治关系恶化造成脱钩，造成了技术限制。中国融入世界，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人家不跟你融合在一起，要跟你脱钩，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又成了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大家对经济那么悲观，完全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跟经济本身的因素有关。

王：你刚才提到，习近平想做的倒退都做到了，从这个角度，其实也可以

看到体制的劣势，对吧？如果它是一个民主的体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国家进行了那么长时间的改革，社会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他想倒退就倒退，这其实是制度的劣势。

裴：是。你很难看到这种体制纠错。民主并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自我纠正，但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民主体制有能力自我纠错，而且许多情况下，的确是自我纠错了。中国共产党体制不是这样，总是犯了巨大的错误，然后才可能把错误改正。而且错误改正基本上都是要等犯错误的领导人不在位以后。如果他还在那个位上，没人敢改正错误。这就是制度的劣势，而并不是制度的优势所在。

王：你在文章著述中多次提到极权统治，它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毁坏机制。为什么极权政体尽管可以抵制、延缓民主化，但是它有一种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将难以为继，就像前苏联的极权主义？

裴：对。我刚才讲它缺乏自我纠错机制。而且，它往往是错上加错。极权主义又有很大的个人统治色彩。经典的极权主义，都是跟一个强人统治联系在一起。强人统治之下，整个国家机器完全是依照一个人的意愿来运作的，这样犯错误的可能就大得不得了。在这种机制当中，又没有任何可靠的力量来制约强人的行为。这就使得犯错误的概率更大了，而且犯错误之后又没法得到纠正。

这种机制，它有几个特征，其中之一，是劣币驱逐良币。一般的威权政治都有这么一个内在机制，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往往更坏的人会替代坏的人。坏人把好人赶走，然后更坏的人把坏人再赶走。又无能又坏。所以，

等到极权主义后期，统治精英一塌糊涂，既没本事心又坏。不可能有好的政策出来，更不可能干好事。这是极权主义会有自我毁灭的这种特征的一个原因。习近平2012年12月视察广东时谈起苏共垮台时，批评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他的话没错。的确1991年的苏共内没有“男儿”，即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和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人。可是习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他认为是缺乏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一个威权体制或一个极权体制，统治时间越长，这一问题越严重，政权溃败越无药可医。除非中国共产党能发现根治逆向淘汰的妙药，否则它很难避免苏共的结局。当然，具体是什么时间无法预测。

王：现在我们谈谈你即将出版的新书《监控国家：监视与中国专制的存续》的主要观点。我看了你在网站上列举的、这本书的部分第一手资料。这是经年累月研究的成果，祝贺。

为什么中国专制统治的维持更多依赖于列宁式监视国家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人脸识别、人工智能、GPS跟踪等新监控技术？

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整套监控体系的报道认为它靠的就是现代技术。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技术监控后面的那一套组织体系的人很少。这就是我写这书的基本动机。中国的监控体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的，知道中国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候，它的监控体系也是十分有效的，覆盖面是很广的，它肯定不是纯粹依靠技术。

我有下面几个基本观察。第一，中国的监控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威权国家也好、极权国家也好——最为有效的。所有的威权国家、极

权国家，都是依靠镇压、依靠暴力来维持政权，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是，光靠硬暴力维持政权，代价是很高的，所以要靠软暴力。所谓“软暴力”就是监控。成功的专制国家，不是成天在大街上杀人，或把许多人关进监狱，因为这种成本它付不起。维持统治都是靠监控。但是有效监控很困难。为什么？监控国家是一个政治上、技术上、经济上很复杂的工程。

举个简单例子，你让谁去监控？是造一个巨大的特务组织来监控，还是用其他的替代办法？中国跟前苏联、东德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和克格勃同样、同等的特务机构。中国对外搞间谍活动跟对内搞监控，是两个不同的官僚体制，苏联的克格勃这两件事情都做。中国的体制其实跟美国更像，美国 CIA是搞对外间谍活动的，FBI是在国内反间谍的。中国为什么采取了美国的体制，而并不是采取了苏联体制，这就很有意思。

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千万不能让一个巨大的、权力很大的秘密警察系统对共产党本身造成威胁，所以就采取了一个民主国家的体制，这就是监控国家体系的政治设计。共产党是很聪明的，既要自保，又不能让自己的生存威胁，这是一个制度设计。

那么，在操作层面，因为在中国监控的体系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部门，有执法部门，有一般的部门，国家的工厂、街道、学校。怎么来协调这些不同的部门？只有共产党有办法，因为共产党在任何部门里面都有党组织。但是中国共产党比前东欧和苏联做得更好。它有一个特别的党务官僚机构，就是政法委。我查了一下，前苏联没有什么政法委。政法委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之前就有，但是比较空的一个机构，人数很少。1989年之后，共产党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强化政法委。所以，中国的政法委

在监控体系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协调作用。

第三，从组织层面讲，就是监控很费钱，你要有多少秘密警察？我看了一下东德，它一直被认为是监控搞得最好的一个国家，有差不多9万多的秘密警察。你可以算，一半是在外面搞间谍，一半是在国内监控。根据东德的人口比例，中国秘密警察就得有400万。中国现在穿警服的警察，他们叫“干警”，才200万。你养不起这么多的警察，因为一般的专制国家都是穷国家或者中等收入国家，没钱雇那么多的警察。所以一般的专制国家，都要通过发展许多线人或告密者搞监控。发展告密者不是那么容易，靠谁去发展？当然，警察可以去发展，但中国本身警察就比较少，怎么去发展那么多的告密者？

中国有列宁主义政党，它每个部门——从街道到学校——都有党的存在，通过党来发展告密者。所以，中国有许许多多叫“信息员”的人，大概信息员就有1000多万。通过我对地方材料的研究，那是不得了数字，是中国有警察加起来的5倍。这一切全是由于列宁主义政党本身的组织优势。你说中国政治体制没什么优势，我说它唯一的优势或是少数优势之一，就是组织一个监控国家，通过比较低的成本组织一个很大的网络，基本上是劳动力强度十分高的一个网络。

我举一个例子，有人说中国是靠人脸识别，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中国叫“敏感时期”，政府最善用的一个办法是人盯人，叫“5盯1”，5个人盯一个重点人员，上访的或者是民运分子。一个警察、单位干部、里弄干部，又把你的家人也搭上，然后旁边又找一个线人。5盯1，你想，劳动力成本、投入是很很大的。这是中国一个基本的架构，一个以组织为基础的架构。

当然，它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它运用科技，的确在科技方面投入，中国政府不惜工本，所以它现在的监控能力是比以前要强很多。

王：我到美国来之前，曾在北京一个别墅区租过房间，我那栋楼斜对面经常会有一个岗哨，是小区保安，看我的。保安是公司开支的，不是政府开支的，但是他们受公安的领导，接受公安的指令报告情况、做跟踪这些事情。

裴：我书里面分析了地方材料，有许多给政权做事的人，政府不用给钱的，比如说，是它用得最多的、做线人的是物业管理人员，物业管理就是帮你看小区的人，他们的工资都是物业支付的。

王：最后，我们讨论过去几十年中横亘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问题。中国民主化是否会乱？如何界定“乱”？如果民主转型发生，是否有可能、如何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中国民主季刊》上一期笔谈的主题。

裴：所谓“乱”，从学术角度讲，“乱”一般不会出现在一个自上而下渐进的、有序的转型过程中。像台湾、墨西哥、西班牙、巴西和南韩的转型就没“乱”。转型如是通过政权自我垮台或是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推翻专制政权，“乱”的概率就会很大。所以，一般来讲，自上而下（改革转型）比较有序。通过反对力量和执政力量之间谈判达成的转型，都比较稳定，不太会出现乱。据我的观察，这种情况出现乱的很少，几乎没有。但是，如果是通过群众运动、革命推翻，甚至执政精英导致政权自我垮台，这种情况下乱的可能就大多了。

就中国未来的转型来说，现在就断定民主化一定会导致“乱”没有理论和

事实根据。转型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乱或不乱。通过改良的转型模式，乱的可能就低；通过革命的模式，乱的可能就高。那么，革命模式为何更有可能乱？越是精英不想改革，危机成分越来越多，到最终精英丧失了自己的合法性，这时候，革命的可能性就高很多。就是说，由于革命转型导致所谓乱，这并不是民主转型本身的问题，而是专制执政精英拒绝改革而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这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转型模式跟乱之间的关系要理清。再有，为什么革命会取代改良，成为转型模式？这个原因大家要弄清楚。

并不是所有革命都会造成乱。如果你说出现革命性转型就会乱，要想一想东欧的政权转型基本上都是革命性的，前政权被推翻了。转型之后，前政权在国家里面被清洗出场，但是并没有出现我们所谓的“乱”。“乱”怎么定义？一个是大乱，一个小乱；一个是暂时乱，一个是长期乱。小乱不可避免，比如出现通货膨胀，犯罪率暂时上升，甚至出现未遂政变。大乱是国家崩溃，国家机器不复存在。

对共产党这种党国机制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列宁主义这种党国极权体系，党是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出现革命性转型时，党往往是第一个被推翻，共产党被迫下台。

这时候，人们最担心国家机器是否会被会继续运行。这一担心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必要。没有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垮台而直接导致国家垮台。转型短期内会导致国家能力削弱。因为以前是完全由党来协调控制，党倒了国家机器当中的协调能力就差很多，就是内部的治理能力会差很

多。但是，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转型导致国家崩溃，即共产党没了，然后就像清朝垮台的时候一样，国家也没了。

国家垮台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像清朝1911年之后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国家，不仅仅是统治者没了，连国家机器都没了，没有统一的军队、领土四分五裂了。执法能力没了，没法收税了，许多公共服务都没了。这些在前共产党国家当中是没有发生的。

不要说共产党国家，你就看印尼。印尼是革命性转型，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但印尼只有短时期的小乱，没有大乱。出现了暴力行为杀华人，但并没有恶化到持续性的、大规模的族群冲突。

所以，一般来讲，大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在共产主义国家，国家机器是很强的。党从国家机器当中被剥离出去之后，那个机器还是能运转的。至于小乱，我做过一个统计，一般来讲通过革命促成的民主转型，短期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许多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冲击。

中国是否会出现内战？中国是一个帝国型国家，如果出现大规模暴力，很有可能在新疆西藏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在汉人的地方，不太可能会出现军阀割据局面。中国现在地方上是没强人的，不像清朝。因此，并不能排除乱的可能，但是大乱的可能性不大。小乱的可能大，但是持续乱的可能也不是很大。

前苏联垮台，对中国人冲击是很大的，对共产党的冲击也是很大的。你仔细去分析苏联的垮台，死人最多是车臣的战争。但把这个战争去掉的话，直接

由于转型死亡的人并不是很多。俄罗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10年里面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犯罪急剧上升，失去了自己的帝国地位。中国是否会乱到那个程度，是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但再坏也不可能比俄罗斯更坏。

王：从历史上看，有些转型是从改革开始的，后来发生了革命。清朝末年，刚开始也是改革，但是步骤太慢，后来发生革命。但那是暴力革命，而且清末地方的实力和中央相比，中央虚地方强。

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是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政府及时跟反对派谈判，谈判10天就达成了转型的安排，我觉得这对减少转型的不确定性帮助很大。当时，政权在大规模民众参与的革命性冲击中，主要是政治镇压功能陷入瘫痪，还是有政府在维持法律秩序的，那种情况下你也不可以去杀人放火。

裴：所以，即使是这种革命性转型，国家机器还是基本上能够保持正常运作。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要讲乱，先要定义它什么？是国家垮台还是政权垮台？政权垮台不等于国家垮台，并不是说所有都没了。

王：共产党不同于政府。就像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权力了，但是政府还在。政府的经验、技术，它的执法机构、官僚机构，还是会起作用。

裴：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今天公安局党委没了，公安局是否会正常运行？我想肯定会正常运行。

王：你不能说公安碰见杀人的就不抓了，也不能说我可以随便去抢劫商

铺了。即使那个时候乱，一下子没有把你抓到，事后还要侦办。

裴：对。所以，国家能力肯定会削弱，但只是过渡性的，并不是长期的、结构性的。

王：另外，以东欧的情况来看，它的经济在一段时间之内受影响，时间其实也不是太长，几年以后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开始往上走。

裴：是的。因为经济都是周期性的。一般转型的时候，经济肯定出问题。转型之前，经济其实就出问题了。所以，这并不是转型本身造成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出问题促进了转型，然后转型又使经济问题暂时性变得更严重。但最终，转型之后使许多经济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比如说无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以后经济发展就会更有效。

王：很多的转型都是发生在经济困难、危机的时候，革命也好，改革也好。经济好的时候，掌权者觉得没有必要改，老百姓的积怨也小。

裴：经济好的政权，它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但等经济危机出现后再改革就太晚了。

王：是。非常感谢，敏欣教授。

访谈

陈健民 / 滕彪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全球视野下的 中国公民社会



陈健民



滕彪

编按：民主转型理论经历了哪些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启示？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图景乃至世界格局？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兴起和衰落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前景如何？中国的民主化具备哪些有利和不利条件？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陈健民教授进行了访谈。陈健民是香港著名学者和活动家，“占中三子”之一，现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滕彪(以下简称滕)：陈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能否简单的介绍和评价您的导师胡安·林兹(Juna Linz)教授对民主转型研究的巨大开创性贡献？您和他如何讨论和分析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体制，属于极权、威权还是后极权体制？

陈健民(以下简称陈)：我觉得胡安·林兹的贡献对于民主转型很重要。关于对非民主的政权分类，他最早把极权跟威权分出来，他不只是看政治层面，也会先看社会跟经济层面有没有多元化，然后看有没有官方的意识形

态。还有，国家是否经常动员民众，是否容许私人生活的空间。最后，看领袖是怎么产生的。他这种分类很重要，因为他关注转型的问题，起点不同的话，转型面对的问题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不太可能从极权马上就转到民主的，他觉得首先要经历过一个自由化过程，慢慢走上威权；威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变成更成熟的威权，那样转换到民主的时候就比较稳定。他不是排除有可能更快的转型。他只是说，如果在自由化没有成熟之前就进入民主化的话，面对的障碍会更多，然后民主建立以后，巩固的困难会更大。但后来东欧、苏联的变化，对他是一个挑战；不能再说极权国家没可能民主化了。他后来提出，其实很多这种国家，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松动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极权了。他提出Post-Totalitarianism(后极权主义)，它跟极权主义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但是开始出现比较多的经济上、社会上的多元；有官方意识形态，可社会动员已经减少了；领袖方面，越来越多是通过官僚系统里上去的技术官僚。

他以前只把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当作极权，后来我跟他谈文革期间中国是怎么样，怎么动员啊，控制啊，他也接受了中国在毛时期也是一个极权社会。改革开放后，慢慢走向后极权。从他的思路来讲，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可能又重新走向极权的方向。不过目前仍未完全成为极权，因为今天还是有民营企业在，虽说国进民退，但还没有完全取消经济多元。意识形态上，嘴巴里讲是社会主义，其实谈的更多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用民族主义做意识形态。动员方面，民众仍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可是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可能比毛时代更严厉，通过大数据、高科技等等；因此虽没有频繁的动员也不代表你可以保持一种真正自由的私人生活。

滕：对，其实很多西方学者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

胡锦涛这几十年，称作威权，但我觉得称威权不太合适。

陈：是不太合适，如果把那个时候的中国体制等同于新加坡，就离事实差很远。

滕：对，解严之前的台湾那种威权，和江-胡时代的共产党体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陈：是这样。所以台湾还可以比较和平地转型。当然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打压也很厉害，但没有真的经历过极权。

滕：近十余年来，民主化研究似乎出现“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也就是解释民主转型与倒退的主要因素，从“经济发展”转变到“分配不均”。是否“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最终会“导致”民主化——已经不再有效？

陈：你讲的很对。1959年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出版了第一篇文章，谈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奠定了这个所谓现代化理论的基础。后来这个理论其实在1960、1970年代面对很大的挑战，比如拉丁美洲、韩国，这些地方原来是有民主选举的，经济发展以后，反倒民主倒退了。到了1980年代，现代化理论又重新复活了。因为那些国家包括韩国、台湾等、等，经济起飞以后，出现了民主化。所以大家重新审视现代化理论的意义。戴雅门（Larry Diamond）也写过，经济发展确实对民主有正面影响，只是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一个N-curve，就是说可能中间会掉下来，再往上走。¹可是这种总结，我觉得时间段还是太短。总结民主化的理

论其实不容易。你说它是这个N，你怎么知道后来10年、20年会怎么样？它可能再掉下来成为一个M。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原来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核心是说，经济发展会造成阶级结构的改变，就是中产阶级的扩大。从金字塔的阶级结构变成一个钻石型的结构，中产阶级受到较高的教育，有比较多的钱跟时间去投入到公民社会，会接受一些民主改革，而不是要革命，所以中产的扩大对民主化起关键作用。

问题是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新自由主义，提倡更灵活的经济模式、以外判（外包，outsourcing）减低成本的弹性生产；另一个是全球化。资讯和科技发展很快，促进生产和贸易全球化，造成了公司把生产线移到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这两种力量使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出现M型社会，中产越来越减少，贫富悬殊、两边重。日本有个词“下流社会”，即往下流动的社会，越来越从中产阶级往下走到中下层。底层的人没工作，因为产业都搬去了中国。这种状态的出现，完全不是原来的现代化理论所构想的那种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像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两极化、还有所谓赤贫化。看今天欧美出现的情况，马克思的推测好像越来越对，但却没有出现他预言的革命。这可能因为经历过苏联、东欧共产统治和崩溃以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非常大的怀疑。即使欧美社会产生很多的内部冲突，看似有革命的条件，可是已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

滕：西方对中国的engagement（接触政策），背后也是相信现代化理论吧？

陈：对。跟中国做生意、进行更多的文化交流等等，一定促进社会结构和

文化的改变，然后出现政治上的改革。这是现代化理论影响到外交和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克林顿等很多西方领袖，就是这样去做的。可是这种理论没有看到的是，后发展国家经历的整个发展环境，跟以前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非常不同了。那时候完全是市场经济，不是靠政府；直至要打开东方国家贸易大门，政府才介入搞殖民主义。但在国内基本上是靠资本家（那时候的中产阶级），通过市场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后发展国家的经验不是这样的，它面对的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全球竞争，他们更依靠政府的协助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有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这种讲法，包括韩国、台湾等，政府会积极以开发土地、税务优惠、培育人才等支持产业发展甚至实行贸易保护在金融方面，香港虽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可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时，连香港政府都要直接介入股票及外汇市场，跟索罗斯的对冲基金对赌。政府扮演的经济角色越来越重，因为要更有效率应对全球化瞬息万变的大环境，导致权力更集中在行政部门而非立法部门。

同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非常不同。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Victor Nee提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市场转型理论）²，认为中国会走市场带动的方向，企业家比干部会赚更多钱等等。但后来发现，政府和党没有退出来，而是直接参与经济，如很多早期的乡镇企业，董事长都是地方干部等等。这个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所谓中产阶级，已经不像早期西方的资本家般独立于贵族阶级的中产阶级，要争取政治权利，没有选票就不交税。在中国，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企的高管，都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接触政策”忽视的方面；现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格局，完全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

滕：像一些学者（如秦晖）所指出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债务、贸易、失业，民主制度受到的威胁等等，实际相当一部分都和中国介入全球化有关，原因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没有民主、人权标准的全球化，甚至会造成制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的经济腾飞让专制体制更有野心，已经成为对全球自由的最大威胁。

多元民主中心（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 V-Dem）在2023年的报告《对抗独裁化》（Defiance in the Face of Autocratization）里揭示，全球民主的水平回到1986年，过去20年来首次出现封闭独裁国家（closed autocracy）数目超越了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数目。世界人口的28%，约22亿人口活在独裁国家；只有13%生活在自由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例，从1998年的74%降至2022年的47%；独裁国家愈来愈不依赖民主国家的进出口；反观民主国家在贸易上对独裁国家的依赖，在过去30年间增加了一倍。如何看待威权主义的回潮——Larry Diamond称之为妖风（Ill Wind）？您如何看待威权主义的回潮呢？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对独裁国家越来越依赖，您从香港到台湾应该有非常切身的感受？

陈：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这个市场，是很明显的事实；可是中国也很小心，知道过度依赖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等，它威胁国家安全，所以要开发一带一路的商机，在中国较能掌控的范围内做更多贸易；不会容易受到制裁。

香港很早就面对是否过度依赖中国经济这个问题了，因为它是面对中国的最前沿地区。香港特区成立初期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很早就此提出警

告。那些亲北京的政客、商人，批评她太过抗拒中港的融合，但她觉得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国际性，它要在各方面（金融、贸易、旅游等），跟西方保持紧密的关系。但对商界的人来说，中国的发展带来无限商机和大量的热钱，那是很难抗拒的诱惑。最后陈方安生在各种压力下离开政府，转投民主阵营而遭受中共打压。而特首梁振英更着力发展「内交」而非巩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香港虽然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取得好处，但同时亦付出沉重的代价。举个例子，香港股市上的所谓蓝筹股，绝大部分变成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个股票市场的起跌完全受中国影响。最近中国的经济那么坏，很多西方投资者觉得香港的股票过度依赖中国，就不太愿意投资太多钱。又如零售业，大量的珠宝店、药店，都不是面对本地居民，而是面对中国游客。结果是，表面上有很多钱进来，可是整个结构完全依赖中国以后，变得非常脆弱。1980、1990年代，中国觉得香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带动者、火车头，后来变了，觉得你们香港的经济是要靠中国的。所以在政治上，你更没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它要打你的时候也不留情，你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了。

滕：看来对专制国家的经济依赖，可能是非常大的政治问题。台湾的情况呢？

陈：台湾很不一样。在跟中国的贸易政策上，台湾两大党态度非常不同。国民党觉得应该要全面打开，早期推动“三通”（通邮、通商、通航），然后在旅游、贸易上有更紧密的合作。2014年还要签一个服务贸易协议，只是因为太阳花运动把它挡下了。台湾很多产业已经移到中国去了。除了那些做半导体的，因为涉及安全问题。国民党执政时明确说要西进，西边就是中

国啊，往西跑，才有发展的机会。于是出现红色资本渗透台湾媒体等很多问题。民进党就不愿意看到这种状态，它觉得以后这样走下去，台湾的独立自主能力就会越来越少。当然有的台湾商铺有埋怨，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经济也存在过度依赖中国这种麻烦，但因此而被中国霸凌，民众是非常生气的。近些年，这些国家都在调整政策；他们警觉到，对中国过度的经济依赖会导致在政治上完全被中国限制。

滕：对中国经济依赖度最高的国家，前三个就是澳大利亚、台湾和韩国。中国也越来越多地使用economic coercion（经济胁迫）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民主国家和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的专制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常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不适合西方那一套。而台湾应该是最有力的反驳：台湾现在的民主程度在亚洲名列前茅，有一些指数已经超过日本、韩国和不少欧美国家。另外，您是否认为，如福山所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的终结呢？

陈：说中华文化是不适合发展民主，台湾就是最佳的反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的研究认为，一些文化可能本身没法长出资本主义或民主，可是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对接的可能性。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了，很多文化互相渗透，所以文化决定论不成立。但是断言历史的终结也过于乐观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出版后，亨廷顿写了《文明的冲突》，以后911事件就出现了，大家会觉得文明的冲突是一个很实际的讲法，就是说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跟西方文明，这三套文明体系在长时间很难妥协，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可是，儒家文化里，台湾、韩国都反驳了这

种文明不可能走向民主的观点。一个伟大的文化往往有很丰富的内涵，中华文化里，孟子很早就谈民本主义，伊斯兰教里也有一些宽容的元素。当然可以说，有些文化要发展出民主比另外一些文化困难一点。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实行民主，只是在近年倒退了。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它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我也相信民主的价值内涵，是跟现代化最能够对应的。

举个例子，韦伯讲的认受性（legitimacy，也译作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魅力型、传统型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里很难碰到或很难奏效，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现代化国家，那就要寻找理性和法律（rational-legal）基础，那是跟民主最相关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讨论现代性的特征，譬如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与民主制度亦最兼容。看起来人类社会的确往这个方向走，但过程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说什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没这么乐观。

滕：同意您的判断，我觉得人类社会最终都会实现自由民主，不过需要很长时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人性，我觉得自由民主是和人性相符合的，人对尊严、对自由的追求，必然推动人类走向自由民主。

陈：我要再加一句话，我觉得人性里头，寻找自由跟寻找安全感，这两个东西都是很基本的需求。所以弗洛姆（Erich Fromm）讲逃避自由，因为自由的时候要背上一些责任，反正是有压力的。非常多的民众其实是为了安全感，宁愿放弃自由的，包括西方民众，面对恐怖主义、面对疫情COVID的时候，都愿意接受更多的行动控制等等。安全感跟自由其实经常会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要通过很多的教育、启蒙的过程，让大家知道自

由的珍贵。

滕：在专制体制下，每个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哪怕是高级官员也可能随便被抓、受酷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跟安全不是一个冲突的关系。

——我们回到中国，中国无论从人口面积、经济总量等角度，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各地又有不同的民族、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不平衡。这些因素是否一定会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呢？大国的民主化的转型，是不是格外的困难呢？

陈：我觉得大国相对小国来讲，面对的问题会更多，会出现非常多元的民族、宗教、语言的问题，在通过民主的手段去整合的时候，会有很大困难。所以不单是大小的问题，更是怎么处理多元的问题。

民主其实也可以处理一个大国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问题。二战以后，民主理论有很多的反思。在二战前，很多所谓国家其实只是众多部落的凑合，殖民者以武力把它们圈在一起，在战后变成一个国家。不同的部落不单是语言、种族、文化不同，甚至彼此有很多矛盾，殖民者退出以后，这些问题便浮现出来，如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分裂，非洲亦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出现分裂主义、甚至内战。英国殖民地遍布各地，但其民主体系只适合于单一民族、文化、种族、语言的国家，如果硬将英国那一套引入这些多元族群的前殖民地国家，某一个人口较多的族群在选举中取得多数票，其他与之矛盾的少数族群就失去安全感，宁愿分裂出来也不要永远做选举的败将。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处理？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

早期用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协和主义民主），后来用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model of democracy）³来回应此问题。你看到在比利时、瑞士，都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让不同的族群都能共享权力，谈的是大联盟政府，要用比例代表制产生议会等等。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思考。美国最重要是用联邦制，允许不同地方有文化的差异，地方高度自治，值得中国借鉴。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他们可以通过一个文明的讨论，最后更容许当地以公投决定其前途，结果虽没有独立，却展示如何透过理性的讨论、文明的方法来处理这种多元文化的主权争议问题。

滕：无论是谈民主还是谈民主化，其实都离不开公民社会，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是您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您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一个核心关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公民社会在艰难的成长，从民主墙到天安门，到后来零八宪章、维权运动，一度相当蓬勃，您如何评价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打压、控制，是不是已经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呢？

陈：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一个过程。先说民主墙运动，虽然规模不大，可是它真的启蒙了一大批人，包括我自己。当时北京大字报掀起风潮，然后一下子全都撤了，民众无从反应，可见公民社会很薄弱。很多人说1989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时间点，可那时候出现的工自联、学自联，都是临时在天安门广场组织起来的，之前其实都没有；大学里有沙龙，但离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还很远，六四后一打压，基本上所有那些组织都不存在了，再次见到公民社会仍未成形。美国的政治学者邹悦说，1989年学生是没法退场的，退场以后就秋后算账。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广场上一百多万人走在一块，不达目标不能罢休，因为后退更危

险，没有一个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你的。他用零和游戏这个概念来分析运动激进化的逻辑，无路可退，不成功就成仁了。如果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公民社会，就可以更有策略，可进可退。香港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民主运动比较有策略性，争取“阶段性胜利”，再往后退，直到2019年，大对决以后，中共全面清洗公民社会，情况再不一样了。

在NGO圈子，很多人会说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当时汶川大地震后，有几百个NGO去灾区提供服务，参与营救和灾后重建等。其实2008年之前在北京、广东、云南一带已有许多民间组织成立并默默地在做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而零八宪章也是那一年发表的，不过当你去直接接触民主自由议题的时候，很快会碰到专政铁拳。但假如只是从事环保、女权、劳工的工作，即使有倡议行动，那个时候仍是有非常发展的空间。

那个时候政府一方面会觉得NGO好像能提供一些服务，帮助政府来处理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很担心它变成独立的力量来挑战政府。后来当局慢慢地发展出一套方法来处理公民社会，即所谓分类管理，按照三个方面来看公民社会团体，再实行打压、限制或收编。一是看业务的性质，如果是争取民主或独立、甚至是监督政府、要求官员财产透明的，就无情地打压；如果是倡导，劳工、性别、病人权利或者是服务如艾滋病感染者等等敏感人群，便会限制你的发展，给你一点干扰，可又不是完全灭掉；如果是服务性的，老人、儿童、扶贫等等，他会支持你，打开一点空间给你。二是看你的规模。如果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络，他觉得很难控制，特别是1999年法轮功事件以后，他会觉得任何网络只要足够大，哪怕现在没有政治意图，有一天也会威胁到这个政权。1999年后我看一个内部文件，连校友会都不鼓励成立。即使不是全国性，活动范围如跨越一个小区，当局亦

会小心监控。如果只是在—个小区里头，连居委会都看得到你啊，这种是最容易控制的。第三个方面看资金来源，如果你是拿NED（美国民主基金会）、NDI（国家民主研究所）等机构的钱，很容易被当局视为勾结外国势力。如果钱是从香港、台湾拿的，敏感性稍低但仍须小心监管；如果是国内的钱，志愿者去掏—点钱，就安全—些。当局大概通过这三点（活动性质、规模、资金来源），来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处理不同的NGO，是打压、限制还是收编。

我觉得2013年以后就很—样，习近平上台后，七不讲、慈善法、境外NGO管理法等等，目的就是要控制打压、而不是要发展了。结果是把原来的灰色地带取消了，把—些原来只是没登记的，变成是非法的。我以前有过—个预测，我说中国的第三部门会越做越大、但公民社会越缩越小。听起来很矛盾，其实意思是，有很多服务性的团体会如社工机构被容许存在，甚至政府会购买他们的服务，但这些组织不会争取公民权利、鼓励公众参与。不过，最近连第三部门这个概念也不容许了，现在是全面要求这些民间团体建立党组，什么第三力量啊，就是要独立于政府。真正的公民社会差不多已经消失了。

滕：您曾讲过—段轶事：胡安·林兹的合作者著名的斯泰·潘(Alfred Stepan)教授曾到巴西访问—个军头，那位军头是将巴西民主化的军政府首领；他问对方为什么会放权，军头说，是因为读了胡安·林茨的文章。知识、观念和学术竟然可以以这种方式影响现实政治！您觉得华人知识分子有可能影响共产党政权吗？以及，在共产党信息封锁、思想控制越来越严的情况下，敢言的知识分子恐怕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能影响中国社会吗？

陈：这个问题真让我很感慨，我们都是跑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法发挥我们的作用才要到外面来。先回到巴西，巴西民主化的过程，很多人没法想象的。它有一个军政府，军政府为保护自己利益，会把自己的军队越来越现代化；可是后来，现代化武器是要用计算机来管理的，一般的没有知识背景的军官没法控制这些现代武器，所以要大量聘请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进入军队。巴西军队相对于警察、公务员来说，受教育程度很高，他们会读胡安·林兹那些学者的文章，有这样的大背景。中国的严重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无知跟知识分子的无耻，太多知识分子愿意为这个独裁政权来出谋、献策。你看每年学者研究的项目，什么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滕：那些拿巨额项目经费的，很多都是研究“习近平的法治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思想”那些东西。

陈：没错，你看中国大学里头有多少用习近平作为名字的研究中心就知道了。……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法民主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传统是“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最梦想的是做国师，在上书房行走，去中南海讲课，依附权贵，成了他们炫耀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在体制外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后，出现一些你这种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可是人数很少。不过，也不要小看这少数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很孤立，但他们的坚持仍会深刻影响年轻一代。

滕：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说，知识分子应该是free floating(自由漂流)的一个群体。中国知识分子依附权力、缺少自由独立的传统，不愿意到

体制外，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体制外。尤其是共产党掌权之后，极权体制基本不存在“体制外”，在1980、1990年代之后，体制外(大约也类似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空间和资源，但很难给知识人提供生存基础。

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在《中国的民主》这本书里，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促进了托克维尔所说的“状况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从而可以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您认为这种判断是不是太过乐观？

陈：这本书真的有点太乐观，他希望当权者能改革，共产党为了自己利益也应该从上往下推动民主；同时希望民众也不要跟政府太过对抗，要跟共产党合作来推动民主等等。他用《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做一个参照。有些地方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他没有掌握中国当前的状态。举个例子，美国开国的时候，那些从欧洲来美国的人，感觉到有一种Equality of Conditions，因为那时候没有贵族了，都是平民，通过市场经济来交易；市场会产生一种非常平等的力量，不考虑身份地位，我就可以用我的钱来买服务、买东西，那是一种很强烈的平等的感觉。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可以说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市场会打破一些特权，以前你做官才能进去的地方，我现在有钱了也可以进去。可是你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下去，有没有走向慈继伟谈的那种平等的条件？很简单，你生意要做大，能够避免跟政府合作吗？公民社会最早期的理论，市场就等于公民社会，因为市场的力量（无形之手）就是把政府的手推出去。可在中国，国家力量根本没有退场，结果是你跟政府发生关系，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往上爬。想想官倒、官商勾结、太子党派系等等就知道。

没错，中国比文革时代已经有进步了，最贫穷的人口减少了；但中国现在是在全球分配最不均的其中一个国家。1981年中国的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是0.28，1995年是0.38，2009年高达0.49，2020年0.47。因为腐败严重，实际上的贫富差距比统计数据更严重。慈教授谈的“状况的平等”有产权、性别、法律的权利等。真的平等吗？产权，你看多少土地被强征、房屋被强拆？女权活动家在三八妇女节发发传单就被抓起来，真的有性别平等吗？

回到托克维尔，他说，美国能够民主不单单是“状况的平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是Habit of the Heart，心灵的习惯。人们在地方参与很多公共事务，会有中庸和妥协的态度，贡献自己的时间，参与很多社团，考虑群体利益，等等。这些东西在中国好像都没有。中国是从非常集体主义，变成非常个体主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公共意识非常薄弱，这跟整个公民社会没法发展起来是相关的。共产党真的有动力要推动这个国家回应公民社会的呼声吗？我看不出。就算下面有了真的民主社会，共产党只会用更残忍的手段把它压下去，香港就是这样的例子。

滕：很多人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绩效，所谓的performance legitimacy（绩效合法性）。也有一些人像贝淡宁(Daniel Bell)，强调中国的贤能政治或者叫功绩政治(meritocracy)。他们声称，中国虽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但它更优于西方民主，它总能把那些最有才华的官员选拔上去等等。你是否认可这些说法？

陈：单靠绩效，特别是经济表现，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经济有起有落。而民主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治还是很稳定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南韓

民众会踊跃捐款，帮政府渡过难关。你会看到，legitimacy是超越了所谓经济表现的，如果没有另外的合法性来源，单靠经济表现其实很危险。胡安·林兹绝对不赞成有所谓performance legitimacy，他觉得绩效是绩效，合法性是合法性，分开了以后才可以讨论两者的关系。我倒不完全同意林兹这个讲法，经济绩效能不能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是不同的。中国很长时间里有以民为本的思想，经济表现也可以作为一个合法性来源。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靠绩效加上民族主义这两个东西。经济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用民族主义来操纵效果如何？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你看年轻人一代，并不都是小粉红，更流行的是躺平，还有润，还出现白纸运动，反抗者也是大量存在的。

贝淡宁他们对西方也不是完全理解。他们会把西方那些选出来的市长、总统跟中国来比较，可是西方其实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政务官的系统，一个是文官系统；文官系统其实也用meritocracy的方法来产生，通过考试、看他们专业的能力之类。那些官僚往往只会把眼光放在一个窄小的部门，缺少宏观的视野去看全国性的问题；于是需要另外一些能够超越官僚的政治家去带动国家的发展。两个部分互相补足，互相平衡。有时候政客要推行一个政策，发现这个官僚系统有很多抵制，他们觉得太过理想化是做不来的。所以说西方完全没有那种meritocracy，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还有，所谓中国模式，从来没法解决权力继承的问题，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和平交接权力的制度。

滕：贝淡宁的核心观点是荒唐的，完全缺乏现实感。相关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下滑或经济危机，会不会在中国产生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呢？会不会给中国的民主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更多的机会？

陈：苏联的解体当然是跟它经济比较坏有关，可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比起当年的苏联跟东欧，还是比较强大的。它靠内销，再加上一带一路之类，可能会撑很长的一段时间。全世界有很多经济很烂的国家长期维持专制体系，比如北韩等。所以经济危机未必马上导致政权崩溃。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中国会留在这种中等发展国家非常长时间，没法再往上走，它出现的是Decay，不是Collapse，是溃败，而不是一下子崩溃。我们看到民众的政治力量是非常弱的，虽有很多不满，但没法组织起来。看看白纸运动，几天以内你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去动摇这个政权的话，就没法持续下去。互联网也控制得非常严密，党内的改革派也都被扼杀了。

中国掉进发展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很难出来。要维持多久，才会出现一个政变？政变是没法预料的，目前也没法找出另外一个派系。就算是政变也好，独裁者自然死亡也好，它只是提供一个政治机会，可是不一定马上就出现民主，也可能出现一个普京。胡安·林兹谈民主巩固，有五个很重要的力量：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治，政治社会（政党），国家官僚体系。如果在民主化前，这五个东西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少，那一下子民主化，很容易倒退或崩溃。所以中国在民主化之前比较能够做的，包括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起码的法治，这些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做的，这也是胡安·林兹重要的提醒。

滕：您曾经受到中国民主墙和台湾美丽岛的启蒙，后来又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近年来又近距离观察台湾的社会与政治，您如何看待两岸三地的这种联系，民间社会是否应该相互支持？

陈：这三个地方现在处于不同的处境，台湾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深化民主。

刚才讲的五个条件里头，香港基本已经具备了，可是还没有民主，这个政治滞差很大，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冲突。中国的五个条件都非常弱，市场经济走了一半，然后国进民退，公民社会起步以后被镇压下来，法治方面，你本人和很多法律人都努力很久了，到今天还没有比较独立的法治。中国不具备民主巩固的条件，并不是说它完全没可能民主化，只是说它面对的挑战更多、任务更艰巨。

滕：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注释

- 1 参见：Diamond, L. (199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5(4), 450–499.
- 2 参见：Nee,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663–681, <https://doi.org/10.2307/2117747>.
- 3 参见：Lijphart, A.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访谈

王飞凌 / 秦中音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国共产党的 体制性宿命



王飞凌



秦中音

编按：习近平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经济下滑、民间矛盾加剧，他进一步加强了其一党专政机器对社会的统治力度。在这篇访谈中，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基因（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缺失皇室的秦汉式帝制政体），结构性地决定了其命运。这一体制性宿命使得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直是其权力的绝对安全，“不得不”力求控制一切以维稳；而严控扰民必然制造无尽的新问题与各种反弹，从而迫使当权者进一步加码管控；如此反复内卷，趋向反噬权力本身。

王飞凌教授著有《中华秩序》、《中国纪录》以及将要出版的《中华博弈》（“中国三部曲”）。

秦中音（笔名）为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记者，因安全考虑不便透漏真实姓名。

政权稳定的本质：资源汲取和高压管控

秦中音（以下简称秦）：多项数据表明，疫情后大陆的经济增长停滞。很

多学者曾指出，经济增长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民众愿意向政府让渡权力的前提是能获得一定的财富回馈。您在《中华秩序》与《中国记录》中曾提到，文革后，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并提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尤其是“八九事件”之后，经济成为一个重要锚点，其目的是挽救中共政权于危亡之中。您认为，当下中国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会撼动中共执政的稳定性吗？

王飞凌（以下简称王）：“八九”确实是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中共的统治陷入危机。此后30年中共把经济建设，如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发展基础设施等作为生存和执政的重要基础。客观上说，这对中国、区域甚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及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这对中共来说是把双刃剑。因为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后果之一便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日益西化（Westernization）、“与世界接轨”。中共的如意算盘是，只在经济领域进行部分接轨，即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和市场进行经济发展，但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样安抚了老百姓，也不会动摇中共的一党专政。但这种选择性的接轨是过渡性的，不能稳定长久。就好比两个人谈恋爱，却从不融合，不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追求，而是各怀心思，只要对方给我想要的好处，但不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样的关系碍难持续。

现在西方国家提出了“去风险”这个概念，亦即所谓脱钩。我觉得脱钩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与西方从未完全接轨过；都是按中共的选择，极力维持半接轨、半脱钩状态。现在的局面是，要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就需要更深入与西方接触，进行必须配套的政治改革。但这势必危及中

共这个威权主义一党专政。所以我认为，在2007年到2012年之间，中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甚至是赌博，那就是中共为保持专政权力，选择牺牲经济发展。这个赌博背后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现在经济发展的很好了，老百姓也相当满意了，我们可以不用再委屈让步去注重发展经济了。

秦：对的，综合各项经济数据的研究和分析，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依赖的便一直是经济存量。

王：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们在赌一个毛泽东式的强人专断领导，仰赖“红色血统”，视之为增强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法宝，顶住政治现代化的压力，抵制西化。习近平的上台便是这种赌博的结果。但这种赌博的挑战是，如何在脱离外部世界的情况下运行经济？这其中有一个偏听偏信的问题，就是中共高层认为离开中国大市场是世界的损失，所以才有了过去10多年来一系列的举措。其后果就是经济走势持续下行。

但我认为中共的执政根基并非是经济发展。中共执政的根本一直都是毛所说的“两个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即暴力镇压和宣传鼓惑。中共执政的稳定性和经济的发展并非成正比，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好，合法性就提高，发展的不好，合法性就下降。实际上，经济与执政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和想象。抓牢枪杆子和笔杆子才是赢得赌局的关键。中国社会在日益西化之后，一党专政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否能继续支撑下去？如果能，代价看来便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悲观，中共是一个相当优化的专制极权体系，即我称之为“中共最优化” (CCP Optimality)，可以继续统治中国社会，不会因为经济不佳而自动下台。这种体制的代价是长期的、全面的“中国次优化” (China Suboptimality)：中国人民为了一小群统治

者的无比权力和极端奢靡的享受而不断地吃苦、牺牲。

中共不会因为经济危机下台的一大原因，是它强大且没有底线的压榨汲取和控制能力。三年大饥荒是有力的例证。但也不能全然悲观。相较于过去，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西化了很多，民众要求水涨船高了，中外民间社会联系密切了，所以中共能否赢得这场赌博仍需观察，但中国老百姓在这期间恐怕要受很多苦难。

秦：您提到中共的第二个赌博是，要选出一个毛式的政治强人来接班；但同时中国社会的西化使大众接触到了更多元的价值观，这导致他们的思维相较毛时代的大众开放许多。这是否意味着，被选中的习难以集聚毛当年神一样的精神内催力，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民间不再具备培育政治强人的土壤？

王：这个问题很好。我在《中国记录》里分析了习能否旧剧重演，成为第二个毛。毕竟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很多改变，这是第一。第二，中共与过去相比也变了很多。第三，习没有毛的“建国”功绩，这使得他无法在权威上与毛比肩。

分析习的执政表现，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和知识相当有限。他的个人魅力或者说领导力、号召力都不高，只是中共把他给吹起来了，无中生有地大搞个人崇拜。现在对习的造神运动已经非常狂热。虽然他们掌握了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但这种造神效果颇为可怜、可笑，更像一场舞台喜剧。在泡泡未被戳破前，他们尽可以指鹿为马，维持所谓伟大领袖的形象。

秦：您刚才说中共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可以详细说说吗？

王：与1950至1970年代的中共相比，现在的中共已成为精英组织，内部有许多分层，每个精英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中共领导们和九千多万党员的利益并不一致。

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对习的崇拜是表面的应付差事。习公开露面时，从陪同官员的神情、姿态甚至穿着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在演戏。作家巴金曾说过，在毛时代大家都是自愿为奴，不仅是身奴，而且是心奴。人为什么会甘愿当奴才？因为这样做他们有好处可拿，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这种所谓个人崇拜和领袖魅力，是非常肤浅的。一旦有真正的风吹草动，就能看出谁在裸泳。

高速发展背后的三大赤字：人权赤字、环保赤字和信用赤字

秦：有学者认为好的专制优于民主制度，因为专制的效率、资源聚集能力、分配能力更强，这也构成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条件之一，您认可这种说法吗？另外，是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大，还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发挥的作用更大？

王：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专制和民主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是互相竞争的体系。其中前者在中国帝制时代达到巅峰，即所谓秦汉政体，也可以称之为是人类政治治理的一个高峰。但这种制度没有继续发展、创新和完善，反而停滞僵化了。而西方社会则开创了开明专制，之后发展到君主立宪和民主政治，形成了人类政治治理的一个个新高峰。

不排除专制制度在某些时刻拥有竞争优势，如动员能力强，可以不计成

本、集中力量做一些领导决定的大项目。但这种优势背后的代价之一，就是秦晖教授提到过的人权赤字。我想再补充两点，即环境保护和道义信用赤字。中国学者陶然就描述了这样一种“逐底”式发展模式。在这三个赤字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虽有成就，但是赤字总是要还的，现在便进入了还账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次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彰显出来。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现象，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其老百姓却千方百计跑到国外，移民、偷渡和申请政治避难。过去30年，中国一直是到各国申请政治避难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8%，但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多年来一直占到总申请人数的30%以上。这是明显的道义和信心缺失。精英和财富的流失会更加剧“中国次优化”。中国的这段高速发展，本质上是枉顾道义信用、牺牲人权的杀鸡取卵式的不可持续发展。专制政体取得的经济成就，无法抵消其对社会造成的综合损害。

有些有房有车、有工作、有一线城市户口的人，认为在中国生活更便利，从而觉得中国制度更优于西方国家，这些可能是真实的感受，但其实是颇为狭隘、短视。这种短视下，有人也许会觉得专制政体是个吸引人的制度。但即使是开明的专制，也有几个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比如权力继承问题、如何容纳不同的意见、如何保证领导永远开明正确、如何避免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后却大办坏事。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长期来看，即使最好的开明专制也要比糟糕的民主制度差。

秦：中国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所拥有的生活，是其余十多亿老百姓终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但这些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却以中国人之名扮演着体制捍卫者的角色。

王：统计显示，大概15%至18%的中国人是体制受益者。但他们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捍卫体制。比如，投资移民美国、加拿大、欧洲的人中，中国人占到了80%，这些有钱的成功人士之所以选择移民，大都是因为个体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因为精英组织的分层和利益诉求，不仅限于财富，还包括政治安全感、人格尊严和自由。“中国次优化”令精英们也常常成为高档一点的“韭菜”，诸如肖建华、赖小民、叶简明之类的资本大鳄和权贵大佬的下场，就给党内外中国精英们不断在敲警钟。其他如马云、孙大午、许家印、范冰冰等例子也说明，在中国现有制度下，没有人是安全和自由的，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比如温家宝，他能像欧美国家退休的领导人那样自由看看体育比赛、去海外度假吗？他不敢也不能。最近中国外交与国防两大部长离奇的接连失踪，更是令人发怵。当年，毛刚去世，妻子侄子就都入狱，自己也不能如愿“入土为安”。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精英，在这种体制下得到的仍然是制度性的次优化。

秦：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共高层通过各种方式维护的制度和政权反过来也限制了他们自己？

王：对，他们根本性地缺乏安全感、自由，甚至尊严，实际上都是体制的奴隶。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官员出镜都穿一样的夹克，姿势一律，这种统一的标准动作抹杀了生而为人的自我。当然，他们在下属面前还是像王爷一样耀武扬威：一边当皇帝，一边当奴才。这种人格分裂式的生活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解密的档案显示，包括毛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层都依赖安眠药，这是很凄凉的。

秦：您提及的“三大赤字”对中国社会和普通老百姓有何影响？

王：中国人与他国民众无异，不是工蜂或工蚁。并不是像官方宣传或希望的，永远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甘于奉献。他们既不是童话里的愚公，也不是假模范雷锋。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底线的，低于底线，他们也受不了。于是就有了走线、躺平、更多的社会抗争乃至暴力反抗事件。至于官方和民间无处不在的磨洋工、贪污、欺诈、互疑、大肆造假之类，既是统治体制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这个体制的应对和反抗。

中共的宿命

秦：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发展吗？或者说现行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吗？

王：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增长，除了依赖前边提到的三大赤字外，中国老百姓的勤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经济享受到了“要素位差”的红利，就是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期待值在过去被压得很低，和国外存在非常大的位差，就像落差比较大的两个水平面一样。在和西方部分接轨后，带来了一时的巨大落差能量，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很快这两个水面的落差减小，中国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以前不到美国工资的十分之一，现在涨到了三分之一甚至更高。这种优势基本上已经利用完了。再考虑到中国的其他要素如土地、能源和信用的昂贵，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完全可期的。

其实中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统治，一时“允许”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保证一党专政和分配拿大头的前提下，它给了老百姓一定的空间，让他们去赚钱，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

的制度原因。不幸的是，不管是要素位差，还是中共的“允许”，看来都是相对的，具有时效性。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日渐消失。

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中国从此迈进中等收入陷阱，就像许多拉美国家一样。第二种可能是，中国经历痛苦走上创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就像西欧和日本一样。但后者需要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来配套，包括产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民众的自由度等等。从当前趋势看，迈入第一种可能性的概率更大，甚至重回毛时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关键是有没有政治改革。

秦：欧美国家曾寄希望于中国能够通过经济改革推进政治变革，但与之相反，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并意欲让他们遵从自己制定的秩序。在你看来，中国敢于“挑战”的底气和终极目的是什么？

王：习多次提到引领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要给人类带来更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人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洞的口号，但北京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做真实的努力。

首先，非民主政权都偏爱喊口号以号令和动员人民。这和毛时期喊建设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解放全人类、天下大同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其次，中共高层想用那一套已经停止进化和更新的秦汉式政治制度去替代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这是明显的不自量力。但是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历史宿命，也可以称之为不幸的体制性诅咒。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从前苏联施行起，其使命便是将这种制度模式推

广到全世界。其必定要通过扩张来保证自身的生存，所以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就是要挑战全世界；它本质上就是要无休止的斗争，直到全世界都在其控制之下。中共执政者想永远掌权独裁，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执政者。这与秦汉式专制统治者们的目标一致，都想要“一统天下”，掌控整个世界。这种制度性宿命驱使下，北京在国际上四处任意撒币，徒耗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共的“最优化”不仅造成长久的“中国次优化”，还在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次优化”。

秦：执掌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权力需要吗？制度赋予个体的欲望究竟大到了什么地步？

王：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共产主义制度在没有掌控全球之前永远是不安全的，其追求的终极形态一定是世界政府。我这里所指的共产主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与中国传统的秦汉式专制主义政体异曲同工的，并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不安全感在前苏联已有充分体现。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已经空前严酷了，还要继续加码，试图控制每个人的每件事情；因为只有对社会进行绝对掌控后，政权才会觉得安全。于是党国陷入了很吊诡的诅咒：要控制一切才会觉得安全，而要控制一切就必然会带来许多问题和抵抗，实际上增加不安全感。对外，这种体制无法忍受外国的民主政体的竞争和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会激发中国人民追求政治权利和自由去终结一党专政。

政权稳定的四重要素

秦：毛时代强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现在的反复强调“伟大斗

争”和制造外部敌人，导致社会裂痕，大众情绪紧张、焦躁，互信程度降低。这些都是稳定政权的手段和工具吗？

王：是的，外部力量要“亡我”确实是中共的真实恐惧。但这个“我”只是中共领导层的权力私利而已。来自西方的竞争确实可能会亡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但不见得非要亡中共这个党，也不一定要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会亡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却会大大增强中国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有益于中国人民。中共党国的政治利益与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之间，显然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持久的鸿沟。只要看一看哪些国家是对中国人民实际上最有帮助、至关重要的，再看看哪些国家是中共官方的所谓友邦，就很清楚。

就像四条腿的凳子才能放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也主要有四个来源，分别是暴力即枪杆子；民众参与即选举、自治和言论自由；政府业绩即经济发展等民粹性质的好处；以及领袖魅力与“资格”，最后一点主要表现为天命神授的君权、领袖能力与功绩、宣传造神与舆论控制。起码的政治稳定性合法性需要有至少三条腿。

但是现在支撑着整个中共党国政权的只有两条半腿，其中的半条指的是不断下行的经济。经济的下行使收买民众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了两条腿，即暴力镇压和政治宣传。没有人可以两条腿站着睡觉而不垮下。这直接导致统治成本极高且效益递减，维稳经费高过国防开支，而这样反过来又使经济发展进一步下滑、收入更加高度不平等，使那半条腿更短而无力，形成挣扎、斗争的死循环。

秦：通过鼓动斗争建立暴力秩序，以及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和树立外部敌人，比如美国，是不是也是克服或者转移国内危机的一种手段？

王：是的，但这实际上无法转移危机，反而可能是在玩火。但我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大众，汲取资源，驱使百姓为所谓“国家安全”出钱出人、任劳任怨。中共统治者将自己等同于国家，这是动员老百姓为其服务的好把戏。

秦：这种对外挑衅会对中国的国际形势产生什么影响？

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甚至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把中国视为另类和麻烦制造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中国现行的制度对全世界人民都不是好事。但中共实际上对外战争还是相当谨慎，主要是喊口号和摆姿态。他们知道很可能打不过敌手。参考毛1949年到1970年代的对美政策，会发现口号喊得非常响，但是一直避免和美国的正面冲突。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命令，必须照做，还要顶个“志愿军”的假名。而毛之后，更是这样，尤其是军事科技快速发展之后，现在战争前后方的区别减少，他们更加小心，只会喊口号来欺骗国内老百姓。当然，扩充武备、煽动仇外、挑衅他国，还是有可能导致情况失控或者偶发事变，玩火自焚。

以政权安全为核心

秦：但是这种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无疑会对贸易、科技发展带来进一步的掣肘，甚至封锁，从而导致经济继续滑坡。之后便是社会稳定、经济考验、资源汲取、公众情绪之间的持续博弈。继续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及

中共政权接下来的走势会是什么？

王：可能回到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模式，成为更硬化的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权。中共制度里的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或曰秦汉式专制主义的基因，决定了这种走向。这个宿命当然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来说，都是非常可悲的。

秦：中共高层一边高喊发展经济、引进外资的同时，一边又在对外资企业进行限制和打压，怎么解释这种萝卜加大棒的做法？

王：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是中共的惯用策略；为了统治，可以自相矛盾、食言而肥、不择手段。一党执政与共同繁荣其实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中共的本质是全面掌控，掌控意味着对自由经济的压制。中共从未正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们的举措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直接关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中共政体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经常不符，甚至背道而驰。

秦：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地方财政持续被影响，导致公共服务和维稳系统的公务员被降薪、欠薪后，行政系统的稳定性、凝聚力以及顺从程度会受到影响吗？中共对社会整体施行高压管控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被削弱？

王：会。但只要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握在手里，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代价是老百姓承受更多苦难。通俗点解释就是多割点韭菜，比如多些苛捐杂税，同时滥发货币，乃至重回配给制度。这样一来，这些经济困难可以在内部被稀释掉，用更多的人民的钱去供养那些重要的人民“公仆”

如军警。我认为地方财政困难并不会对统治构成威胁，这个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可以加大汲取老百姓的钱（通货膨胀也是一个方式）去弥补一个次优化经济之不足。

中共的真正挑战来自外部，除了战争外就是外汇收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关注粮食安全、退林还耕和新能源车。一旦外汇收入下跌就会无法进口石油、设备、技术和粮食，这些严重的问题不能靠滥发货币解决。

秦：所以这些决策都是以政权安全为主轴。但独裁者永远都不会感到安全，因为面前只有被推翻和自己在任上干到死这两个选项。习曾多次对官员的言行进行明文限制，严禁官员妄议中央、不允许退休干部干涉中央决议等等。习与他的高级官员之间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政权内部的稳定能够维持吗？

王：这很有意思。这是典型的秦汉式帝制或毛时代的回归。在2017、2018年习开始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时，便明确意味着习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他个人的下属甚至是家奴，而非同事。每个人只有竞相表忠心才能存活，否则就是阶下囚。这种官场机制导致了政治宣传中的习思想要“入脑、入心、入魂”，极为陈腐的帝制语言。但这也陷入了一个权力的怪圈：越独裁越感到不安全，越不安全就越要独裁，最后所有的代价都由老百姓买单。要控制一切才安全，最终只会更不安全。

习的个人命运有待继续观察，政治权力斗争的细节难以预测。但最基本的人类历史与政治科学告诉我们，越想要自己获得安全，便越要给别人安全；如果让别人都不安全，那自己也安全不了。

帝制回归与新冷战时代

秦：您写过，1949年中共正式执掌政权后，政权的本质便是帝制专政，但因为内部及外界压力所迫，邓、江、胡执政的三个时期，被迫妥协转向了集体威权主义，短暂的贡献了经济发展窗口，现在则重续中共政权的本质。在你看来，这种帝制回归会是一帆风顺的吗？

王：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跃退，把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的社会政治改革又给扭转回帝制时代。西方来的共和主义和人民主权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不得民心，迅速失败。披着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外衣的中共政权，也不敢公开建立正式的家族王朝。但没有皇室的威权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还不如帝制皇权，因为它缺乏血缘进行内部稳定链接，导致资源被消耗在如何决定继承人以实现权力交接上。邓-江-胡时代的方式是集体领导，其中一个人是核心，这就是杨继绳所说的没有血亲王族的集体帝制。然后有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但现在邓式平衡被打破，重回一人掌权的时代，没有血缘关系加持、没有确定的继承人遴选机制，注定了这个政权难以稳定。

秦：所以即使他已经在事实上加冕了，但权力仍然会是不稳定的。

王：我觉得习的权力比皇帝都大，但根本性地更不稳。皇帝有家族平衡，受到孝道约束，并且搞些“受命于天”的仪式包括“罪己诏”之类。中共将“天命”转换为“民命”，即受命于人民，将这个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出发点。于是便有了习宣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是人民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恐怕没人敢深究。人们甚至应该同情习：他这种没有皇室

的独裁者身不由己，自身安全感极差，不能有丝毫的示弱，于是不敢认错、难以自我纠正，必须撑一个全知全能的架子，时刻全面掌控，事必躬亲，却又做不到、做不好。权力对个人的腐蚀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出昏招、铸大错、遭反噬的时候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秦：在中共这种号称人民民主专政的个人极权主义国家，人民的作用是什么呢？人民在制度的运行中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王：以民为天、为人民服务这种概念都是蒋介石先提出来的，后来毛将其运用得更成功。但是“民命”比“天命”作为专权合法性的来源其实更糟糕。天命下，帝王还会在遭遇自然灾害时自责一番、改弦易辙。但民命下，人民只是一种托辞，其实是肉盾和韭菜。如果真要是“受命于民”，他们怎么不敢让人民投票、发声呢？即使是精英们也不允许妄议中央，更别说老百姓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了。因此“民命”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但民意不像天意，是不断变化的。不给人民选举权和发言权，却自称代表民意，其可行性必然低，其代价必然高。

秦：学者重提中西方的竞争仍是制度之争，并表示中美之间已进入了新冷战时代，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王：越来越是这样一个走向。2008年之前，中共因为韬光养晦，引发西方猜测，包括一些学者幻想甚至自欺欺人，说中国已经间接进行了政治变革。但制度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是根本性的问题。而现在中西方制度上的不相容现象越来越明显，其后果也越来越重要。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形成，事实上已经走向了冷战。也可以说，冷战的东亚部分其实并

没有结束。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提及冷战，但相比热战，冷战是不坏的选择。在我的新书里，用“中华博弈”来描述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竞争。当然最好的走向是，中国进行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这样中国依然会是世界强国，还能融入世界秩序，但可能性不大。所以冷战看起来是比较可能发生、也不那么坏的选项。中共用“冷战”这个词作为唬人的宣传套路，但实际上反映了它对冷战的惧怕。

继承人难题

秦：对于继承人选择的问题，秦晖有个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定理，即在苏联体制下，当权者不知道他选择的接班人是什么样的人，对方掌权后推行的政策和当权者在世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左的。因为当权者以外的人戴着面具生活，以迎合在位者。中共的继承人筛选也面临这个问题吗？

王：是的，穿着那些奇怪的夹克衫陪习视察的中共官员们都是在戴着面具表演，所以测不准。此外，中共现在依托的是没有皇室的专制制度，这是人类已知各种政体中最糟糕的一种，因为即使是通过血统选择继承人，也有一定的概率选中一个和上一任差不多的。而现在中共党内的生存法则决定了其遴选机制是逆淘汰机制，即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要对领导绝对顺从，不能比领导更聪明更能干，或者至少要伪装的不比领导能干。长期的伪装和适应会导致真实能力和道德水平下降。这种机制虽然保障了在位者的权力安全，却使上位者道德和能力递减，是一党专制体制的诅咒和悲剧。

秦：在江和胡时期，接班人是较早确定的，最迟也没有超过第二个任期，

但现在习第三个任期连任后却仍迟迟没有公布接班人。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王：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者行为。中共没有像西方那样条例明确的竞选机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血统继承制度。这两种机制运行下的继任过程大体清晰，使得民众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而中国则完全是暗箱操作，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这赋予了独裁者极大的权力空间，但对国家、民族甚至自己的政党都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习现在是在赌博，要么他继续独占权位，要么全党迎来灾难危机。他可能会像毛一样最后随便指定一个接班人。毛去世后，中共高层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习要当第二个毛，可能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恋，以及对自己能力与运气的高估。

秦：如果在最后时刻随便指定一个继承人，会让中国重蹈“四人帮”带来的政治危机吗？

王：预测很难，因为变量太多。但分析毛的最后时刻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和悲凉的。他觉得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是混蛋和笨蛋，不听他话的人都活该倒霉，之后的腥风血雨都是那些人应得的。这几乎是所有独裁者的可怜结局。

中共的不确定继承机制会影响老百姓对未来的判断，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资本的流动，这些代价最终由普通人承担。权力交接于是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所谓腥风血雨、暴力再分配已有财富。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倾向于短期行为，有条件的人或躲或混或“润”。中国人勤劳、能吃苦，但得到的报酬与付出远远不成正比。像我们这些出生于中国、观察研

究中国的人对中国老百姓可能都会带有些感情色彩，不能不充满同情。

未来的走向

秦：根本原因其实还是中国没有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官方管控非常严格，这一方面导致了公民组织的缺失，一方面则使得公民运动连雏形都无法形成，更别说去发展和壮大了。

王：中共最害怕的还是中国人民自己。它不允许民众自治和结社组织，但这也整个中国政治推向了脆弱险境。

秦：所以在铺天盖地的宣扬“伟大斗争”的官方舆论场中，普通老百姓也有可能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王：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想要斗争的对象不一样，整体来说“伟大斗争”的对象是不服从党绝对管控的人。独裁统治的法宝就是要不断树立敌人。这些敌人可以是地主、富农、黑五类，台独分子、疆独分子、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走资派、贪污腐败分子，还可以是违纪违规、妄议中央的人。斗争对象和敌人完全由统治者根据需求和偏好来确定、随时变换，所以这种“伟大斗争”是永无止境的。而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成为斗争对象，也还是摆脱不了“肉盾”兼“韭菜”的宿命。斗争的目的就是继续扩大权力、稳固已有权力。但常常是适得其反，越斗争社会就会越不稳定，权力越不安全，这就是中共体制性宿命的诅咒。

秦：按照这种思路，中国似乎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

王：中国的部分领域，如都市基础设施，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十分偏颇，欠缺很多东西。我曾经和一位中国高层官员沟通，他告诉我，思考问题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如果最高领导人没有动机和理由去解决问题，那他绝不会去做，无论是怎样的好事。而让最高领导人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只有抓紧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所以，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化西化程度越来越高之后，亟需配套的很多政治现代化不仅缺失、反而倒退的原因。

秦：所以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硬件条件已经成熟，只是高层官员没有动力去做的问题。

王：对。宣扬中国人在经济科技上可以向西方全盘引进甚至赶超，但因为“民族素质”或者“知识水准”不行，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不能向西方看齐，是一个地道的邪恶欺骗，也是对中国人民人格和智商的巨大侮辱。对掌权者来说，他们的利益绝对是最优先的。这些人号称是无私的人民公仆，其实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消减他们的相对权力、特权特供和个人野心是极为困难的，犹如中国的一句成语，“与虎谋皮”。

秦：但是习反复宣称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在你看来，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该如何定义这个概念？

王：这是个可笑的骗局。现代化哪里有什么中国式一说？中国和美国现代化哪里不一样？官方定义明确说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中共要永远一党独裁专政下去。现代化在各国的一些具体表现当然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雷同，但绝没有什么按国别不同的现代化。人类的经济技术和

政治社会的现代化是基本一致的、共通的。无论在哪一国，一党乃至一人的永远专政都是前现代的东西，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秦：2022年底，中国民间也罕见地爆发了多起游行示威活动，这会是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进行抗衡的新起点吗？对政权会有影响吗？

王：白纸运动是分散自发的绝望之举，力量相对软弱，不具备颠覆的能力，对政权稳定性的影响小。当然越来越多的人觉醒是好事。不过在抗议活动不断被官方镇压后，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另一种抗议方式——躺平，包括选择不要后代。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力减少会进一步导致中国竞争力下降以及经济萎缩。

中国的清醒者勇敢站出来，令人钦佩，但往往迅速被消音乃至消灭。长期以来，很多的中国人民被弱化、愚弄、毒化而失能失德，可悲且令人担忧。因为在军国主义“伟大斗争”旗号下，他们会对自己、也会对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秦：这样一个政权，一方面可以通过超强的汲取能力和管控能力保障自身稳定，但同时却无法避免制度运行的本质带来的自我反噬，它最终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幕？

王：不外乎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和平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但现在看来，中共已在尽力堵住和平转型道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减小。剩下的选项是长期次优化吃苦或暴力崩解，这些都会带来剧痛，老百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共的统治体制与现代的世界潮流及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都极

不匹配。

比起暴力变革，我更期望通过冷战这种国际竞争促变。考察1947到1991年的冷战档案，可以发现冷战的结局其实对大家相对良好，大国间没有大战和核战，最后和平结束。冷战还给全人类带来了海量而持久的科技红利。

很多苏联集团的成员冷战后都有了政治的现代化变革，扬弃了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体制。有些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诸国也基本上逃过了非民主政体转变时常有的腥风血雨。中国将来如果能走向这个结局，就是很好的结果了。任何创新、变革都是有代价的，代价的大小以及由谁来承担都是些极有意义、值得为之博弈的问题。我在即将出版的《中华博弈》里，将试图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秦：非常感谢！



笔谈

罗谷
文贯中
史桔
夏明
盖思德
李少民
乔山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国经济困境： 原因、出路与政 治意蕴

编按：中国经济曾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持续增长了数十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逐年下降。今天，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中国经济不但雄风不再，而且“徘徊在一场危机的边缘”（保罗·克鲁格曼）。企业家普遍对未来没有信心，整个社会开始陷入一种焦虑、失望状态。

目前这种令人担忧的困境，从政策、政治、结构上看，主要原因是什么？需要做出什么改变，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活力？经济的下滑可能有着怎样的政治含义，是否会导致政权危机和民主转型的契机？《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以下笔谈。



罗谷（Dexter Roberts，蒙大拿大学莫林和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中国事务主任）：中国政府的传统刺激手段，对其苦苦挣扎的经济似乎正在失去作用。政策制定者可以向市场注入更多现金，2023年12月15日，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8000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净贷款，是预期的两倍；央行可能还会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但这些措施不太可能扭转经济颓势。因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金，而是更重要的、如今十分匮乏的东西：信心。

家庭正经历着信心的崩溃，这与疲软的就业形势有很大关系。今年早些时候，当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0%时，中国政府停止公布这一统计数据，随后又命令分析师停止对经济发表负面言论；显然这是掩耳盗铃：假装问题不存在，问题就会消失。但是，由于年轻人和其他人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作，他们的信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这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深深

担忧中可见一斑。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打击了人们的信心。中国人拥有的公寓约占家庭财富的90%，房价下跌造成了负财富效应（negative wealth effect），打击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多年来信心的下降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挫伤：当人们看到日子不好过时，就不会打开钱包消费。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越来越令人担忧。这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们长期以来的目标——让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不稳定的债务转向更多地依靠家庭消费——不会很快实现。

正如我在*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中文版为《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所写，若实行某些政策改革，有助于刺激信心和消费的激增。例如，改变二元土地制度，让中国农村居民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利；开始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结束数亿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待遇，让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类似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据人口学家蔡昉估计，农民工的平均消费比城市户口的居民少近四分之一，相当于2万亿元（2810亿美元）的消费损失，约占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真准备好废除户口、二元土地制度，或改革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

与此同时，无论是要求更多公司成立党委、迫使企业专注于特定行业或市场，还是以莫须有的腐败罪名将公司老板关进监狱，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倾向于干预商业，这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信心。信心的缺失反映在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急剧下降，2023年上半年下降了0.2%，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却增长了8.1%。现在，许多中国富豪开始用脚投票，跑到其他国家定居并获得国

籍，其中日本和新加坡是首选。

直到最近，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只知道经济在不断发展，并确信他们的生活必然会越来越好。打工者们相信，在工厂、建筑工地或城市街道上从事艰苦而危险的工作最终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为家庭赚取更多的钱。同样，1999年中国修改宪法，承认民营企业家在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民营企业家就认为他们在中国只会受到更多欢迎，可以自由地赚钱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高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场信心危机。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以及中共领导人的信任，仍需密切观察。（滕彪译）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1997年，世人对东亚奇迹一片赞扬声中，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预言，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理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是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话声未落，东亚陷入金融、经济危机。为了理解何为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先理解何为经济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它们分别为1)：增加资本、土地、劳动三大生产要素的投入通常能提高产出，但随着投入量增加，每单位新增投入带来的产出增幅会逐渐减少。2)：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要素质量，降低投入/产出比，使等量投入有更多产出。3)：提高产出也可通过制度变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例如，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向市场体系。第二项和第三项都能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被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将第一项称为通过增加投入获得粗放型的增长。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东亚经济体已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本土科研投入则严重不足。无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获得增长源泉，只能实现粗放型增长。它们偏偏资源贫乏，只能要求民众节衣缩食，增加储蓄，以增加资本投入；却引起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只能高度依赖出口。它们的人口也十分有限，只能鼓励工人加班加点，以增加劳动投入，但工人因此而难以提升人力资本。克鲁格曼看到这些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日趋枯竭，得出危机必将来临的结论。

身处东亚的中国不但成为例外，还获得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原因如下。中国是人口和幅员大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巨量闲置要素加上巨量的外资流入，为中国提供了第一种增长的终极源泉。期间，中国加入WTO，有机会分享世界市场和国外科技知识，使中国得到增长的第二种终极源泉。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转型提供了经济增长的第三种终极源泉。三种源泉一起发力，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

今天，三大源泉日趋枯竭。作为第一源泉，外资流入日趋减少，民营企业丧失信心，不愿投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躺平化，劳动力丧失活力。农地污染，城市土地过度开发，房市空置率上升，农民和农民工受到购买力和户籍的限制，无法成为城市化的天然接盘手。作为第二源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主要依靠抄袭外国科技，本土科研缺乏内生活力，而发达国家已决心切割和中国的高科技合作。从第三源泉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已束之高阁，改用以党代政，架空市场，阻止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面对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枯竭，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自然做出十分悲观的判断。中共一直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面对经济下滑，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这为民主转型提供难得的契机。

史桔（笔名，经济学者，现居澳门）：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三十多年快速增长，并在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中国奇迹。然而，由于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性困境日益严重。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维持了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幻像。但纸毕竟包不住火，随着胡温时代的离去，中国经济增长已成强弩之末。近十余年来，在政治倒退、国进民退、战狼外交、疫情封控以及对民营企业巨头的强力打压下，中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全面性危机。

分析中国经济形势需要用数据说话。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因为去年受疫情影响，基数低，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23年1月一路下滑，到6月份同比已经0%，事实进入通缩状态。从社会零售销售总额看，从4月最高点18.4%，开始同比增速迅速下降，6月的同比增速低至3.1%。综合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0.4%。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看，对去年疫情的反弹，一季度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二季度全部都处在收缩状态。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降幅总体趋于收窄。前三季度，全国PPI比上年同期下降3.1%。有业者说，这是制造业的“至暗时刻”。

以上数据分析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失去了动力。目前中国投资、房地产、外贸出口等几大动力引擎乏力已是不争事实，货币政策作用日渐式微，导致社会消费总量疲软，总体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中国经济的衰退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密不可分，因为中国经济正是因为

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而快速增长。但十余年来，中国的“战狼外交”“引领世界”导致四面树敌，中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使得中国在双方经贸关系上受到极大限制，尤其在高科技等方面受到严重抑制和打击。在国际产业链重组的情况下，大量外企从中国撤资、转场。欧盟本来是中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伙伴，但因为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此所持的立场迥异，从而使欧盟各国家相继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目前的态势是，全球经济体系处于重新构建新的经济“群”时代。从美洲、欧洲、亚洲、印太、中东等地区，都有新的经济体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经济体（如CPTPP）的新规，并不接受中国加入。毫无疑问，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会严重影响今后世界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发展路在何方？我认为需要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政治上改弦易辙走向宪政民主，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建立充分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外交上崇尚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这些改革既不同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也与当今中国的政策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但别无选择。



夏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和史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1989年中共政府对平民的屠杀（包括拉萨三月屠杀、“六四”天安门屠杀和后来在成都等地的开枪和全国大规模处决）成为未来三十年权贵资本主义的起点、基础

和特征。把中国政治经济的形态概括为发展型专制（较好的状态）、市场列宁主义、新权威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中国（共）合股公司、后极权主义、完美专制，或其他任何一种称呼，都离不开它与政

权的高度联姻。它的背后是由国家、进一步讲是由政权力量、具体讲是由刺刀支撑的，而且这把刺刀还滴着鲜血。以此为中心，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合成一个庞大变形金刚。屠杀的心理震撼给政权带来了稳定红利包括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扩展了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了中共寡头一个镀金时代。

但中共与市场体系的部分媾和，打乱和重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撕裂了过去简单化的工农兵板块，并造就出一个日渐庞大的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阶级冲突开始困扰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理论上、试图代表全民利益却无力代表工农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疫情期间滋生的多重危机的困扰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原因何在？

中国经济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还是政治经济，其危机源于结构、政治、政策和领导人。结构性原因首先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政治上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党专制转型到寡头体制最后滑进个人集权独裁，与经济基础产生冲突并出现国家吞噬社会、经济市场的后果。政策失败更是全方位的：户籍制度长期难以废除、政府财政软约束无法终止、国家金融、产业等政策偏向国营企业并歧视掠夺私营企业、对内维稳和对外逞强的先军强兵、反腐成为政治清洗并带来嫉贤妒能和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等等。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蒙代尔三元悖论（Mundellian Trilemma）下选择了经济决策自主、固定货币汇率和资本管制，所以，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外生引发型的几率要远远低于内生型。当下中国的经济危机也主要是内生型的。但由于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误判、拥抱普京的欧亚主义、幻想独立自主、倚重内循环并和美国

及其盟国对立闭门营造“大而全”，造成了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无论是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条的重组，还是印度的崛起、印太战略带动出的印太地区经济繁荣框架以及香料走廊（印度-中东-欧洲）的构想，都在资本、技术、市场和人员流动上排斥中国。这只会使得中国经济规模效应受损、竞争优势降低、产能过剩更加恶化，面临的困难雪上加霜。

这个危机的实质是什么？从危机本身来看，中国遭遇的经济危机是财政约束泛滥、政府滥发货币、地方政府财政依靠土地和房地产泡沫、国家政策银行滥用杠杆、国家信用破产、最高决策者颀颀无能而引发的多重账本危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家庭。随着大面积的个人、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破产，出现债务-通货紧缩的怪圈。类似的危机让日本停滞三十年，日本政府利用国家账本帮助修复企业账本，终于让日本经济看到曙光。2008年金融风暴给美国带来恐慌，美国两党、总统、国会合力动用上万亿美元挽救了银行。但中国中央政府即便在经济顺风时期也滥用赤字财政，到危机降临时又提出中央政府不兜底、“各家孩子各家抱”，以致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快速走出陷阱、或像日本那样最终走出陷阱。中国私营企业、新兴中产家庭将面临金融危机的残酷结果：天量的财富会短时间内化为青烟，但债务永远不会消失。相反，由于资产缩水、信誉破产，利率还会增加，债务必然飙升。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更会伤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铁（路）公（路）机（场）”的基建投资难以收回成本、消除债务。这将是全国的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其社会、道德、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但中国经济危机并非只是习近平集团反动的结果，它也是对反动的反动。从中世纪末期勇敢的哲学家奥卡姆提出“剃刀原则”修理繁琐的经院哲

学，到当代卡尔·波普尔提出了“自由主义剃刀”，代表公民社会、市场体系的自由民主学说，从未停止过对专制思想和治理体系的削弱、消解。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重归毛主义，寡头集团暴发户倒行逆施，带来了国际资本和国内私营资本的反应和回击，逃资走资、脱钩、去风险就是结果。当年邓重启改革开放就是要放低党国的身段，向资本、企业家鞠躬，从而获得提升国民经济的机会。而习“平视世界”的傲慢和对资本的迫害，让中国进入了去投资的新时代——2023年中国首次出现了25年来的外资赤字。

中国有可能摆脱这种危机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吗？这必须看中国国家政权内部、社会各阶层如何反应，自由主义的剃刀能否成功逼迫党国刺刀的投降。如果习近平的专断能够被终止、自由民主宪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信誉能够得到建立，中国经济还会有新的生机。否则，超稳定的新极权体制可能让中国人发展的机遇转瞬即逝，并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翻车的国家随处可见。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后遭遇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至今还未逃离陷阱。当然，千年停滞、文明死亡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盖思德（Roger Garside，前英国外交官，《中国政变》作者，本刊顾问）：“在一个国家中，当社会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但政治体系却迟迟不作出相应调整时，革命就孕育而生了。”戈德斯通在《革命简论》（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的话，正是现今中国的写照。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深刻，但政改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环境和结构的变化。政治体系并没有“相应地”做出适当反应，相反，为了防止政治变革，当局停

止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这种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协调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动摇了自1978年以来维系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种社会契约，即“我接受你的统治，但作为交换，我要经济上的繁荣”。如今，这种契约似乎已失效。

更严重的是，这种全面而强大的政治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弊端，表现在经济、道德、社会、宗教和环境等诸多方面；而且，中共显然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无能侵蚀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虽然中共仍在政治上继续控制国家。共产党的合法性本来就是建立在政绩绩效上，而非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社会状态正从稳定的均衡状态转变为不稳定。戈德斯通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微小的混乱也可能触发更大的动荡，甚至推翻现有政权。这种转变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家庭将 70% 以上的积蓄投资于房地产，现在却遭受了灾难性的资本损失；20% 的城市青年失业，更多的人选择了“躺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以至于国内维稳开支超过了对外防御。

回顾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对外界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多重挑战。当时，此番言论在海外中国专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困惑和讨论。他所列举的经济问题，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并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温的警告现在被广泛接受为完全合理的。

在拙著《中国政变：自由的大飞跃》中，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想强调，触发革命的最有可能的途径，恰恰是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崩溃并非周期性波动，且没有复苏的迹象。地方政府一直从土地出让中获得40%的收入，现在这一部分收入的丧失导致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陷入破产状态。朱利安·加兰（Julien Garran, *Wickssell's Revenge*, 2023）揭示了令人担忧的现实：中央政府无力挽救这些地方政府，因为问题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他估计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另外，政府也无法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这一危机，因为这将严重削弱人民币的价值。

目前，地方政府正依赖庞氏骗局来维持运营。一旦这些方案不再可行，地方政府将不得不裁员、关闭服务和终止基础设施项目；对持债人违约；银行存款者将损失存款；地方政府融资产品的投资者将面临资本损失；依赖地方政府融资的企业将倒闭，失业率将大幅上升。失去存款的人们、损失资本的投资者、失业工人将陷入绝望，愤怒的情绪将滋生动荡。甚至军警和安全部门也可能因为失去积蓄而失去抵抗意志。

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容忍专制体制的人民，将不会容忍一个使其重回贫穷的体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长期认同温家宝观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既得利益精英将意识到，若要保护他们剩余的财富和权力，若要拯救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领导一场政治革命。他们将动员愤怒的民众推动体制变革：引领一场政治革命，号召以自由媒体来问责政府、以独立司法来捍卫人权，并确保军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而非某个政党。（余浩风译）



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系主任、讲座教授）：中共把中国作为“举国大公司”管理。中共是管理层，总书记是总裁。各个部委是职能部门，如国安部取得经济情报，统战部争取外资、延揽人才。宣传部是公关部。中国所有企业，或是它的部门（国企），或是合营公司（私企）、加盟店（外企）。和中共关系越近（国企），特权越多、自主权越少。反之亦然（外企）。

老百姓就是举国公司雇员，不得批评总裁，不得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形同内部流通券），不能自由迁徙。他们的居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司的宿舍，没有完整的产权。

举国公司的战略（中国产业政策）是：首先确定国家优先发展行业，然后把这些行业保护起来不让外资竞争，扶植本地公司，国家帮助他们取得技术，然后运用举国之力，快速发展这些行业。中国市场大，本地公司可以很快的取得经济规模和成本优势。一旦技术成熟，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国家就鼓励它们走向世界，成为这个行业最大供应商。在这个战略下，“举国大公司”在汽车电池、太阳能发电和高铁等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

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管理，有很多优势：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中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灵活、反应迅速；在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中，中国的企业又可以像政府一样，有巨大的资源和国家情报机构支持。

在应对宏观经济变化时，举国大公司的特点是权力集中在最高层（总书记）使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有效地动员所有资源、单位和人民。如果说

这是它的优势，那么它以下弱点。首先，采取积极或保守政策完全取决于CEO的偏好，以及他如何确定举国公司不同部门的优先——总部（党中央）、下属单位（地方和公司）或员工（老百姓）。在2008年经济衰退时，中共优先考虑支持地方和老百姓，因此向经济注入了4万亿元人民币（6660亿美元）。在2023年经济衰退时，习政府对向地方、企业和人民提供刺激措施没有兴趣，而是把保护总部（即党国政府）放在首位，这从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求“稳”中看出。

其次，在这高度集权组织中，下级必须揣摩高层意图，才敢提出解决方案。在不了解总书记倾向情况下，下层提议很有可能触礁，而这将使他们失去多年积累的级别待遇，甚至入狱。故没有顶层明确指示，鲜有人献计。

另一方面，一旦顶层表明意向，下面会将其逐级放大，变成政策海啸，导致过度措施。这时候总书记很少表态。因此，举国公司对新情况找解决方案低效，因为这需要不同方案竞争，而这正是集权缺乏的。比如在处理新冠病毒危机上，由于最高领导层决策错误，导致了三年清零封城，造成经济衰退和举国公司各级从上到下信心丧失。而现在面对经济衰退，最高层的反应和一个公司相似：首先保护公司总部，将公司（政府）负债和支出保持较低水平，号召员工（中国居民）共度难关，但不肯“放水”帮助地方和企业以及员工。这样很难让人们恢复信心。

乔山（笔名，中国大陆经济学者）：未来中国，经济长期衰退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是大概率事件。然而，即使经济危机为中国体制转型带来契机，民主转型也仅仅是四种政治可能之一。经济危机时期，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野蛮生长，四种政治力量可能迅速崛起：

第一种、改开派

近年来被边缘化的改开派，会把经济危机归咎于官方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由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历史性改善和提高，回归改开路线，在官僚集团和民间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一旦政治高压松动，体制内具有改开思想的官员和其他社会精英，很容易从隐蔽变公开，迅速成为有组织、有纲领、并能应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力量。

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原教旨

他们会把经济危机归咎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归咎于资本家的剥削和西方阴谋。由于中共70多年来的灌输，这种主张很容易在经济危机中的生活窘迫人群中产生共鸣和认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危机和思想论战中，“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等原教旨大本营，都展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力。

第三种、极端民族主义

在独裁者继续执政的情况下，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会成为转移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危机的首选。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官方刻意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具有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国家统一和抵御西方封锁为借口，可以轻易实行战时经济、配给制和各种经济管制，保障战争机器运转，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从而转嫁或消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第四种、民主力量

在经济危机中，希望通过废止极权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方式解决经济危机的政治力量，也必然蓬勃兴起。

可以想见，在经济危机伊始，由于路径依赖，由于民众的直接诉求是民生而不是民主，由于民主力量的政治动员能力成长速度远低于其他政治力量，民主转型会成为以上四种政治可能中非常靠后的选项。这并非是对中国民主转型表示悲观，而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与西方的经济危机不同，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极权体制引发的社会总危机，极权不除，民主不立，这种经济危机无法消除。

但是，这种民主转型的必然性，只有在其他政治可能碰壁时，才能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这就要求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要更多地致力于对于极权体制的批判，致力于对极权体制与经济危机因果关系的揭示，致力于对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关切，致力于政治动员能力的建立。

如是，民主转型将在以上四种政治可能中最终胜出。

当代问题

张崑 | 作者张崑系中国历史学者，曾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HESS) 历史学博士学位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民主的中国 化与中国的 民主化（上）

摘要：近代中国走出帝制，国号由帝到民，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民主政治随之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目标。然而，西方民主一进入中国，就随着当时思想界风气化潮流而成为一种风气，在本地化中脱离了本来面目，在这条歧途上，从孙中山的“人民来做皇帝”开始，到中共以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领导人民”、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为人民服务”而化身人民，民主在中国化过程中被步步扭曲，直至走向严苛的专制。本文试图反思这一扭曲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为未来的矫正做出准备。

1. 问题的提出

1978年4月10日，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借通信双方的口，反思为什么青年们有着最崇高的理想，带着最美好的动机和全部热情投入实践，却总是换来最坏的结果？“青年”的疑问不是空穴来风，此前的2月26日，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称，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¹这封《复信》一度激怒了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而其作者，实际为当时掌控党国意识形态中枢的胡耀邦。可以说，最深层的冲突已经达到了党国最高层。到毛时代末期，全体中国人付出了最大的热情，但换来的结果是经济上“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上几亿人受到政治迫害或牵连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极端的反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党国最高层的反思，不是没有后果的。同样在4月10日，刚刚受胡耀邦委派到《光明日报》任主编的杨西光在一份大样上看到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²5个月前，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干部培训班上曾提出“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

胡福明的文章后来被改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显然唯有胡耀邦才能决定如此大的手笔。胡耀邦在意识形态上对党国的这一“松绑”，既为后来中共对内放开、对外开放去除了理论枷锁，又为中共以“改革”之名向民间抗争让步的同时不至于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留出了余地，成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时代的内在转折点。

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长足增长，甚至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一。然而，经济上的成功没有让中国更加民主，反而得以更有资本实施专政。至少在国际社会看来，恢复自信的中国离“民主”正越来越远。且不说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民为贵”的思想就进入了政治领域，自一百多年前走出帝制以来，中国人无论朝野不可谓不热爱民主，从五四时期以来，“民主与科学”激励过一代又一代国人。何以一代代既珍惜传统“民为贵”、又热爱现代“德先生”（民主）的中国人最终只能受制于专制（专政）呢？

2. 近代中国“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古典中国“人”、“民”两分结构

1) 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从天命君权到人民主权

现代民主被以“德先生”的名义引入中国，是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过程，也是与中国人一起构建出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

1911年，清帝国在一次偶然兵变中崩溃，中国由此告别帝国时代，进入民国时代。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国玺上由“帝”到“民”的变化，暗示出政权正当性来源的微妙转变：从来自于“天命”转移到来自

于“民”。

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大转变，是否可以看作中国近代“民主”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对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孙中山同样阐释为民主思潮进入中国的结果：“……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³

那么，民国仿效西方，是否学到了真正的“民主”？孙中山解释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民国建立以后，“民”的合法性很快成为共识。1915年时任民国总统袁世凯称“帝”，试图恢复帝制，引发举国讨伐，在很短的时间内失败，“民”的最高合法性愈发不容置疑。问题的焦点，就转变到“民”与“民”之间如何建立起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治上。

“个体”是“现代”的标志，但“个体”之间如何重新结合在一起形成“现代社会”，却是“现代”独有的难题。在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呼吁人们脱离不成熟的依附状态、独立于各种权威，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与过去人们通过包括血亲关系等种种社会结构相互依附、组成等级社会

不同，现代社会没有谁是他人的附庸，那么，独立的个体之间如何结合，对任何一个刚刚触及“现代”的社会来说，均是全新的挑战。

2) 从傅斯年的“散沙社会”到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2月1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以一篇题为《社会——群众》的文章，区分了“社会”和“群众”。傅斯年认为，“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在傅斯年眼中，“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⁴也即是说，“社会”应该是有良好的组织、人们的需求相互衔得上，如有机体一般相互协调、有序运行的。但是“群众”却只是“散沙”，这些个体，既缺乏组织，又没有责任感。

其实，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没有“组织”，只是，那些家族、宗族、乡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是通过依附权威形成的等级社会组织，正是欧洲启蒙所排斥的，自然不是傅斯年这些新潮青年们所希求的现代社会，正相反，是被他们看作阻碍了中国现代化、需要淘汰掉的旧社会。所以，尽管抱怨群众如“散沙”，其实傅斯年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不管其本意如何，还是在将已有“社会”推向散沙般的“群众”。

这个问题既然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在阐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时指出，人们追求“身份平等”是如本能一般的“源发性事实”，在整个基督教欧洲的历史中从未间断，显示出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之势。⁵在这个历史进程

中，个体之间摆脱彼此之前的依附、相互疏离，是人们要求“身份平等”的结果，因此这种散沙化趋势，乃属必然。如傅斯年那样抱怨群众如“散沙”、或试图阻止散沙化趋势，都是徒劳的。真正的着力点，应该是如何把如“散沙”般严格平等的民众，在自由商议、自由同意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这是真正要追求的人与人相结合的艺术。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指出的：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结合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身份平等的速度相同。⁶

一边是人们如本能一般追求“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另一边是与人们“身份平等”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处理相结合的艺术”。

如果说，有着从“帝”到“民”的大转折的民国的出现，乃至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均大大推动了“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的话，此时的中国，缺乏的正是在新形势下人们“处理相结合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傅斯年的“散沙论”确实精准诊断了时代的问题，也因此，他一度站在了时代潮头。

1919年，不满26岁的毛泽东写道，⁷“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在这样的时候，他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补救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联合民众？当时，毛泽东写下的办法是“齐声一呼”、“大呼”或“起而一呼”，可想而

知，单凭呼喊，怎么可能建构民众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其时，呼喊的，不只是毛泽东，1922年，鲁迅将其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就取名为《呐喊》。可见，那时，不管是谁，要想联合民众，抑或改进散沙般的现实社会，主要还是靠“喊”，除此之外，尚无良方。

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下，西方的各种冠以“主义”的现代思潮，作为“人与相互结合的艺术”，有了在中国发展的空间。

3) 传统中国“人”、“民”两分结构的演变：从“庶人不议”到“匹夫有责”

外来思潮要在中国生根成长，总需要本土做好接受准备。20世纪初，中国自身的“民主”思想，经历近三千年的发展，正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面貌激发着国人的热情。

传统中国，“人”、“民”本是两个不同的身份。正如针对《诗·大雅·假乐》中“宜民宜人”一句，毛亨传解释说“宜安民，宜官人也”。朱熹则注以“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也就是说，“民”指的是平民，相对的，“人”指的是统治者或贵族。朱熹所指出的“民”与“人”的分化，正是在遥远的《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最初，“天生蒸民（《诗·蒸民》）”：所有的“民”都生在自然淳朴的状态之下。后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大明》）”，能获得自天而降的“天命”的，将从“民”中分化出来，承担起管理天下公共事务的责任。自此，获得“天命”的成为“人”。“人”处于已经获得教化的社会之中，而“民”由于没有获得“天命”，则始终滞留在大自然之中，如动物那样作为“类成员”⁸存在：任何一个“民”的生命没有意义，只有种群的延续有意义。正因此，所有体现“人”之生命贵重

的成语，诸如“人命关天”、“草菅人命”都是与“民”无缘的，“民”似乎天生就是生活“于水火”之中的草民、贱民，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对“民”来说，最大的事务是“民以食为天”，被限定在追求满足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

然而，平民追求“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却从未中断过，从先秦时代的“诸侯争霸”、“大夫收公利”、“陪臣执国命”，一个又一个低社会阶层拼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陈胜、吴广起义更是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响彻时空。只是那时，陈胜、吴广还并不追求凭借平民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如今天的“民主”那样），而是希望改变身份，成为“王侯将相”再去参与公共事务。到了汉代，没有贵族血缘的平民也得以通过官僚选举制度有限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人”。结果，“天人合一”还是“天君合一”⁹的“人、君矛盾”一度成为困扰整个汉代挥之不去的统治集团魔咒。到了宋代，新儒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方式，让作为“人”的士大夫集团与作为“君”的天子共担天下，从而调和了“人、君矛盾”这一千年困扰，“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再次迈出一大步。自那以后，中国社会官民两分的结构就基本定型了。

明代王守仁认为良知即天理，此心纯乎天理，即可为圣人。以此类推，平民也可能成为圣人，这为后世平民承担天下责任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最终，在17世纪，顾炎武提出：平民也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梁启超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前夜所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¹⁰顾炎武的提议回应了平民上千年来在“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中孜孜以求的目标，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进而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识。

至此，儒家在平民参与公共事务问题上，走完了它的全程：从先秦“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把平民完全排除到公共事务之外，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公共空间将平民完全接纳。于是，“人”、“民”终于合二为一成为“人民”，即便在中国传统自身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最高合法性。

3. 有权利的公民还是有责无权的匹夫？现代“民主”中国化的起点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构建起于公民的“权利”，英、美、法等国无不由这一关键环节而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1689年，在光荣革命之后登基的英王威廉三世签署《权利法案》（《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正式生效。那么，这些“权利”指的是什么？

美国的建国文献《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着汉密尔顿1788年写下的这么一段话：

有人曾多次正确指明：人权法案就其来源而论，乃君主与臣属间的规定，用以削减君权、扩大臣属特权，保留不拟交付君主行使的权利。英国贵族在武力逼迫下获得英王约翰同意的“大宪章”就是如此，大宪章嗣后为历届英王所确认亦然。为英王查理一世即位之初所承认的“权利请愿书”亦然。同样，1688年上院与下院呈递奥兰治亲王的“权利宣言”，嗣后成为国会的一项立法，称为“人权法案”者亦然。¹¹

可见，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法国的权利宣言，其性质，都是主权者与公民

之间的法律契约。在西方中世纪初期，教父圣奥古斯丁引用《圣经·旧约·诗篇》中的话“神的律法就进入了他的心中”，建立了基督教传统中最初的“权利（droit）”观念：神的律法（loi）是人不可测知的，但是神的律法（loi）到了人的心中，就成为权利（droit），人们就可以学习、掌握和运用了。就像人们去法（droit）学院学的是权利（droit）而非律法（loi）。所以，“权利（droit）”就是人心中所理解的神圣律法（loi）。

弗朗西斯·夏图雷诺（Francis Chateauraynaud）曾将公共政治领域的交往行为分成三个类型：承诺、委托和契约。¹²“承诺”常见于传统等级社会，拥有权威的父亲或者君王有责任向他的附庸做出承诺，如果承诺不能兑现，毫无疑问将损害他的权威，但是并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委托则是现代社会独有的，拥有权利的公民将部分权利委托给民意代表，建立代议制政府，后者是现代社会最稳定的政府形式之一。而契约则体现为最为理想的基于“从个别到一般”的“社会契约”的民主政治。在现实社会中，总是同时存在承诺、委托和契约三种类型。文明的进步往往体现在把某种承诺或委托类型发展转变为契约类型，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类转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自新文化运动以降，“民主与科学”就是最响亮与持久的口号之一。在追求“民主”的问题上，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人的真诚。唯一的问题是，西方的现代民主，奠基于每个人的“权利”，而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追求民主的时候，压倒性的觉醒意识，却是每个人的“责任”：匹夫有责。

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一切社会现实，都是基于个体责任，而非个人权利。这至少是中西追求现代民主之路的岔道口。

4. 从“匹夫有责”的思想到“群众运动”的现实

在中国传统中，平民终于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共识，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性、却又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去参与的时候，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这些平民运动以混乱告终以后、在从“民”倒退到“帝”已经绝不被国人容忍以后，在这一全体国民彷徨迷惑、新的民国政权还在混乱中摸索的紧要历史关头，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¹³一套看似有着完整的从理论到方法的、关于平民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了这个真空地带，击中了历史的要害。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使得平民承担公共责任有了双重正当性：来自中国传统的和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从俄国革命引进的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实现共产主义”为主干的共产党纲领，简直如一本平民如何承担天下责任的指导手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平民持续三千年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不懈追求一拍即可。

新文化运动时期本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新思潮争相斗艳，但唯有能呼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有着数千年根基的历史诉求的新思潮，才具有与当时中国现实充分结合的潜力。

1919年毛泽东公开呼唤的“民众的大联合”，并没有呼之即来。尝试联合民众的也不止毛泽东一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那时，唯一翻译成中文的“理论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它教会了

中国共产党人用阶级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以暴力斗争解决问题。1922年6月，中共党员澎湃在家乡广东海丰展开农民运动，组建农民协会，暴力反抗地主和官厅，大开杀戒，最终同样被当局暴力镇压。

实际上，联合民众的第一步，是从身份建构开始的。当时，“农民”不是一种职业。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那些尚未进入城市化、工业化与职业化等现代化进程的平民，自然而然就只能是“农民”。只是，与其说“农民”是一种尚未现代化的“身份”，不如说是一种从未有过身份建构的“非身份”。这种“非身份”状态意味着，针对这一群体的任何身份建构，都可以引起极大的响应。

1925年12月，在署名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作者第一句话就抛出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并强调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什么？不难理解，区分敌我，通过找到“敌人”来确立“我们”，是以否定的方式确立“我们”的身份，是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没有相互间的身份认同，相互联合就缺乏共同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毛根据他所学到的“共产主义理论”，将“我们”的领导力量定位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朋友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动摇不定的是“中产阶级”，“我们的敌人”则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¹⁴

完成了身份建构，就界定了谁是“我们”。而后，要在“我们”之间实现联合。由于“我们”实为中下层平民。传统中国，社会中上层具有参与公

共事务的经验，掌握有一定的“相结合的艺术”。中下层平民恰恰是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因着“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刚刚有“匹夫有责”的观念，尚处于有意愿、无经验的状态，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必然带来混乱、甚至暴虐。因此，在社会中下层平民之间找到联合的方法，有着历史的紧迫性。

1926年，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统一中国，¹⁵中国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以广东为基地，向北进攻。此时正处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借机发展农民协会，迅速扩张势力。国民革命军首先攻打的湖南，很快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达到200万，能动员起来的群众超过1000万，这是中共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然而，动员起来的农民转眼就成了暴民，运动旋即就失控成为“痞子运动”，遭到全国上下舆论的一致谴责，包括中共高层也对湖南农民运动持极为负面的看法。在一片混乱中，毛泽东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农民运动如果不过分、不暴虐，就制造不出敌人来。制造出敌人，是用否定的方式界定“我们”。以前中共尽管自称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但工人阶级并不买账，用这种肯定的方式，总是建构不起“我们”。而今，毛泽东发现了暴力的妙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¹⁶

于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大规模成功构建起“我们”的身份认同同时，暴力，就被建构于其中。当时，国民党为寻求统一，不惜以暴力方

式北伐；共产党为寻求组织起民众，也不惜诉诸暴力，但却无法控制，不被党内主流看好。而毛泽东看到的，是此时虽然无法控制暴民，但毕竟在组织民众上，向前走了一步。国民党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不是一样使用暴力吗？如果共产党以组织民众为目标，使用暴力又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吗？在这个国共两党都不介意使用暴力的氛围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敢于理直气壮地赞扬暴力。

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毛泽东来说，能否控制住民众——那些动员起来并实现身份建构的民众——成了关键问题。终于，1933年，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动员中，首次品尝到可控的“民众联合”的威力。“查田运动”在中共建立了武装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中进行，有了暴力武装的保障，群众斗争就变得可控。毛欢呼这是“伟大的胜利”，确实，这是他第一次成功组织起“群众运动”——他曾经梦想的“民众的大联合”——，为他后来风生水起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在武装政权暴力胁迫下的群众运动，给群众的压力稍有减轻，运动效果就必然迅速降低，因此需要长期保持高压状态；另一方面，能动员起来的主要还是流氓无产者，难以动员社会精英阶层。这两个难题，都呼唤意识形态的帮助，但当时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尚不能与这两个现实问题——所谓中国共产革命的实际情况——衔接上。要等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本地化”的名义，发展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共才有了应对之策，并具有了动员精英阶层参与群众运动的能力。

同时，组织群众的艺术还没有发展成型，“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¹⁷

可见，此时，即便好不容易把群众召集起来，却往往被别的政治势力操纵，自己反而抢不到领导地位。毛口中的“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包括各种左右不同思潮的理论家或实践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后来压制不同思潮的杀手锏，正是毛在对抗“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中发现的，这就是：控制住决定人们生死的“伙食”。

1930年代，中共在其武装斗争中，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发展出一种基于“伙食单位”的军事组织方式。在中共武装革命早期，军费匮乏，难以保证作战部队的需要。¹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共渐渐摸索出以“伙食单位”为基本组织单位的供给制度；同时，这种控制伙食的供给制度的完善，又为后来的操纵群众，提供了可能。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美国汉学家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m）注意到了毛当时的经典性论述：“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施拉姆的英文著作中，“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被翻译成“Chinese style and manner”；¹⁹与此类似，中国官方法语版的翻译是：“(Pour faire place) à un air et à un style chinois”。²⁰由于这种翻译的原因，“风”和“气”这两个有着特定历史和内涵的儒家术语在西方读者的眼中就此消失不见了。而“风”和“气”两个概念，又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害所在。

也是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²¹。孔夫子的儒学，在与其他外来或本土的思想流派经过上千年竞争、冲突与融合之后，在清初由王夫之以“气

论”调和了儒释道三大精华。正是经由王夫之的“气论”，²²“气”这一古老的中国概念才具备了地域或民族特性，才可能有“中国气派”和“他国气派”的区分，毛泽东也才可能使用“中国气派”一词。承接“气论”之后，毛泽东在“风”（气的运动）上狠下功夫，发明了“党风”，并以“作风”、“学风”、“文风”等等诸多“风”，推动“整风”运动，以中国传统的“风气之论”消化了所谓的马列主义理论。实际上，这种“风气化”的中国化方法，绝非毛泽东的发明。

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潮，都是作为一种“风气”进入中国的，连“民主”进入中国，也成了“民主风气”，而不再是“民主”本身。

1940年代初，毛泽东将中国传统的三世历史观与斯大林五阶段社会论比附之后，借助风气之论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进一步，为了使之成为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毛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后者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正是以“伙食单位”为单位开展起来的。²³此后，群众运动得以通过伙食控制，逐步进入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每一个群众运动的单位中，都有群众、干部、模范、先进、榜样、典型等角色，当然，还有超越单位的意识形态领袖。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目标的达成，都是以树立榜样、领袖号召、干部动员、组织群众向榜样学习等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个体从远近亲疏有序的家族血缘等级关系中脱离出来，重新进入“单位”这种个体有责无权的等级结构中，得以在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下，以“拥护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同时，这种专为群众运动而生的单位，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推广到全国，成为社会基本单元。到1950年代“统购统销”之后，任何人离开

自己所属的“单位”，连一粒米都找不到，完全无法生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迫全党重开八大，通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凌驾于全党之上，“人民来做皇帝”的“民主政治”终于蜕变成了“毛主席来做皇帝”。尽管对外界来说，毛随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体现了极端专制。但对通过意识形态化身“人民”的毛泽东来说，这未尝不是五四时期“民主”理想的实现，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更是将毛式群众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毛死后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在第四十五条再次确认了它们。即便在寡头共治取代一人集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元老们对毛的抱怨也仅仅是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让党内的民主风气荡然无存。可见，无论是毛还是他的政治对手，都自诩是民主的捍卫者的。

面对这令人唏嘘的现实，不免让我们想起1945年国民参政员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民主”话题的著名的“窑洞对”。根据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记载，²⁴当时他对毛泽东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溥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

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办法，“人人起来负责”，还是源自“匹夫有责”，由于没有考虑“权利”，实质是人人有责无权。基于此，就像前文回顾的从“匹夫有责”建构出“群众运动”那样，即便有建立“民主”的初心，也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因为首先就没有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可以委托出去实现代议民主形式。可以说，毛理解的民主，没有超出“家长制”的传统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对“家”负有无限责任，却因为彼此依附而没有平等权利可言，家长向成员们承诺幸福，成员们寄望家长履行诺言、维护（以“民望”衡量的）权威，即使家长不能履行承诺，家长仍然是家长，他失去的是威望、是“民望”，而不是家长身份，不会如代议制的代表那样因人们收回委托而下台。显然，如此这般建立的“民主”，与真正的民主相比，更接近家长独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中国化”了的所谓“民主”，又确实是继承了孙中山“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来做皇帝”式的家、国、天下结构下的关于“民主”的理解。结果，正如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做的那样，一旦他能领导“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了，毛自己就成了人民的化身，毛“当家作主”就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虽然毛泽东文革中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方式备受党组织诟病，但毛死后中共改变了的只是动员方式，而并没有改变

拘囿于传统家、国、天下结构的对“民主”的理解。至今，被如此这般扭曲了的“民主”，仍然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名义继续。

小结

从“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开始，仅仅30多年后，中国就建成了如假包换的高度专制的政权，且自称“人民当家作主”。显然，经过这样“中国化”之后的“民主”，绝不会是中国人的初衷。

与西方相比，同样基于“个体”，西方从作为“有限责任”的“逐利的个体”的市民开始，沿着从对利益的承认到保障财产权等诸权利，市民变成了公民，并通过委托部分个人权利而构建出代议制民主制度；而中国，个体是对“天下兴亡”具有无限责任的“匹夫”，是有责无权的“群众”。西方的“有限责任”思想进入经济领域，造就了现代经济的繁荣，同样，进入战略领域，也成为美国维持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石。

如同有限/无限的概念系于“群众”概念一样，在近代中国追求民主的过程中，“群众”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要素，起于散沙般的群众，终于被“群众运动”组织起来的群众，他们没有个人权利可以委托，也无从通过委托权利建立起代议制民主这一民主的典范型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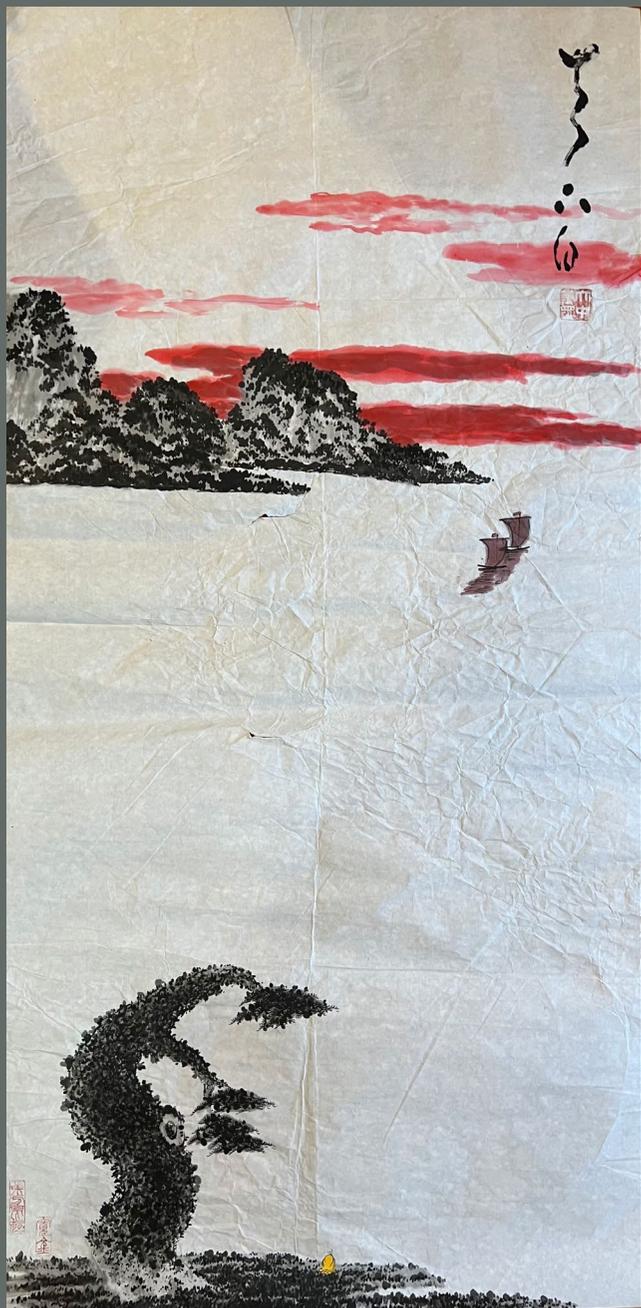
如果不是把群众贬低为有责无权的个体，那么，中共也不会自认为实现了民主。要纠正从“群众”开始的一系列扭曲，终究要回到“群众”概念上，从这样一种个体观念上重建“权利”。

所幸，中国人在经历了毛时代的狂热之后，在被迫转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利的个体”出现了，随之带来了作为所有权利基础的“财产权”观念、有限责任的经济主体等，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众”的面貌，凭借这一进展，中国在后毛时代搭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顺风车，那么，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抓住这一机遇，未来搭上政治现代化的顺风车呢？

注释

- 1 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第一版。
- 2 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8期。
- 3 孙中山：《三民主义》，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 4 傅斯年：《社会——群众》，载于《新潮》，1919年2月1日。
- 5 皮埃尔·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崇明、倪玉珍（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57-58页。
- 6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II*, Paris, Gallimard, 1961, p. 159.
- 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载《湘江评论》第二期，1919年7月21日。
- 8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83页。
- 9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3页。
- 10 梁启超：《痛定罪言》，载《饮冰室合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 11 Hamilton Alexander, Madison James et Jay John, *The Federalist Papers*,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14, p. 419-420. 中文翻译出自商务版中译本。
- 12 Francis Chateauraynaud, *La contrainte argumentative. Les formes de l'argumentation entre cadres délibératifs et puissances d'expression politiques*,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XLV-136 | 2007.
- 1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 15 1926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中说：“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op. cit., 第17页。

- 17 *Ibid.*, 第 72 页。
- 18 *Ibid.*, 第 64- 65 页。
- 19 Stuart Reynolds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Lond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l. «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publications », 1989, p. 70.
- 20 Tse-Toung Mao, *Oeuvres choisies de Mao Tsé-Toung, tome II*, Pékin,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67, p. 226.
- 2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34 页。
- 22 毛泽东与王夫之是湖南同乡。毛早年不仅是研究和传播王夫之学说的“船山学社”的会员, 甚至还利用船山学社旧址在 1921 年 9 月同何叔衡等人共同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 23 参见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03 页。
- 24 黄炎培: 《延安归来》, 华中: 新华出版社,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第 34-35 页。



当代问题

王柯

作者王柯为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文化学研究中心客座高级研究员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 载体和共犯关系 ——以新疆的汉人 社会为例

摘要：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行为并不仅仅是洗脑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社会边缘人群自己的选择。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社会边缘人最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边缘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手段。尤其在当代中国，作为操纵民众手段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政权敢于在一定程度上向民众开放的唯一的公共空间，所以生活于社会底层、苦于被剥夺了社会流动机会的边缘人，就更加希望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但社会边缘人却无法意识到其中的二律背反的逻辑关系：他们为了摆脱边缘人的社会地位而配合当局的民族主义的行为，只会促使当局为了生产更多的社会边缘人而制造更多的社会不平等。

序言

2023年7月28日晚，在成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当局终于给了小人物们一次得以在独裁者面前通过民族主义来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安排，轮到日、美、韩三国运动员出场时，提前8小时按大学集体入座、刚刚还在山呼海吼的大学生们却突然变得燕雀无声，很多人笑喻说这是“安静如鸡”。¹大家都以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喜欢日美韩的习近平在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小人物们明白，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给可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各路人等说“我很听话”和“我很能干”的机会。

这些年来，许多人一有机会就会通过民族主义的表演来表现自己。2022年8月佩洛西到台湾“窜访”、却没能看到中共军队做出一些实质动作之后，小粉红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公开饱含眼泪抽自己脸的视频。到了2023年1月下旬，我们又看到更多的中国青年纷纷抽脸的报道。但这次，他们不是

抽自己的脸。当时，由张艺谋执导、描述岳飞死后岳家军残部筹划刺杀秦桧的历史悬疑喜剧片《满江红》上映了。尽管剧情纯属虚构，但在大陆官媒的民族主义鼓吹下，不仅电影票房不菲，还引起了一场怀念民族英雄和痛打“卖国汉奸”的热潮。在岳飞故乡的岳庙前，有人铿锵有力地背诵传说由岳飞所做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在某个传说与岳飞有关的地点，为抽打秦桧雕像的人们撸起袖子排起了长队。其实，打“秦桧”不过是当地的一种传统习俗，寓意祈福消灾；在大疫尚未完全过去时人们热衷于此，更是无需过度解读。而岳飞庙前背诵“满江红”也是汤阴县官方借电影而想出的一个促进旅游的手法：只要能够背出即可免费游览岳庙。虽然在官媒的笔下，这些事实能够被绘声绘色地描述成在习近平时代中国人越来越爱国的表现；但很清楚，影视界、政府、官媒与民众之所以缠纠于“满江红”，其实各有目的。在民族主义的招牌之下，他们却可以合演一场对谁都有实际利益的大戏。

影视界看穿了一个事实：鼓吹民族主义可以讨好当局，进而大发横财。大量官僚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转移到海外，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作为个人的中共官僚也不可能是民族利益至上主义者。其实，出于政治目的、为攫取统治正当性，中共对“民族”的解释一向都是任意的。因为岳飞要吃的“胡虏肉”、要喝的“匈奴血”都是女真人的，而女真的后代满族现在又被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2003年中国教育部编写的‘中学历史课教学指导’，曾经一度把岳飞和文天祥等人剔除出了“民族英雄”的行列。但是在2015年，由于习近平提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号召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岳飞又被当局拿回到民族英雄的行列中。

当今的中共政权之所以鼓励宣传民族英雄，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利用民族主义操纵民众，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但是，只要看到以下数字，就会知道中国的民众也不是一个视国家民族为绝对价值的群体。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1984年时在日本的中国人和台湾人合计只有67895人，²而在2022年时不包括台湾的中国人就已经达到了761563人，³其中还不包括取得了日本国籍和偷渡者。至2021年以各种方法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已经达到238万人之多，⁴而最近几年“润”到美国的人数也在急剧增加，2023年1-9月就有22148名中国人通过墨西哥边界进入美国，是去年同期的13倍。⁵

但问题是，在中国的确有很多人热衷于民族主义。如果说这是因为长期被洗脑，已经变成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那么就无法解释佩洛西访台之后小粉红们只能在视频中自己抽脸的现象，因为即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民族耻辱时，也没有看到他们中间有人走上街头向政府和军方提出抗议。如果说这些人只是为了贪图一些个人的蝇头小利而迎合民族主义，似乎也无法解释，中国社会中何以能够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迅速汇聚出巨大的民族主义阵势。笔者认为，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结构上的原因，才使很多并没有身处战争环境中的中国民众成为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载体。

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表现得尤其激烈，与中国有着庞大的民族主义载体直接相关。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的中国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给民族主义推波助澜呢？在此，我想以自己常年生活过、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的地区——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来对此问题作一分析。

1、边城小镇塔什库尔干的汉人们的爱国主义

这是一段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录像。2022年夏季，一个美国女青年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新疆喀什地区的一个边境县城）里骑行，记录下了街上的汉人们与她的几段对话。

“中国好不好？”——“好，好的。”

“这是哪个国家的小美女？英国的吗？美国的吗？”——“美国的。”

“美国的拜登坏得很嘛，我们中国现在要把他收拾掉了。”——“你们要收拾他啊。”

“我们中国有四亿退役军人，我们都是退役军人，打仗了，要把他干掉。拜登他妈的坏得很，拜登不是他妈的全世界放毒嘛。”“你要到中国来，到这里成家立业，美国不能呆了。”“普京已经在发话了，他要把美国灭了。”

之后她来到了一家她所熟悉的饭店，惊讶地发现，饭店凳子的凳面竟然全是美国国旗。

“你看这些椅子，我的天啊，这是一面美国国旗！”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是他们喜欢美国吧？”

“它的意思是：我们要把美国坐在我们的屁股底下。”——“那好，加油吧。”

令这位美国女青年感到有趣的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塔吉克人占80%以上的边境小城镇上的汉人们，包括她所熟悉的中国内地来这里开饭馆的“小王”在内，都会热衷于以各种手段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其实，正是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的汉人，他们才更热衷于表现自己具有爱国热情。这

是来自以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价值的美国的人难以了解的。

塔吉克人，人称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白色人种集团（另一为以后迁居而来的俄罗斯族），其民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居住于帕米尔高原东西的塞种人，语言属于朗语族，信仰伊斯兰教，属于什叶派分支的伊斯玛仪派，另有生活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境内的一部分维吾尔人信仰什叶派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中国塔吉克族人口在1978年、1990年和2000年时分别是22,000人、33,700人和41,056人，其中60%以上生活在塔县境内。按照塔县政府的介绍，塔县位于中国最西端，国境线长888.5公里，邻接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2020年总人口约41,000余人，由塔吉克、维吾尔、汉、柯尔克孜等多个民族组成，其中塔吉克人占80.9%。虽然近年观光收入和矿产资源开发收入有一定发展，但主要产业仍为畜牧业和兼营农业，2020年县生产总值为17.7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76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25元。⁶

可以看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塔县政府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在2021年时“实现了”让全县44个贫困村4045户1659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贫困发生率也由前几年的55.88%很快就降至0%。但从县政府2022年6月16日公布的一份“困难群众救助补贴公示表”中可以看出，这里依然有大量的贫穷人口存在。补贴对象为ABC三等，城市居民分别为每月616、540和470元，农村居民分别为每月441、380和320元，县一年支出的补助金额共计1839万人民币。所以即使按照B等平均计算，需要补助的贫困人口也是在3200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7.8%。⁷

当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的经济状况一定会好一些。一位其父亲曾为塔县最

高官的朋友告诉我，塔县的汉人在1952年其父赴任时不足100人，1971年他们离开时不足1000人。上述这位美国女青年的录像证实，现在这里已经生活着更多的汉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是农牧民。我们看到了一张塔县政府在其官网上公布的“干部任免通知”（塔政任字〔2021〕1号），所任命的25名“领导干部”中，只有四位是少数民族，仅占16%，而塔县人口的80.9%却是塔吉克族。⁸也就是说，生活在塔什库尔干的汉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普遍高于土生土长的“自治民族”的塔吉克人。

塔什库尔干在城乡人口比例和职业结构显示出的民族不平等，其实在新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中国政府所公布的各民族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出：1990年、2000年、2010年新疆的党政企业领导干部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46%、2.29%、1.73%，而在汉人中分别为4.48%、3.99%、3.37%，维吾尔人中则分别为0.87%、0.83%、0.45%。公务员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分别为2.59%、3.00%、4.11%，而在汉人中分别为4.54%、6.51%、6.81%，维吾尔居民中则分别为1.07%、1.93%、1.92%。也就是说在新疆，2010年汉人公务员在汉人中所占比例，是维吾尔人的9倍以上。在2010年，新疆城镇人口大多为汉人，70.28%的汉人居住在城市，21.97%的维吾尔人居住在城市。⁹

表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府·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民族人口比

	新疆总人口	汉人人口	维吾尔人口
1990年	2.46%	4.48%	0.87%
2000年	2.29%	3.99%	0.83%
2010年	1.73%	3.37%	0.45%

表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务员的民族人口比¹⁰

	新疆总人口	汉人人口	维吾尔人口
1990年	2.59%	4.54%	1.07%
2000年	3.00%	6.51%	1.93%
2010年	4.11%	6.81%	1.92%

但是新疆的大多数汉人不仅对政府的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置若罔闻，而且对镇压维吾尔等当地民族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即使在国外，我们也几乎见不到愿意为受难中的维吾尔人发声的来自新疆的汉人。由此可以肯定，新疆的汉人之所以比当地的维吾尔人塔吉克人“爱国”，与这个国家的民族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比当地民族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们在当地感受到自己才是“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有关。

2、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与汉人社会的边缘人

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疆的汉人不仅比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甚至比起更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红利的内地汉人来，都更加具有“政治觉悟”、更加愿意告诉他人自己是多么爱国（其实是爱政府）。笔者曾做过一个小实验，把一段反映中国国内荒唐防控的视频传给了许多朋友，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一笑了之，只有两位至今生活在新疆的儿时的朋友反应强烈，直接质问：“老同学，你传这段视频是啥意思？”汉语中的“啥意思”，就是指对方的做法不怀好意，他们显然认为我是在讽刺中国政府，于是就要反击，就要告诉我伟大的祖国是多么值得骄傲。

但是，因为新疆汉人的高人一等的感觉和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是以民族不同

为社会基础的，只能产生于与其他民族集团对峙的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能出现于新疆的汉人社会与内地的汉人社会之间。也就是说，给新疆的汉人们带来了实际利益的民族政策，显然不是促使新疆的汉人表现得比内地汉人更“爱国”的唯一的**精神要素**。因为即使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也很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汉人能通过政府所允许的经济活动积累起与内地的汉人社会、尤其是沿海地区居民相等的财富。

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明显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相关的情况，不仅可以通过2011年的蔡洋事件得到确认，塔什库尔干汉人的愚昧无知的爱国行为具有同样的背景关系。在2012年9月的反日游行中，狂热的蔡洋用U型锁将一位日本车车主打成了终身残废。当时在西安做泥瓦工的21岁的蔡洋，由于家庭贫困，小学五年即辍学由亲戚带领外出打工，常常遭到亲戚训斥，也没有朋友，只能在QQ空间上哀叹其“悲催的人生”，“想上学……”、“想出家做和尚，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不想再这样晃荡下去了……”。

塔什库尔干的意思就是“石头城”，这里自然环境恶劣，过去被人称为是除了满地滚的石头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1960年代的县城只有一条街道，号称是“一个馕饼滚到头，一个交警管全县”。按照“百度百科”上的“塔什库尔干镇概述图”来看，县城今天已经扩大了许多。¹¹但是这里的高山缺氧的自然环境却是无法改变的。塔县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但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东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不仅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缺氧而高山反应强烈，外地人一般无法在这里生活，全县人口一直在41000人左右徘徊。但凡有能力在其他地区找到

更体面工作的汉人，一般都会很快离开这里。在各种意义上，生活在塔县这个中国边缘地区的汉人们，无疑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边缘的人群。然而，这里的汉人却口口声声说中国要收拾美国，说中国“有四亿我们这样的退役军人”。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实际上只是在口头上爱国，却不会在了解国际政治局势和是非正义上花费一点儿时间和精力，即使新冠病毒早在拜登上台之前就已开始，然而他们却说是源于拜登放毒。

新疆的汉人比内地汉人更愿意表现爱国，无疑也与这种社会边缘人心态有关。新疆的汉人社会，由于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历史背景，造就了比内地汉人社会更多的边缘人。1884年新疆“建省”之前，这里几乎没有汉人。建省后新疆的居民成分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内地来的汉人官僚，他们霸占了整个政治领域，掌握了新疆地区的全部政治权力，从省长到县长无一不是由汉人出任，这种政治领域与民族社会脱钩的“二重结构的新疆社会”并由此带来的民族压迫，是促使以维吾尔族为首的当地民族发起反抗运动的根本原因。¹²其次是随着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时来的部分湘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通过西伯利亚辗转来到新疆的部分东北军，以及在城镇中精英商业的内地商人，但是这部分人口数量并不大。1944年时国民政府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据说当时新疆总人口为3,953,424人，维吾尔人占73.8% (2,917,076人)，而汉人只占6% (234,946人)。¹³总之1949年以前的汉人数量有限，不足以对传统的、尤其是农村的维吾尔社会造成冲击，且汉人社会的内部构造也比较单纯。

1950年后新疆的汉人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政策下大量进入新疆的政策移民，分别固化为不同的职业集团和社会阶层。第一是1949年底进入新疆的中共部队的中高级军官，他们以后转为

当地的中高级官僚；第二是以后各个时期新疆驻军的退役或转业军人，基本上成为了中低级官僚或国营工矿企业职工；第三是由1949年投诚中共的国民政府军人，以及部分中共部队普通军人转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第四是1950年代以后各个时期因为内地生活困难而自己“跑”到新疆寻找活路的“盲流”，早期多到城镇成为企业职工，文革以后则多是去农村务农；第五是各个时期被中共政权在各个时期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下放”来的青年（以后大部分“返城”）；第六就是2000年以后随西部大开发而来的商人和农民。

但是很明显，除了第一和第二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集团基本上都是不为中国政府所完全信任的职业集团，他们所受到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截然不同。因此，央企对地企、城市对乡村、农工对农民、农区对牧区、地方对兵团、南疆对北疆、小城市对大城市、“老新疆”对“新新疆”等等，新疆汉人社会内部产生了许多内地汉人社会所不存在的攀比竞争关系和社会等级意识。而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之下，这些社会等级又都是难以逾越的。因此，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除了人数有限的属于第一集团的特权阶层之外，许多的新疆汉人在不同的意义上都会感受到自己实际处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边缘。这就是，新疆的汉人社会是一个在中共各种不同的政策之下形成的移民社会，因此产生了比内地的汉人社会更加丰富和复杂的社会阶层，随之使更多的汉人处于社会的边缘、产生了边缘人的危机意识。

在中国导入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大部分新疆汉人心中的这种边缘人意识，变得更为突出。尽管他们依然会在当地民族面前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开始大大落后于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汉人。这使得新

疆的大部分汉人，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汉人面前都会有一种自卑感。于是，新疆的汉人社会中就出现了一句旧谚新编：“孔雀东南飞”。¹⁴说的不是像刘氏那样与焦仲卿被棒打鸳鸯后“自挂东南枝”，而是说有才能的新疆汉人都会像孔雀一般飞到东南沿海大城市去另攀高枝。反之，留在新疆当地的也就是一些碌碌无为的麻雀了。总之，他们将能够生活在沿海地区视为人生事业成功的一个标准。就好像是在应对这一说法，2022年深圳将它从全国各地招揽人才的计划命名为“孔雀计划”，丝毫不遮掩他们根据经济状况而对其他地区汉人的歧视。

3、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可以对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法化

正是通过造就像蔡洋和生活在塔县的汉人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格差、因而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中共政权造就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关于这种社会边缘人的心态，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当然，按照官媒的说法，这种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与陆游相比，而且陆游在诗中透露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想都不敢想的希望进入权力中枢的政治野心，¹⁵但陆游之所以在仕途受挫时、在病中生出国之情怀，无疑具有个人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反对将社会边缘人与陆游相提并论。但是要说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举动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为从以上蔡洋、新疆汉人社会等事例中都能看出，民族主义的行动是无法与个人目的完全脱钩的。但今天中国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举动与当年陆游的爱国思想有一个

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行动一定是顺当局的指挥棒转的。其中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今天在网上拼命表现自己爱国心的小粉红和自干五们。

笔者在以往研究中曾多次提起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社会边缘人”的意义。¹⁶在当代中国，小粉红和自干五其实就是最典型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可以对钓鱼台（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盯住不放，但却能坚定支持当年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俄国去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其实一直是在中国政府感到需要时才会出动的；在当局认为不需要的时候，甚至陆游的“位卑不敢忘忧国”也可以给予新的解释：“只要立足自身的岗位辛勤工作了，多奉献，不添乱，就是爱国，就是忧国。”¹⁷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与个人目的无法脱钩的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未必是以所谓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甚至当他们在当局的默许和鼓励之下爆发出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时，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支撑他们走向狂热的，是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积极表现自己是虔诚爱国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同。

其实，在一个社会构造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被边缘化的人更热衷于民族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中的Mob论。19世纪是代议制民主主义发展的黄金期，随着选举权逐渐扩大，逐渐形成代表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政党，和由作为各阶级代表的政党所组成的议会政治体制。但是阿伦特却敏锐地看到，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出现了大量的阶级社会的落伍者即Mob。Mob在中文翻译中多为“暴民”，实际上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Mob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边缘人。因为议会

里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制度。阿伦特通过对Mob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Mob与“人民”、与“群众”的对比，发现了Mob在心理上具有一些特点。

1，崇拜强人。“对于这些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所属的集团的人来说，代议制除了欺瞒之外什么都不是。感到自己的声音无处诉说的人大量出现后，他们抛弃了议会民主主义，开始寻找能够领导自己的“强人”、“伟大领袖”。¹⁸

2，采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不惜通过扭曲的方式。“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¹⁹

3，热衷民族主义：“就群众而言，部族民族主义和反叛的虚无主义都既非其特征，又不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但符合暴民的特点和意识形态。”²⁰

蔡洋、新疆的爱国汉人以及中国的小粉红们，其心理状态与阿伦特笔下的Mob极其相似。日本学者宇野重规指出：“这些Mob们，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了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旗帜下。因为这是一个通过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而通过种族集团的力量来看待和区别他人、从而可以确认自我优越感的一个最为便利的手段。”²¹像蔡洋这样一位经济状况不佳、心灵空虚、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对未来充满不安的青年，自然也会对社会现状心存不满。2011年，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并在QQ空间写

道：“感觉很爽”，因为这暂时满足了他的仇富心理。正如哈耶克曾指出的那样：“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²²

无疑，社会边缘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摆脱自卑感和确认自我存在价值的渠道和空间。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让社会边缘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因为在没有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更没有批评政府权利的中国，只有民族主义的领域，才被政府允许用来作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在发生于大城市的各次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狂潮中表现最为狂热的，就是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日本，根本不了解美国和日本的农民工和出身寒门的外地大学生们。²³ 因为在中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披上了爱国主义的外衣就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这不仅可以让他们“合法”地尽情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还可以让他们在精神上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摆脱因经济拮据而造成的自卑感。所以，蔡洋才敢于义正严词地斥责批评他使用暴力的姐姐：“我鄙视你。”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只有得到了生理和安全上的满足，才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它与人的向上的社会移动同步。其实，中国的社会边缘人群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移动机制有关。在一些极权主义国家中，对强人的崇拜、对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臣服、对民族主义的热衷等表现，不仅可以向社会宣泄不满和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向当局输诚以换取生存和生命的安全。因此在很多时候，它还被广泛视为实现个人的社会移动的手段。

2019年8月，《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反送中游行队伍中被其他参加

者怀疑是国安特务，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他一举成名，被《人民网》誉为“真汉子”、得到《环球时报》十万元人民币奖金，但仍然无法转为正式记者而换上了抑郁症，以至贫病交加。他在2021年4月不得不离开了《环球时报》，并在六个月后月离世。虽然死因出在中共免死狗烹，但更令我们注意的，应该是付国豪通过在香港主动邀打而得到的“爱国”符号中的密码。很多中国人其实早已明白：在中国实现完美的人生需要一个能够贴在自己身上、并且让他人看得见的“爱国”符号，所以在上大学期间，这位日后成为“爱国记者”的人就已经将自己的名字从“付豪”改成了“付国豪”。

结语：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社会边缘人为载体、以社会不平等为社会基础的

诚然，一部分中国人之所以沉浸于民族主义，是因为受到了洗脑的原因。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会有人接受洗脑，有人却不接受洗脑？因为，仅仅从同样的民族主义的洗脑却能够得出不同的效果这一点就可以令人看出，一个人是否接受民族主义、接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程度，都与这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关。

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可以分为作为理念的民族主义与作为工具的民族主义。在没有遭受侵略和战争威胁的年代里，后者的性质自然更为重要。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之类的口号，不仅不能被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极权主义体制用来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也能够被个人用于作为宣泄对社会和本人处境的不满、感受精神胜利、宣示存在价值的工具；同时，由于社会进入了

网络的时代，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理想已经不再是高不可及，这让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把表现（表演）民族主义作为规划人生、实现社会移动的可能性。

因为中国民族主义建立在“被害妄想”基础之上，能够把攻击他人的行为描述成受害者进行的自卫，所以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很多人认为只要举起民族主义的招牌，就可以将自己本来其实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法化，这是社会边缘人群能够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因此使得社会边缘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虽然民族主义甚至能够让一些社会边缘人变得失去理智，但大量小粉红在挨了社会主义铁拳之后仍不“醒悟”的事例说明，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是洗脑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社会边缘人群自己的选择，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选择一条百利而无一害的道路，因为社会地位使其然也。

越是生活于底层的社会边缘人，就越是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在许多极权主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社会边缘人之所以会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前提是他们看出当局对挂着爱国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的默认和暗中鼓励。当代中国政权消灭反对声音和反对者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亮出汉奸论，指责对方“给美国递刀子”，而社会边缘人群恰恰成为了配合这种民族主义操作的载体。正因为民族主义载体的存在，中共当局在它认为需要通过民族主义镇压反对者和控制广大民众的时候，就会鼓励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是中共政权敢于向民众开放的唯一的公共空间，因此也被许多人看做是个人实现社会移动的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因为当权者知道：民族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他们和社会边缘人可以共有和默契合作的领域，在这里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一种共犯关系。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与世界史意义上的Nationalism完全不同。起于法国革命的 Nationalism 是以追求平等、打破不平等社会为目标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许多时候却成了社会边缘人向当局表忠的工具，是以作为民族主义载体的边缘人生存的不平等社会为社会基础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生机盎然，与存在着大量的感到社会没有公平地给予自己应有地位、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可能它嘴上会喊着人人平等，而实际所做的，必然是通过建立和保持各种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例如城乡二元化等，持续生产出社会边缘人群、即民族主义的载体。换言之，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是不可能真正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

注释

- 1 此前不久（2023年7月19日）著名歌手刀郎发表新歌《罗刹海市》，歌词讥讽当下的中国现实，人们顺从当局意志，美丑不分，是非颠倒，“指驴为鸡”，引起社会深刻反思。
- 2 日本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国籍別 在留資格別 外国人登録者、在留外国人統計(旧登録外国人統計)登録外国人統計 年次 1984年 | ファイル | 統計データを探す | 政府統計の総合窓口 (e-stat.go.jp)
- 3 日本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在留外国人統計,第一表,国籍・地域別 在留資格(在留目的)別 在留外国人》(2022年12月末), 在留外国人統計(旧登録外国人統計) 在留外国人統計 月次 2022年12月 | ファイル | 統計データを探す | 政府統計の総合窓口 (e-stat.go.jp)
- 4 道诚国际：《中国 238 万移民人数，位列第三！美国移民新政策来了》2023年5月29日，<https://www.dawaytrust.com.cn/news/1540.html>
- 5 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人偷渡美国猛增暴翻 13 倍》2023年11月1日，<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1101-%E4%B8%AD%E5%9B%BD%E4%BA%BA%E5%81%B7%E6%B8%A1%E7%BE%8E%E5%9B%BD%E7%8C%9B%E5%A2%9E-%E6%9A%B4%E7%BF%BB13%E5%80%8D>
- 6 塔县政府办公室：《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概况》，<http://www.tskeg.gov.cn/tskeg/gkxx/202309/a81b0807c5ea4e9c9e1bcff a91b9f2f2.shtml>

7 该公示原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官方网站的“首页 > 新闻中心 > 通知公告”中，现已无法连接，此处列出当时的公示表截屏。

8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人民政府干部任免通知》塔政任字〔2021〕1号，<http://www.tskeg.gov.cn/tskeg/rsxx/202105/b5538e456b6443b78410303d48531af5/files/eb02087669b14d27b0ccf274531a82f9.pdf>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高龄老人基本生活津贴补贴公示表					
公示日期：2022年6月16日					
填报单位（公章）：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民政局					
补贴项目名称	高龄老人基本生活津贴				
补贴对象	80岁（含80）以上的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困难，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要求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补贴标准	标准：80-89岁 60元/人·月，90-99岁 120元/人·月，100周岁以上200元/人·月	发放方式（现金/银行卡）	银行卡		
补贴总金额	205400元	发放时间（月、季、半年、年、次）	按月		
政策咨询和 监督投诉	塔什库尔干县财政局	局长姓名	毛拉木	联系方式	13998089899
	塔什库尔干县业务主管部门	经办人员姓名	谢刚	联系方式	15729951556
		局长姓名	库尔班汗	联系方式	15003091130
	塔什库尔干县农村信用社社代发银行	经办人员姓名	吐玛尔汗	联系方式	13657506379
		行长（主任）姓名	谭晓亮	联系方式	15599985222
	塔什库尔干县农业银行	经办人员姓名	帕提古丽	联系方式	13779721147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困难群众救助补贴公示表					
公示日期：2022年6月16日					
填报单位（公章）：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民政局					
补贴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贴				
补贴对象	发放对象为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孤儿、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其他等人群的生活保障资金。				
补贴标准	特困人员救助：A特困供养人员·月，B孤儿·月，C低保边缘家庭·月，D低保边缘家庭·月，E低保边缘家庭·月，F低保边缘家庭·月，G低保边缘家庭·月，H低保边缘家庭·月，I低保边缘家庭·月，J低保边缘家庭·月，K低保边缘家庭·月，L低保边缘家庭·月，M低保边缘家庭·月，N低保边缘家庭·月，O低保边缘家庭·月，P低保边缘家庭·月，Q低保边缘家庭·月，R低保边缘家庭·月，S低保边缘家庭·月，T低保边缘家庭·月，U低保边缘家庭·月，V低保边缘家庭·月，W低保边缘家庭·月，X低保边缘家庭·月，Y低保边缘家庭·月，Z低保边缘家庭·月。	发放方式（现金/银行卡）	银行卡		
补贴总金额	18390000元	发放时间（月、季、半年、年、次）	按月		
政策咨询和 监督投诉	塔什库尔干县乡级政府服务中心	主任姓名	周芳	联系方式	13239982918
	塔什库尔干县业务主管部门	经办人员姓名	巴图尔江	联系方式	15292925702
		局长姓名	库尔班汗	联系方式	15003091130
	塔什库尔干县农村信用社社代发银行	经办人员姓名	吐玛尔汗	联系方式	13657506379
		行长（主任）姓名	谭晓亮	联系方式	15599985222
	塔什库尔干县农业银行	经办人员姓名	帕提古丽	联系方式	13779721147

9 李建新、常庆玲：《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总86期），30页。

10 表一和表二根据李建新、常庆玲《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总86期），29页，由笔者作成。

11 《百度百科》“塔什库尔干镇”：<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4%B-80%E5%BA%93%E5%B0%94%E5%B9%B2%E9%95%87/918036>。

12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41页；WANG Ke, *The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30-1940*,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kong, 2018, p.41.

13 倪超：《新疆之水利》，商务印书馆，1948年1月，32-33页。

14 张庆黎：《兵团已改变了过去孔雀东南飞的局面》，《人民网》，2004年03月09日，<http://43.250.236.5/GB/shizheng/1026/2380996.html>。

15 “骨节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羹。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陆游：

《病起书怀》。

- 16 王柯：《“边缘”的焦躁与民族主义的内化》，《中国智库》第2辑。
- 17 读古诗词网《位卑未敢忘忧国》赏析，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proses/70355。
- 18 原文见《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四章“德雷福斯事件”之四、“人民与暴民”一节。
- 19 原文见《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无阶级社会”，“群众”一节。
- 20 同上。
- 21 宇野重規：《民主主義とは何か》讲谈社，2020年，211页。
- 2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55页。
- 23 王柯：《中日如何观察对方？》《中国经济报告》第3期，2013年3月，104-109页。其中罗列2013年之前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观感的数据和关于其原因的分析，其中有关于中国青年学生的反日情绪高于一般市民，无访日经验者的反日情绪高于有访日经验者的具体数据。关于最近数年两国国民之间观感的变化，可参照王柯编：《“友好”のエレジー，中国人から見る“日中国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友好”的挽歌，中国人眼中的“日中国交正常化五十年”》藤原书店，2012年，共同执笔者为贺卫方、张伦、慕容雪村、贾葭、唐辛子、刘燕子、李钢哲）一书。

当代问题

张彦华 | 作者张彦华博士为旅韩中国政治学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教会的抗争：基督教会与韩国民主转型

摘要：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之前的研究更关注于基督教作为文化和信仰支撑所发挥的间接作用。本文侧重于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参与抗争的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韩国基督教会是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为论证此观点，本文从韩国教会为何抗争和如何抗争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历史反省、现实状况和民众神学阐述了教会抗争的合法性，并从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个方面论述了教会在抗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引言

韩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一个典型，许多学者对韩国的民主转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考察基督教与韩国民主转型的关系时认为，“基督教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¹韩国学者任成彬指出，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韩国民主转型具有重要的作用；²中国学者尹保云指出，韩国的本土文化受到了西方基督教影响下的民主思想的冲击，最终促使基督教文化发展壮大，这对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作用。³从这些研究的切入点来看，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主要作用在于培育公民社会和传播平等、自由等现代文化。换句话说，基督教主要是以间接的方式，从文化和信仰支撑的角度对韩国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参与社会抗争的直接方式对韩国民主转型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而这正是本文分析的切入点。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方式参与社会抗争，从而对民主转型产生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基督教会是推动韩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吗？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会”，指的是韩国基督新教的地方教会、宣教会，神学院以及跨教会组织；所谓“主要力量”，指的是不仅仅担当行动背后的文化与信仰支撑角色，而且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的抗争方式参加、甚至是民主转型进程的主导力量。本文的观点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威权统治最为严酷的朴正熙和全斗焕独裁政府时期，基督教会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在实际的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之一。

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部分：第一是何为抗争？第二是如何抗争？对教会来说，参与与领导社会抗争需要首先解决为何抗争的问题，即抗争需要有合法性。本文的观点是，进入1960年代后，韩国教会适逢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其中包括：教会对1950年代屈辱历史的反省；1960到1980年代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在城市创造出大量劳工、贫民等被边缘化民众；从1960年代开始萌芽，在1970年代成型的“民众神学”。对于如何抗争的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教会在抗争过程中发挥了“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重作用，而这三重作用是抗争理论所认为的能够成为主要力量需要具备的条件。

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

“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指的是为人们参加抗争提供机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包括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镇压抗争的限度、抗争的合法性程度等。⁴就韩国基督教会参与并领导社会

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历史反省、现实状况和民众神学。

1、历史反省

基督教在19世纪末进入韩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了当政者的压制，因为基督教所带来的“一神”思想、平等观念和反抗意识不利于其王朝的统治，但是迫害并没有阻止基督教在韩国的早期传播。1910年到1945年间，日本将朝鲜半岛作为其殖民地，全面推行殖民侵略政策。基督教与韩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韩国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独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器。韩国基督教会在日本殖民时期参与的最著名的运动，是1919年的“三·一运动”。

1948年韩国建国后，基督教和当时的李承晚政权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主要原因是李承晚是一位长期在教会服侍的监会长老，虽然在其任内实行独裁统治，但基督教整体上与李承晚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基督教思想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继高丽王朝的佛教和朝鲜王朝的儒教之后新的统治思想。⁵

1960年4月19日，韩国爆发了反对李承晚独裁政权的学生大游行，李承晚被迫下台，教会一度被全社会所嫌弃，而这迫使教会对自身的社会定位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经历过李承晚政府时期的全面保守后，韩国基督教会在朴正熙军人政权时期分化成了保守和进步两派。保守的基督教会配合军人政权，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认为民主不能操之过急。而进步的基督教会，通过反省李承晚时期教会的“失策”，重新抬起

了日据（日本统治殖民）时期的抗争传统，“主张‘世界的人类化和解放’，争取下层民众生存权的意志更为强烈”，⁶积极参加各种争取民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李承晚政府时期，教会在抗争方面的“落后”和之后的反省构成了教会得以介入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的一部分。

2、现实条件

1961年5月，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朴正熙统治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二是197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的维新体制时期。贯穿朴正熙和全斗焕统治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城市创造出了大量劳动条件恶劣的劳工阶级和大量城市贫民阶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力量，这是教会抗争得以展开的政治机遇结构的一个方面。

1970年代初期，劳工阶级开始发起劳工运动，特别是“全泰一自焚事件”⁷将劳工阶级所受的压迫推向了全社会，使其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基督教会从1960年代开始致力于对边缘群体的传教工作，但逐渐发现，若要成功传教，需要先解决边缘群体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教授具海根（Hagen Koo）多年研究后发现：“工业化开始后，大量人口向工厂集中，而宣教团体，特别是城市工业宣教会就在工厂旁边建立宣教点，他们要想有效地宣教，就不得不面对工人们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下、工作时间太长等问题。参与抗争、培训抗争骨干、组织抗争行动成了教会工作中摆脱不了的事项”。⁸

此外，1948年韩国建国时仿照美国建起的是一个民主的政治框架，虽

然此后民主崩溃，相继出现了李承晚的半民主文人政府、1960年代朴正熙的半民主军人政府和1970、1980年代的军人独裁政府，但威权政权的迫害有限度、有底线，这些现实条件构成了教会积极参与和领导抗争的政治机遇机构的另一部分。

3、民众神学

19世纪末西方宣教士进入朝鲜半岛后使用的是“倪维斯（John Livingstone Nevius）宣教法”，这种宣教法集中关注劳工阶层、底层群体和妇女儿童，这是后来韩国民众神学出现的一个历史基础。作为一种解放神学的“民众神学”，从1960年代开始萌芽，其体现就是试图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引入教会语境。⁹1970年代初期，韩国神学家安炳茂发表了《民众与耶稣》、《国家、民族、教会》等神学著作，这标志着民众神学正式形成。民众神学认为耶稣也是暴政的受害者，因此他总是站在民众的一边，而民众也是在苦难中遇见了耶稣。这里的“民众”指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中出现的大量边缘人群，包括工厂的工人和贫民窟的贫民等。民众神学号召教会要积极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为被压迫的民众争取权利，并在这个过程中宣教。1973年5月20日发布的“韩国基督徒的神学宣言”宣称，民众与历史的基督站在同一阵线，同受圣灵的感动。因此“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都要站到受压迫的民众一边，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努力”。¹⁰可以说民众神学弥合了当时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各个宗派、各个教团间的差异和分歧，“为了民众的教会”成了当时包含天主教在内的大部分教会的共同声音。

神学观念的变更，为基督教会参与和主导社会抗争建立了合法性基础，这

是教会抗争得以深入和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机遇结构。民众神学为贫困民众的抗争提供了一个神学的基础，这不是神学院课堂上所教授的一种概念性的神学，而是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神学。1970年代初期，国务总理金钟泌发表讲话，引用《罗马书》十三章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并以此要求教会顺服，为政府镇压民主人权运动寻找借口。对此，教会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某个政权的忠诚不是一回事……维新政权违背了神的公义，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对国民造成了权利侵害。在这种时候，基督教会作为神公义的代言人有义务站出来，对此提出批判，并要求改正。”¹¹这是民众神学非常形象化的一个表述。民众神学的主张是：“第一，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都要站到被压迫的民众一边，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第二，朴正熙政权不要以法律和秩序为借口压制民众的声音；第三，立即终止恐怖的信息封锁，不要把神圣的军队变成打压学生和民众的工具。”¹²

教会在抗争中发挥的三重作用

基督教会在社会抗争中主要发挥了三重作用，分别是“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这三重作用决定了教会是社会抗争和民主转型中的主要力量。

1、居间联系

居间联系指“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方通过宣传和激活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新联系的建立会引起抗争发生重要变化，使得一些观念、实践和资源

得以四处流动。这些新的观念、实践和资源常常会使不同地点间的联系和协作变得方便”。¹³威权统治通过制度性的办法把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隔断，因此社会抗争往往以单个单位而进行，如果这些个体的行动单位能够得到某个中间人的呼应，在多个单位间建立联系的桥梁，社会抗争才能发挥挑战威权政治的作用。在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担当这个中间人角色的便是教会，教会成员可以是学者、学生、工人、农民、公务员、企业主等各个阶层的人员，他们通过共同的平台可以建立各种联系。

教会以传教的热情着手发动边缘群体进行政治和社会参与，这是任何其它组织都很难做到的，教会的居间联系作用激活了边缘群体的参与热情。比如，1960年代后期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关注劳工生活，利用教会聚会的机会探讨民生问题、腐败问题、人权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并开展进一步的行动。之后，基督教青年会分别活动在劳工、农民和学生中间的宣教组织开始逐渐促成各社会力量间的联合。1970年代初，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和促进下，各种边缘组织创建了“民主守护国民协议会”，这是韩国民间第一个全国性的抗争组织。¹⁴再比如，城市工业宣教会最初是在1971年组建的韩国特殊地域宣教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由韩国基督教长老会、韩国耶稣教长老会、韩国基督教浸礼会和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共同组成。城市工业宣教会主要关注劳工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工权益的保护等。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劳工运动中，城市工业宣教会是实际的发动者和组织者。¹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工业宣教会的美籍牧师乔治·奥格尔(George E. Ogle)。奥格尔在美国主攻神学和劳工运动理论，1960年代成了城市工业宣教会的主要牧师。奥格尔牧师在1974年被韩国政府强制驱逐出境，其被驱逐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其作为牧师长期以来参与各种抗争运动，违反了韩国对外国人的相关法律。此事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虽几经斡旋，未能取消

韩国政府对奥格尔的驱逐命令，但美国政府从此开始高度关注韩国劳工的人权状况。¹⁶在奥格尔的推动下，城市工业宣教活动对劳工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具海根教授的研究，1970-1974年间，城市工业宣教会约教育培训了4万名工人；1967-1978年间年，教育培养工会领导者2000-2500人。没有城市工业宣教会的背后推动，作为边缘群体的劳工的抗争（特别是女工的抗争）很难在全社会引起关注。¹⁷

2、认同改变

认同改变指的是“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新的认同，这些挑战者团体之间的协调行动不仅让他们聚拢到一起，同时也展示出他们间具有的共性”。¹⁸在社会抗争过程中，各种抗争力量间的政治诉求能否达成一致，不同的抗争力量为了共同利益是否会做出让步和妥协，不同的抗争力量能否形成内部团结，这是决定其抗争效果的重要方面。在韩国的社会抗争中，基督教会成功地促成了学界、法律界、传媒界和宗教界（主要是新教各宗派，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大联合，建立了“联合国民运动”。该运动组织是基督教会在认同改变机制作用下，建立的抗争联盟。教会之所以能够发挥认同改变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的特殊性：信徒并不局限于某一特殊阶层，正如其传福音是针对全体民众一样。所以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等都能在教会的圣经学习和祷告中找到共同语言，教会是各种抗争力量间的最大公约数。

基督教会在认同改变机制作用下，推动抗争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事例，发生在1973年复活节联合礼拜上。朴行圭牧师因在礼拜会上发放主张民主化的声明书，而被以“内乱阴谋嫌疑”收监，并被判处2年监禁。以韩神大

学金在准教授为首的十多名教授联名请愿，要求释放朴行圭牧师，废除维新宪法。此事加速了教会参与民主化运动的步伐。梨花女子大学的教授们也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朴行圭牧师和被捕学生，保障言论自由。¹⁹以此为契机，基督教会领导者、基督教教授协议会、神学大学教授、基督教大学教授、天主教圣职人员、传媒界人士、法律界人士和学生们纷纷加入了此次营救活动中，教会成为了抵抗维新体制的最强有力的堡垒。当时的维新独裁政权，即朴正熙政府迫于民间社会的联合大反抗，在监禁朴行圭牧师十多天后，被迫释放，联合抗争取得了空前胜利。另外一个认同改变的例子是作为反维新运动的一环，1973年12月24日，基督教、天主教、学界、传媒界等为中心，发起了改宪请愿百万人大签名运动。这是各界联盟形成的一个例证。

3、社会利用

社会利用指的是“抗争过程中可供抗争组织利用的资源规模。其包括：抗争组织生存空间的大小；是否易于形成全国性组织；抗争组织与国际组织的联系程度；抗争组织领袖的品质（如组织领袖对威权政权和民主的认识程度、是否愿意分享权力等）”以及在物质资源上的动员能力。²⁰此外，“通过利用组织性的和制度性的优势发起运动，把某些非政治性的团体转变为政治行动者”也是社会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²¹

在抗争运动中，教会成为了民主力量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教会作为抗争的组织具有其它社会组织所没有的优势：第一，无论什么样宗派的教会，所敬拜的是同一个神，所受的是同一个灵，所读的是同一本经。因此，各界人士都能在教会找到共同语言。教会作为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的沟通管道，是

信任和友谊的网络，在教会的号召下，极易形成抗争联盟。第二，基督教信仰是世界性的，无论如何迫害，表面上的信仰自由没人敢剥夺，教会的礼拜被看作是“最后的集会”。教会较比其他社会组织，特别是政治性组织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威权时期，韩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来自军人政权的强大压力，大部分社会组织以“容共”的嫌疑被强行解散，而基督教会则在宪法条文所标榜的“信仰自由”的庇护下和来自西方国家基督教会的关注下，得以继续存在，并保持了一定范围内的宗教活动。²²教会也正是利用了这个优势，在威权统治最严厉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礼拜聚会、祈祷聚会等教会生活最基本的集会形式，对基督信徒及大众形成影响。第三，教会领袖基本都是知识分子，一大批牧师是从西方民主国家留学归来的，有的直接是西方国家的人担任牧师，他们在西方国家浸染的民主思维，对引导抗争向促进民主化进程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依靠信徒的捐献，教会拥有资金、人员、建筑和设备，这是社会抗争可资利用的有形资源；在抗争运动中，教会成为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

以“东一纺织女性劳工抗争事件”为例：赵会顺牧师是在仁川女性劳工当中非常有名的女牧师，在众多的发生在仁川的劳工抗争事件中，赵会顺牧师都进行了积极的鼓动，是女性劳工进行劳动抗争的精神领袖。赵会顺牧师在一次教会礼拜上大声疾呼：“现在的基督教会应该抛弃保守传统，积极投身于人权和民主化运动中。耶稣在其生活的时代也是这样，为弱势群体祷告、安慰劳苦的人，基督教会为了维护劳工的权益应该将自己完全献上。”²³“东一纺织女性劳工抗争”事件之后，甚至有500多劳工在教会集会成立运动团体。²⁴1980年代要求调查光州事件真相的静坐、KBS-TV视听费拒付签名活动、举行揭露当局酷刑的报告会和对策会、改宪斗争记者见面会和6月抗争的核心组织“国民运动本部”成立大会等都是在教堂内举行

的。此外，教会抗争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国际联盟的形成。1970年代，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基督徒和他们的教会联合起来，通过世界教会协议会（WCC）等国际性的教会机构对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援，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支援。²⁵

结语

教会抗争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合法性，韩国教会抗争的合法性构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确立民众神学。教会为被压迫阶层的权益而抗争是该神学的核心要旨，抗争的信念体系使得基督教会抗争具有了合法性，使得教会在动员和组织抗争行动时更加积极、目标更加明确。²⁶第二是接续日据时期的抗争传统，将威权下的抗争与殖民下的解放相提并论；第三是有效发挥宪法条文中“信仰自由”的规定。任何威权政权至少在形式上会标榜信仰自由，教会在此原则的保护下，对妨碍信仰自由的种种政府行为起而抗争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此外，韩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创造出大量贫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基督教在1970、1980年代的高速发展；学生抗争的激励等，这些不但使得教会抗争具有了合法性基础，而且也构成了抗争的政治机遇结构。

在抗争过程中，教会充分发挥了“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的作用。教会的居间联系作用激活了边缘群体的参与热情；教会的认同改变作用弥合了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以及基督教各宗派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在宣教和抗争两个方面建立了共同的认识基础；教会以其掌握的各种资源对劳工阶层等边缘群体的抗争提供了有效的支援。基督教教会组织、其领导者、动员的潜力、威权政权宪法条文所确保的信仰自

由、教会的世界性连接关系等，这些特点使得基督教会成为了处于威权统治以外的、能够动员起民众并对威权政权造成一定压力的社会抗争的堡垒，其天然的抗争优越性要远大于其它社会组织。韩国威权时期社会抗争得以持续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教会作为抗争组织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抗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其它社会组织所不可替代的。²⁷

从抗争与宣教的实际关联性来看，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教会抗争有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信徒人数和神职人员数量不降反增。根据相关统计，1960年，韩国基督徒总数是119万多，占总人口约4.76%；1970年基督徒总数是220万多，占总人口6.29%，1975年基督徒总数是401.9万，教会数是16,089，神职人员数是22,483；1980年基督徒总数达到了718万多，占总人口的23.68%，神职人员总数是31,740。²⁸由此可见，基督教会在发挥抗争主要力量的过程中，其自身也不断壮大。这无疑给威权国家里的基督教会一个重要启示：**教会若按照圣经教导勇于彰显上帝的公义，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敢于站出来指责和抗争，其自身会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在带动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自身也会取得巨大的发展。**

注释.....

-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4页。
- 2 [韩] 任成彬：《关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思考——以现代化过程为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版，9辑，第243-245页。
- 3 尹保云：《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 4 [美] 查尔斯·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85页。
- 5 김용복, “해방후의 교회와 국가”, *국가권력과 기독교*, 서울:민중사, 1982,

pp.201-202.

- 6 郑继永: 《试析新教参与韩国政治的过程和特点》, 《当代韩国》2010年夏季号, 第12页。
- 7 1970年11月13日, 为了替首尔和平市场的两万多名被服厂劳工的非人待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讨回说法, 劳工运动家全泰一用自焚惊醒当局。
- 8 구해근, *한국 노동계급의 형성*, 서울: 창작과비평사, 2002, p.118.
- 9 [美] 胡斯托·L·冈萨雷斯: 《基督教史》(下卷), 赵城艺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第453-454页。
- 10 杨牧谷: 《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 种籽出版社1987年, 第89页。
- 11 이수연, “70년대의 반체제 목사들”, *신동아*, 1984년9월호, p.180.
- 12 한국기독교협의회편, *기독교 연간*, 1972, p.302.
- 13 [美] 查尔斯·蒂利: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39页。
- 14 오석홍, “대한민국 정치약사: 우리나라 행정체제의 정치적 여건변천”, *행정논총*, Vol.23, No.1, p.78.
- 15 조승현, “산업사회에서 교회선교의 공헌”, *기독교사상*, Vol.23, No.7, 1979, pp.42-53.
- 16 이상록, “1960-1970년대 조지 오글 목사의 도시산업선교 활동과 산업민주주의 구상”, *사이간 SAI*, Vol.19, p.89.
- 17 구해근, *한국 노동계급의 형성*, 서울: 창작과비평사, 2002, p.180.
- 18 [美] 查尔斯·蒂利: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48页。
- 19 이수연, “70년대의 반체제 목사들”, *신동아*, 1984년9월호, p.109.
- 20 谢岳: 《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165-168页。
- 21 [美] 查尔斯·蒂利: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43页。
- 22 김병서, “한국 사회의 민주화와 기독교”, *한국사회발전과 기독교의 영향*, 서울: 한울출판사, 2000, p.62.
- 23 이수연, “70년대의 반체제 목사들”, *신동아*, 1984년9월호, p.184.
- 24 김명배, *해방 후 한국기독교운동사: 민주화와 인권운동을 중심으로 (1960-1987)*, 서울: 북코리아, 2009, p.177.
- 25 박양식, “구술사로 보는 새로운 역사: 현대한국사에서 기독교 민주인사의 역할을 중심으로”, *한국교회사학회지*, Vol.31, pp.173-206.
- 26 Cyris Moon et al, *A Korean Minjung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spective*,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6, p.89.
- 27 이종오, “60-70년대 산업화 과정에서 사회구조의 변화와 사회운동”, *한국사회학*, Vol.19, pp.45-60.
- 28 김용복, “해방후의 교회와 국가”, *국가권력과 기독교*, 서울: 민중사, 1982, p.192.

艾瑞卡·切诺维斯 文
言晓义 译

作者艾瑞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 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伯索尔德·贝茨人权与国际事务教授，有《为什么公民抵抗管用》(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等重要著作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非暴力抗争 的未来

编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公民非暴力抵抗超越了武装斗争成为革命运动最常使用的动员形式。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近10多年来，公民抵抗的收效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益？这正是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此文分析讨论的重点。该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2020年第3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3, July 2020, pp. 69-84, <https://muse.jhu.edu/article/760088>)。

2019年见证了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政府民众运动浪潮。¹声势浩大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活动在数十个国家爆发，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虽然2011年早就被冠以“抗议之年”，但2019年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

其中有几场运动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果。2019年4月，苏丹暴君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倒台。巴希尔曾在他的统治时期一手制造了数十万生灵涂炭的达尔富尔大屠杀。1990年代，他为圣战组织提供庇护，并大规模逮捕、酷刑和草菅人命，以此恫吓反对者。巴希尔倒台几周后，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也因一场“微笑革命”(Smile Revolution)，被民众起义赶下了台，当时他正在寻求违宪的第5个任期。2019年7月，在波多黎各数十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停工后，总督被迫辞职，事件的起因是他的无能和对玛丽亚飓风受害者的嘲弄言论触犯了众怒。自2019年10月以来，在伊拉克、黎巴嫩和玻利维亚等不同的国家，政府均被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推翻。在智利，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迫使政府就其财政政策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在香港，亲北京的引渡条例催生了民众自发的街头运动，随之而来的管治不善和残酷的镇压如雪上加霜，导致抗争人数有增无减，民众诉求也进一步升级，促成了泛民主党派在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获胜。在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策向右转的合法性首次遭遇严重挑战，数十万印度人开始投身一场大规模运动，反对一项将导致数百万印度穆斯林失去国籍的公民登记计划。而自2017年以来，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民众运动浪潮，诉求目标包括推动种族正义、移民正义、枪支管控、女性权益、气候正义、LGBTQ权益，以及寻求弹劾川普或促其辞职等。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这种街头活动就大都嘎然而止了。2020年初，全球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以及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迫使人们放弃了聚众示威。这种传统大众抗争形式的骤然停顿，被世界各地许多政府趁机利用，借机推进各种引发纷争的政策，从搁置言论自由到有争议的司法任命，再到禁止移民或难民入境等。

近年来，民众运动本已面临一系列艰难挑战，疫情大流行引起的中断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尽管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流行在过去10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其有效性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滑坡，主要是因为这些非暴力运动本身的结构和能量发生了变化。或许出乎意料的是，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有助于解决其中一些根本问题，因为它促使非暴力运动将重心重新转回到关系建设、草根组织、战略，以及开发能够让受众产生共鸣的叙事上。随着2020年的推移，许多运动，包括在美国出现的运动，已经以更强的实力和更强的争取长期变化的能力，而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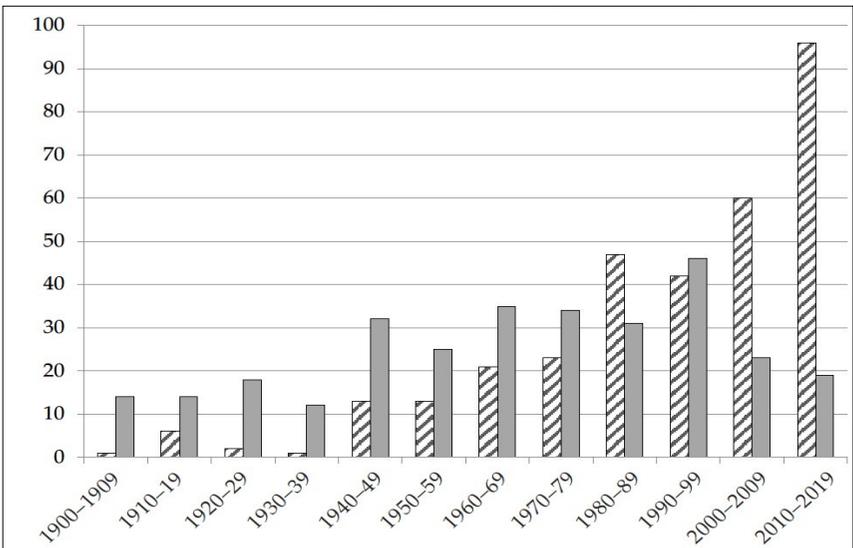
非暴力抗争的扩大

非暴力抗争是一种斗争方式。它是指手无寸铁的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包括抗议、示威、罢工和不合作——建立抵抗对手的力量，从而实现政治目标。

非暴力抗争有时也被称为“公民抵抗”、“人民力量”、“非武装斗争”或“非暴力行动”，它已经成为全球各地政治行动的支柱。武装斗争曾经是从政治体制外争取变革的主要运动方式。如今，压倒性地依赖于非暴力抗争的运动取代了武装斗争，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抗议行动方式。

例如，分析家们发现，1900年-2019年期间共有628场目标最大化的民众运动（即试图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试图通过分离或驱逐外国军事占领或殖民势力来实现领土独立的运动）。²尽管解放运动通常被描绘为武装叛乱，但³这些运动只有不到一半（303宗）涉及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其他325宗运动则是主要依赖非暴力的民间抗争。³鉴于严峻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非暴力的公民抵抗而不是暴力，在过去50年里，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图1非暴力和暴力大规模运动的肇始时间，按10年期划分（1900年至2019年）



非暴力（斜线标识：325宗），暴力（灰色标识：303宗）

正如图1所示，暴力叛乱自1970年以来减少了，而非暴力抗争运动变得愈加普遍。而从2010年到2019年，这最近十年的数字着实令人震惊。这一时期不仅涌现了自1900年以来数量最多的非暴力抗争，而且爆发了不少于96宗目标最大化的非暴力运动。这远远超过了前此十年内爆发的革命事件的数量（2000年至2009年间有60次）。仅在2019年一年内，就出现了15宗新兴的大规模非暴力运动，此外，还有24宗延续中的运动，在2019年结束时仍在进行。

为什么寻求政治变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公民抵抗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可能是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一种正当且成功的变革途径。下文将详细讨论这一因素。尽管非暴力抗争尚未被普遍理解或接受，但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偏好已越来越普遍。⁴

其次，新的信息技术使得了解以前不会见诸报端的事件变得更加容易。⁵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私人聊天室等在线途径获取新闻。身在蒙古的人们可以读到发生在非洲马拉维的人与事，从中得到启发并有所受益。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且有效的斗争方式，公民抵抗正得到全球新闻媒体和学者的日益关注。而且，通过新的沟通渠道，人们还可以绕过网络门户的守门人，直接与他们认为志同道合的人交流。由于精英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控制信息，因此现在更容易看到描写普通人的新闻和信息。

第三，暴力市场正在枯竭。这一点在外国对武装组织的支持方面最能见微知著，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类支持急剧减少。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曾

资助过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数十个反叛组织。1991年后，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实际上结束了这种代理人竞争。

第四，在战后时代，社会开始更广泛地重视与期待公平、人权保护和避免不必要的暴力。⁶这种规范性的转变可能提升了大众对公民抵抗作为人权倡导方式的兴趣。⁷与过去相比，战争的恐怖更为显而易见，而现实的替代方案也明显更为触手可及。正如塞琳娜·加洛-克鲁斯（Selina Gallo-Cruz）所指出的那样，冷战后非暴力抗争的兴起也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日益壮大有关，这些组织明确致力于分享非暴力抗争理论和实践的信息，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非暴力国际（Nonviolence International）和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⁸

第五，从更令人忧心的方面说，如今人们可能有了新的抗争的动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政府出现了动摇，并演变成威权主义。⁹近年来，无论是在埃及、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威权国家，还是在巴西、波兰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民主权利的削弱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随着川普上台就任美国总统，该国许多人开始接受公民抵抗的理论和知识，并将之付诸实践。随着美国退出全球民主议程，甚至国内民主机构受到侵蚀，人们的信心开始动摇，彷徨于既有建制是否愿意，或能否，应对诸如种族公正、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迫切的政策挑战。在世界许多地方，青年人口正在增加，这些人口压力产生了对就业、教育等机会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某些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人数创下新高。早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前，人们对经济正义和机会的普遍预期，就已经与2008年金融危机

后的疲弱所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现实发生了冲突。

因此，公民抵抗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发展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失败的象征。成功之处在于，如此之多的人相信可以利用战略性的非暴力手段来对抗不公正，从而转而采取武装行动的人则越来越少。失败之处在于，如此之多的不公正依然存在，而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却少之又少，因此对于公民抵抗的需求增加了。

非暴力抗争的记录

如果不了解公民抵抗的机理，就很难理解我们今天所置身的政治世界。1989伊始，国际体系似乎完全是围绕着强大的民族国家和统治它们的精英组织起来的。那一年，中欧、东欧的公民起义推翻了受苏联支持的政权，这标志着30年剧变的开始。在南非，黑人领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成功地推翻了该国法定的种族歧视制度，尽管种族主义、隔离和经济不平等仍然存在。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和中亚，一些独裁政权已屈服于所谓的“颜色革命”。基本和平的抵抗运动推翻了三位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并动摇了其他几位独裁者的统治。

所有这些变化，都整体上或部分地源于持续的基层公民行动。事实上，第三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运动推动的，这些运动要求政府扩大个人政治权利，并通过公平选举、新闻自由、公正的刑事司法系统等方式来实现问责。¹⁰

研究公民抵抗的学者通常将“成功”定义为在运动达到顶峰的一年内，能

够推翻政府或实现领土独立。¹¹在过去120年间开始和结束的565场运动中，约有51%的非暴力运动取得了彻底成功，而暴力运动则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因此，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另有16%的非暴力运动和12%的暴力运动以有限的成功告终，而33%的非暴力运动和61%的暴力运动最终失败。）此外，在发生过公民抵抗运动的国家中，冲突之后，民主巩固的机会、相对稳定期以及各种生活质量的指标都高于经历了内战的国家。¹²

这一点即使在非暴力运动面对的是残暴的独裁者时也成立。与流行的认知相反的是，非暴力运动的兴起或成功，并非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对抗的政权在政治上软弱无能，或不肯使用大规模暴力。一旦民众运动兴起、动摇了现状，大多数政权都会用蛮力对付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其结果是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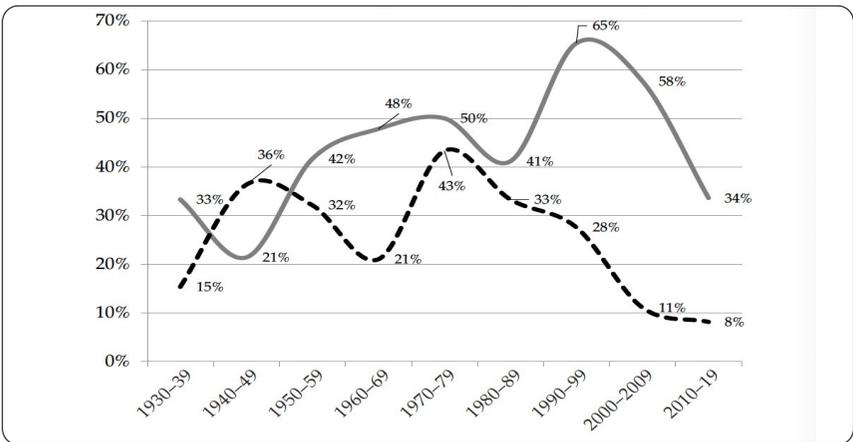
与流行的认知相反的是，非暴力运动的兴起或成功，并非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对抗的政权在政治上软弱无能，或不肯使用大规模暴力。

更多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暴行。¹³此外，即使考虑到政权类型、政府镇压和军事能力等因素，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仍然远远高于暴力抵抗。¹⁴这是因为与武装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的规模往往更大，涉及的领域更广，因而在政治上更具代表性。这就为非暴力运动提供了许多机会，通过那些机会，它们可以在决定性时刻引发叛变，撬动政权的支柱，使其摇摇欲坠。当安全部队拒不执行对示威者开枪的命令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比如在2000年的塞尔维亚。或者，当商界或经济精英开始响应公众压力，表达对运动的支持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就像南非的白人企业主那样，他们在黑人领导的几波罢工、抵制和全球制裁浪潮后选择支持反种族隔离的运动。在其他情况下，一些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如强大的工会或专业协会，开始停止与政权

合作，就像2019年苏丹革命中发生的那样。基本上，运动规模越大，打破现状、引发撼动政权主要支柱的叛乱的机会就越大。而且，非暴力运动有能力以武装组织无法企及的方式扩大参与。¹⁵那种认为只有暴力行动才强有力且奏效的普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当然，公民抵抗运动并不总能带来和平与繁荣。2011年在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对非暴力斗争的回应是对平民使用军事力量，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由此引发的冲突至今已经持续了近10年，成为本世纪最血腥的内战之一，迫使约三百万人逃离这个国家。2011年，美国支持的巴林政府镇压了一场试图挑战君主制的非暴力运动。而2014年2月在乌克兰，人民力量运动成功地推翻了俄罗斯支持下的寡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统治，但俄罗斯非但没有允许乌克兰更深入地融入到欧洲轨道，反而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助长了乌克兰东部持续不断的、致命的分裂战争。

图2非暴力和暴力民众运动成功率（按10年期划分：1930-2019）



非暴力 (数量: 320), 暴力 (数量: 261)

过去10年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低于其历史对应的水平。从1960年代到2010年左右，革命性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1990年代甚至达到了65%。然而，正如图2所示，所有革命的成功率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下降。自2010年以来，仅有不到34%的非暴力革命和8%的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

尽管政府在镇压对其权威的挑战方面更上一层楼，但非暴力抗争仍然以4比1的比例超过暴力抗争。这是因为武装对抗的成功率变得越来越低，一直在延续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但过去的10年也见证了公民抵抗成功率的急剧下降，扭转了以往60年总体上升的趋势。因此，过去的10年呈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正值公民抵抗成为挑战政权最常见的途径时，它却开始变得不那么奏效了——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发生了什么变化？

说到公民抵抗运动收效的下降，最有诱惑力的解释集中在它们当前所处环境的变化上。

首先，运动可能正在面对更为稳固的政权——这些政权通过巩固当地盟友和关键居民的支持、监禁杰出的反对者、刺激对手使用暴力、煽动对境外势力或帝国主义阴谋的恐惧，或者通过获取强大的国际支持者的外交掩护，而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事实证明，在面对来自底层的挑战时，白俄罗斯、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的政权表现得特别有韧性。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活动的人士面临着严峻的困难。然而，对运动的失败进行的这种事后解释也有不足为训之处。许多政权，比如苏丹的巴希

尔政府，在被非暴力抗争运动推翻之前一直被视为坚不可摧，然而在事后，观察者们却声称这些政权终究是薄弱的。但历史上，许多曾经稳定的专制政权，比如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埃里希·霍内克统治下的东德、侯赛因·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和共产主义波兰，都在标志着非暴力运动达到巅峰的诸种高超动员之后，最终屈服于非暴力运动。

其次，政府可能正在学习和适应来自底层的非暴力挑战。¹⁶几十年前，威权政权经常会被突如其来大规模非暴力起义所吓倒，苦于寻找能够镇压这些运动、同时又不会引发民众对被镇压者更加同情和支持的方法。精英阶层也可能低估了人民力量对其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潜力。今天，鉴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已有大量历史记录，国家行为者更有可能将这些运动视为真正的威胁。因此，威权政权已经发展出一套政治上老道的镇压方式。¹⁷其中一个突出的战略就是渗透到运动中，从内部制造分化。通过这种方式，当局可以趁非暴力运动尚未建立足够广泛的基础获得大众支持和持久力之前，挑动运动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更激烈极端的战术。

第三，随着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美国加速从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全球角色中撤退，同时也放缓了支持民主计划的步伐。尽管许多人批评这种计划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新帝国主义形式，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也发生了人权体系的扩张，那些体系产生了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监督机构，能够指出和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趋势可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为政治异见开辟了空间。¹⁸丹尼尔·里特尔（Daniel Ritter）提出，在后冷战时代，威权政权特别容易受到来自底层的非暴力挑战，因为它们需要维持对人权的表面尊重，以安抚他们的民主国家盟友和援助者。¹⁹例如，埃及对外国援助的依赖意味着，当2011年爆发革命时，埃及军方对来自美国

等自由民主国家的观察审查高度敏感。如果没有一个积极主动的美国，更广义地说，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能对威权政权施加影响或进行执法的强有力的人权倡导者，对非暴力异见者的残暴打压只会更加猖獗。

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它也夸大了美国在全世界真正捍卫民主和人权的程度。毕竟，美国在战后帮助扶植右翼独裁者的历史由来已久——当中包括伊朗的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国王、刚果的约瑟夫·蒙博托将军、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以及其他通过美国支持的政变上台的人。这种说法还高估了提供支援的民主国家对它们的威权盟友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实质影响力。从历史上看，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命运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确保民众参与，以及在安全部队和经济精英中争取倒戈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多变的外国政府的行为。²⁰

因此，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尽管各国可能在预测和镇压非暴力抗争上更上了一层楼，但这两个结构性的论点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多少依据。相反，对非暴力运动收效下降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运动自身性质的变化。

运动的变化

首先，在参与度方面，公民抵抗运动的规模平均来说，相较于过去有所缩小。的确，2010年后的几年里曾发生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2017年和2019年，委内瑞拉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示威。据报道，2019年10月在智利，反对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政府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一百万人参加。然而，尽管出现过公共场合万头攒动的戏剧性画面，但总体上说，近年来运动在高峰时期的声势，

实际上比不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的运动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非暴力运动平均能够动员所在国家约2%的人口。20世纪90年代，这个平均数字更高达2.7%。但自2010年以来，非暴力运动的平均峰值参与度仅为1.3%，延续了2000年代开始的下降趋势。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一场大规模抗议吸引的人口比例越大、人口横截面越多元化，它才越有可能成功。

其次，当代运动倾向于过度依赖大规模游行，而忽视了其他可以更有力地瓦解政权稳定的手段，如大罢工和大规模的公民抗命。由于大多数人将抗议示威与公民抵抗联系在一起，所以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在形成真正的持久力或转型战略之前，越来越倾向于发起这类行动。与其他方式相比，街头抗议可能更容易在短时间内组织或即兴而为。在数字时代，即使没有任何结构化的组织联盟来提前进行规划和协调沟通，这类行动也能吸引大量参与者。²¹但大规模游行并非总是向精英施压的最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游行无法长期持续的情况下。其他不合作手段，如大罢工和闭门不出，可以对经济生活造成更大的干扰，因此能够引起当局更迅速的让步。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幕后策划和组织，才能使运动可以长期有力动员，以及以有助于建立参与、影响力和力量的方式，来协调、安排战术行动的顺序。²²对于许多缺乏领导的当代运动来说，这样的能力可能难以发展出来。

第三个重要因素可能与运动过分强调公众示威和游行有关：近年来的运动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组织，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²³这种组织形式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一方面，数字化组织使当今的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大规模集结参与者。²⁴它使人们得以在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受众中广泛传播他们的不满。它为组织者提供了与大众沟通的、不受主流机构或政府控制的传播渠道。然而，由此产生的运动相对缺乏条件将其人数纳入到有效的组织中，

即能够制定计划、协商、确立共同目标、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维持其瓦解政权的能力的组织中。²⁵一些从数字化组织中产生的运动已经找到了创建长期组织的方法。但即便如此，它们最初对互联网的依赖也仍有其不利的一面：更便捷的沟通也意味着更容易被监视。当权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监视、筛选和打压异见者。独裁者不仅利用数字技术拉拢自己的支持者，还传播错误信息、宣传和反向信息。

这就带出了可能导致当代公民抵抗运动收效降低的第四个因素：非暴力运动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或容忍诉诸暴力的边缘群体。²⁶从1970年代到2010年，带有暴力倾向的非暴力运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到35%之间。而在2010年至2019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二分之一以上。

即使在绝大多数活动人士都坚持非暴力时，如果公民抵抗运动中夹杂着一些武装暴力，比如与警察街头斗殴或攻击那些反对抗议者的人，那么最终的成功率往往会低于坚守纪律、拒绝暴力的运动。²⁷这是因为暴力往往会加剧对运动参与者和同情者无差别镇压，同时使运动更难将参与者描绘成这种暴行的无辜受害者。稳固的政权会将小规模暴力冲突者描绘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事实上，政府往往会对运动进行渗透，挑动他们在边缘地带采取暴力行动，从而给政权使用强硬手段提供正当理由。当权者真正害怕的是有韧性的、非暴力的、大规模的反抗，因为这会暴露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其实是谎言，同时也消除了他们采取暴力镇压的任何借口。

将当代运动与其历史先例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几个清晰的教益。首先，与那些在制定政治纲领和战略之前就走上街头的运动相比，在大规模动员之前就进行精心策划、组织、培训和建立联盟的运动，更有可能吸引大量不

同的追随者。其次，规模和多样性不断扩大的运动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能够保持势头的情况下。第三，不完全依赖数字化组织技术的运动更有可能建立可持续的追随者。最后，那些为在压力下保持团结和纪律制定了战略的运动，比那些在这些问题上听之任之的运动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非暴力抗争有前途吗？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对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数十场公民抵抗运动构成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确实，在疫情流行开来的最初几个月，主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经常是在宣布抗议活动的终止。由于社交隔离法规的实施以及多个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大，抗议活动的结束成为常态。²⁸但正如美国因白人治安员杀害阿赫马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以及警察杀害布罗娜-泰勒（Breonna Taylor）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而引发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时代都不会终结。

不过，即使推动运动的原因仍然存在，全球各地的封城也为下一阶段民主和权利的长期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回顾、重组和规划的机会。事实上，鉴于近期运动的成功率有所下降，如果民众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种重组和评估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未来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人民力量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全球停摆期间如何投入时间和资源。

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希望。首先，支持民主和进步的活动分子们现在普遍采用的许多措施——诸如互助小组、罢工、闭门不出、病假、在线教学，

以及声援和集体支持一线工人的各种表达方式——都是运动格局中的积极转变。仅在美国，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湾区等城市，那里的互助网络就已经众筹了紧急救援资金、食品、个人防护设备及各种不时之需；协调了资金和重要物资的分配；提高了社区对疫情（和政府应对措施）给黑人和棕色社区带来的不平等影响的认识。在疫情期间，这些网络加强了沟通、基层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社区的信任和互利行为。随着反种族主义抗议的爆发，这些努力得到了提振。在政府对大规模抗议做出强硬回应后，许多互助网络立即动员向保释基金捐款，并提供其他形式的社区救济。

尽管这些措施很少能像大规模示威那样吸引眼球，但它们代表了战术创新的新阶段。通过这些努力，运动正在更新和刷新过时的游戏指南，因为旧的指南曾导致他们完全依赖于抗议，而忽略了诸如不合作和开发替代方案等方法。过去，从印度的独立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再到南非和美国的黑人解放组织，当这些运动发展出替代性机构，并以此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解决被政府忽视或忽略的社区问题时，它们就获得了公民的力量。甘地称之为“建设性方案”，并认为这是他称之为“真理之力”（Satyagraha）的非暴力抗争技术的两大支柱之一，与不合作同等重要。

过去，从印度的独立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再到南非和美国的黑人解放组织，当这些运动发展出替代性机构，并以此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解决被政府忽视或忽略的社区问题时，它们就获得了公民的力量。

当然，许多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要么公然与社交隔离措施对着干，要么是无视这些措施的存在。

这就更使得这些行动变得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人们愿意冒着健康风险来抵抗不义之事，这一事实提高了人们对其诉求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在另一些地方，人们正在尝试在社交距离下进行抗议，包括汽车车队、敲锅敲碗的抗议（cacerolazos），甚至就是社交隔离抗议，比如2020年4月在特拉维夫发生的、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1,200人抗议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从仓库员工到食品杂货店老板，再到急诊室的护士，重要岗位的工人利用歇业、请病假和罢工来争取更安全的工作条件，而且往往能够迫使雇主立即做出妥协，提供口罩、手套和危险工作津贴。在医疗、食品杂货、科技和肉类加工等行业，罢工和停工歇业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合作使这些工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为他们对维持食品供应、交通运输和公共卫生服务至关重要。对于政府来说，这一类岗位人员的罢工和停工是很棘手的，对其进行打压很难不引起公愤反弹，这就形成了政府的一个不堪一击的要害。

其次，新冠疫情可能为许多活动人士和组织者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整期，他们以往一直是一个游行接一个游行，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反思、制定战略或建立关系。在封城期间，运动得以从策划大型活动的工作中抽身出来，集中精力建立有韧性的联盟，以更大的能力实现持久的转变。世界各地的许多运动都利用这段时间制定长期战略、在潜在的联盟伙伴之间建立关系，并开发旨在发起更有效挑战的培训模块。诸如“地球日直播”（Earth Day Live）这样的活动——一个为期多日的气候正义在线行动——将数百个组织聚集在一起，分享技能、战略和灵感，共同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再比如像“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濒危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和“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这样的组织的网络研讨会，讨论在封城期间如何继续推动气候行动。在美国，争取种族正义、选民权利和气候行动的运动召开了技能分享和教育活动，帮助人们了解疫情对边缘社区（包括非裔美国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这些活

动有助于唤起公众对紧迫的不平等现象的认识，为更大规模和更持久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

最后，疫情的流行让公众看到在应对危机时，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截至2020年6月撰写本文时，据报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美国、俄罗斯、巴西和英国——均是由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领导人掌舵，他们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是灾难性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没有为公众做好长期隔离的准备，没有广泛提供检测和及时准确的信息来控制疫情，而是否认或尽量淡化疫情，引用阴谋论来推卸责任，并煽动国内政治分歧——例如号召支持者对抗主张从严实施公共卫生的市长和州长，或将国家危机归咎于为种族正义而战的抗议者。

这些失误及其致命后果可能具有长期的隐患，但它们也会使公众更加意识到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提醒选民：危机处理不当会影响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面对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无能，面对公民权利受到的威胁、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及经济不安全，许多运动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框架，将焦点放在呼唤真正的民主更新上。在巴西，由于蔑视全球公共卫生建议，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他正面临着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危机。在尼加拉瓜，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领导层的失败同样为支持民主的活动家提供了推动变革的新动力。

2020年2月份，香港的医护人员举行罢工，抗议政府不肯关闭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边境以阻止病毒传播，这与早些时候抵制中国侵犯香港独立的行为如出一辙。这次罢工迫使政府关闭了三个边境检查站之外的所有边境口岸，

展示了基层工作者不合作的力量。5月底，成千上万的香港抗议者不顾居家令走上街头，抵制北京推动新的国家安全法案，因该法将进一步加强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争取气候正义的运动也调整了自己的框架，以反映人们日益担忧的问题，即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未来疫情流行可能导致气候变化上的不作为。在美国，仍在进行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抗议警察暴力的活动，也与美国非裔死于冠状病毒的比例远高于白人有关——这只是持续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之一。由于疫情已经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这些信息现在可能比危机前更能引起广泛共鸣。因此，尽管最近全球范围内的非暴力抗议活动遭受了挫折，但2020年并不代表成功的非暴力抗争的终结。相反，疫情的大流行行为世界各地的运动提供了一个急需的重启机会，并且许多运动已经明智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作者说明：感谢姜受延（Sooyeon Kang）和克里斯托夫·谢伊（Christopher Wiley Shay）为数据收集做出的贡献，感谢哥伦比亚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和哈佛大学学术研讨会参与者提供的有益反馈。我还要感谢左伊·马克斯（Zoe Marks）对本文初稿的评论以及E.J. 格拉夫（E.J. Graff）提供的编辑协助。文中如有谬误均属于我个人）

注释.....

- 1 艾瑞卡·切诺维斯等：《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波非暴力运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Erica Chenoweth et al., “This May Be the Largest Wave of Nonviolent Mass Movements in World History. What Comes Next?” *Washington Post*, Monkey Cage blog, 16 November 2019).
- 2 这一统计结合了《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及结果数据项目》（*Nonviolent and Violent Campaigns and Outcomes Data Project*）（v.1.3）和《主要冲突事件数据集》（*Major Episodes of Contention Data Set*）的数据。在同一时期，还有成千上万的运动在追求其他目标，如妇女权利、劳工权利、同性恋和 LGBTI 权利、环境正义、经济正义、企业责任、和平以及各种政策变革。本文提供的统计数据主要集中在最大化运动上。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运动更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有

- 限的大规模运动子集，其数据广泛可得。
- 3 大约 40% 的非暴力运动也涉及暴力成份，我将在本文后面进行讨论。
 - 4 艾瑞卡·切诺维思：《非暴力抗争为什么有增无减？》（Erica Chenoweth, “Why is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Rise?” *Diplomatic Courier*, 28 June, 2016).
 - 5 同上。
 - 6 斯蒂芬·平克：《我们内心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在减少》（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2011）。
 - 7 更多详情和其他一些假设，请参阅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编著的《恢复非暴力的历史：解放斗争中的公民抵抗》（Maciej Bartkowski, ed. *Recovering Nonviolent History: Civil Resistance in Liberation Struggl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13）。
 - 8 赛琳娜加略-克鲁兹：《境外的非暴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地方非暴力动员》（Selina Gallo-Cruz, “Nonviolence Beyo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NGOs and Local Nonviole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34. November 2019: 655–74）。
 - 9 参阅自由之家的《2020 年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House’s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0 report*,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20/leaderless-struggle-democracy>）。
 - 10 乔纳森·C. 平克尼：《从异议到民主：公民抵抗转型的承诺与危险》（Jonathan C. Pinkney, *From Dissent to Democracy: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ivil Resistance Trans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马库斯·贝尔、菲里斯 S. 柏斯克及丹尼尔·蓝巴克：《非暴力抗争的民主红利》（Markus Bayer, Felix S. Bethke, and Daniel Lambach, “The Democratic Dividend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 November 2016: 758–71）；艾瑞卡·切诺维思及玛丽亚 J. 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毛利西奥·里维拉·塞莱斯缇诺及克里斯蒂安·斯克莱德·格莱蒂兹：《是新鲜的康乃馨，还是没有玫瑰只有刺？非暴力运动与独裁政权的过渡》（Mauricio Rivera Celestino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Fresh Carnations or All Thorn, No Rose? Nonviolent Campaigns and Transitions in Autocrac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May 2013: 385–400）。
 - 11 对成功的这一定义存在争议，尽管就实际目的而言，它是用于比较不同案例的最可靠的定义。一些研究还关注长期的成功，如民主的扩张、权利和稳定。
 - 12 朱迪斯斯托达德：《主要的暴力和非暴力反对运动如何影响出生时的预期寿命？》（Judith Stoddard, “How Do Major, Violent and Nonviolent Opposition Campaigns, Impact Predicted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2, no. 2, 2013）。
 - 13 布瑞安·马丁：《正义之火：反弹的机理》（Brian Martin, *Justice Ignited: The Dynamics of Backfir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莱斯特 R. 阔特兹及李 A. 史密斯埃编著：《压制与非暴力运动的悖论》（Lester R. Kurtz and Lee A.

- Smithy, eds. , *The Paradox of Repression and Nonviolent Movement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4 切诺维斯及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第三章（Chenoweth and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Chapter 3）.
- 15 切诺维斯及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Chenoweth and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 16 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及国家的应对的趋势：对民众运动采取的暴力是否愈演愈烈？》（Erica Chenoweth, “Trends in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State Response: Is Violence Toward Civilian-Based Movements on the Rise?”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9. January 2017: 86–100）.
- 17 艾瑞卡·切诺维斯：《特朗普政府采用的反革命工具包》（Erica Chenowe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doption of the Anti-Revolutionary Toolkit,”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51. January 2018: 19–20）；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及国家的应对趋势》（Erica Chenoweth, “Trends in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State Response: Is Violence Toward Civilian-Based Movements on the Rise?”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9. January 2017）.
- 18 凯瑟琳·辛金克：《希望的明证：使人权在 21 世纪发挥作用》（Kathryn Sikkink, *Evidence for Hope: Making Human Rights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9 丹尼尔·瑞特尔：《自由主义的铁笼：中东和北非的国际政治与非武装革命》（Daniel P. Ritter, *The Iron Cage of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Unarmed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0 切诺维斯及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Chenoweth and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 21 泽伊内普·图费克奇：《推特与催泪瓦斯：网络抗议的力量与脆弱性》（Zeynep Tufekci, *Twitter and Tear Gas: The Power and Fragility of Networked Prot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2 切诺维斯等：《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Chenoweth et al., “This May Be the Largest Wave.”）
- 23 琳达·赫尔莱拉：《社交媒体时代的革命：埃及人民的起义与互联网》（Linda Herrera,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The Egyptian Popular Insurrection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Verso, 2014）.
- 24 图费克奇：《推特与催泪瓦斯》（Tufekci, *Twitter and Tear Gas*）.
- 25 阿塞夫·巴亚特：《没有革命家的革命：理解阿拉伯之春》（Asef Bayat, *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Making Sense of the Arab Spr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乔治·劳森：《对革命的解剖》（George Lawson, *Anatomies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6 另见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兴起》(Erica Chenoweth,“The Ris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PRIO Policy Brief* 19, 2016);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为什么有增无减?》(Chenoweth,“Why Is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Rise?”)
- 27 奥马尔瓦索:《议程播种:1960年代黑人抗议活动如何影响精英、舆论和投票》(Omar Wasow,“Agenda Seeding: How 1960s Black Protests Moved Elites, Public Opinion, and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forthcoming));艾瑞卡·切诺维斯及库尔特斯科特:《同时期的武装挑战会否影响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结果?》(Erica Chenoweth and Kurt Schock,“Do Contemporaneous Armed Challenges Affect the Outcomes of Mass Nonviolent Campaign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 December 2015: 427–51).
- 28 伊凡格斯特曼:《新冠疫情危机如何威胁全球的自由与民主》(Evan Gerstmann,“How the COVID-19 Crisis is Threaten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ross the Globe” *Forbes*, 12 April 2020, www.forbes.com/sites/evanger-stmann/2020/04/12/how-the-covid-19-crisis-is-threatening-freedom-and-democracy-across-the-globe/#6dec63234f16).

制度设计

理查德·W·苏德里埃特
安德鲁·埃利斯文
徐行健 译
王天成 审校

理查德·W·苏德里埃特 (Richard W. Soudriette) 写作本文时系斯德哥尔摩的“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总裁

安德鲁·埃利斯 (Andrew Ellis) 是“国际民主和选举协助研究所”选举流程团队的负责人

译者徐行健为中国大陆专业人士

审校者王天成, 《中国民主季刊》
主编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 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 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当今的选举制度： 全球一览

编按：本文原载于美国《民主季刊》2006年第二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7, Number 2, April 2006, pp. 78-88)。它概述了当今世界选举制度的类型与分布，讨论了选举制度变化的趋势及新生民主国家设计选举制度的一些注意事项。

如今，投票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政治变革工具。1974年，只有39个选举民主国家——即定期举行多党制全国选举的国家。到2006年，至少有120个国家可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选举民主国家。

设计选举制度是建设可持续民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步骤。在考虑选举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与特点。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另一个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另一个时期，未必行之有效。那些有时没有经过辩论就继承了殖民统治者的选举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未能采用最能满足其需求的选举制度。

选举不是民主进程中可以孤立考虑的一个环节。选举制度的有效运作与政党体系、宪法发展、有关立法机构的规定以及其他制度框架问题相联系。任何制度的成功还需要人民自己自由地接受其合法性。世界各地实行的制度多种多样，要理清每种制度的优缺点并非易事。《选举制度设计：新国际民主和选举协助研究所手册》¹，就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世界选举制度指南，在下文中，我们将自由地选用其中的内容。

选举制度的世界

正如下文表1所示，用于选择国家立法机构的选举制度多种多样。半个多

世纪以来，莫里斯·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安德鲁·雷诺兹(Andrew Reynolds)和本杰明·赖利(Benjamin Reilly)等著名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选举制度及其对民主的影响这一问题。根据他们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选举制度分为四大类。

相对多数/绝对多数(Plurality/Majority)。候选人根据相对多数票或绝对多数票选出，通常在单议员选区(立法机构中只有一名代表)。此类别有五种主要类型：领先者当选(First Past the Post, FPTP)、两轮投票制(Two-Round System, TRS)、多选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AV)、全额连记制(Block Vote, BV)和政党连记投票(Party-Block Vote, PBV)。最广泛使用的是“领先者当选制”(FPTP)，其次是“两轮投票制”(TRS)。几乎所有通过直接普选产生总统的国家，都采用“领先者当选制”或“两轮投票制”来实现这一目的。然而，用于选举国家立法机构的制度，差异要大得多。

在单议席选区实行的“领先者当选”(FPTP)制度中，获胜者是获得票数多于其他任何人的候选人，即使票数少于绝对多数票。“两轮投票制”(TRS)，顾名思义，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赢得一定比例的选票，通常是绝对多数(50%+1票)，则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根据两轮投票制(TRS)的类型，第一轮投票中领先的两名或两名以上候选人可参加第二轮投票；如果允许两名以上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则获胜者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使得票少于绝对多数。

通常在单议员选区实行的多选投票制(AV)是一种“优先”投票制，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候选人进行排序。获得绝对多数第一优先票的候选人赢得

席位；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的第一优先，那么获得最少第一优先的候选人将被淘汰，他们的选票将在剩余候选人中重新分配，直到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

多议席选区(在立法机构中有一个以上的代表)采用的全额连记制(BV)，给选举人的票数与该选区需要填补的席位数相同，总票数最高的候选人获胜。在也用于多议席选区的政党连记投票制度(PBV)中，选举人投票选举政党名单而非个人，得票最多的政党赢得所有席位。这两种制度可被视为“超多数制”(hypermajoritarian)，因为它们倾向于将选票上的微小优势转化为席位上的较大优势。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制。美国与英国及其许多前殖民地(包括印度和加拿大)一样，长期以来一直采用领先者当选制。另一方面，法国和许多历史上受法国影响的国家则采用两轮投票制。澳大利亚、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多选投票制(AV)。BV制在全球11个国家或地区使用，主要是在政党力量薄弱的较小实体中。喀麦隆、乍得、吉布提和新加坡采用PBV制。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比例代表制”的主要目标是，将政党获得的选票份额转化为立法机构中相应比例的席位。它只用于多议席选区。比例代表制制度主要有两种类型：“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 PR)和“可转移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STV)。在世界范围内，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 PR)比可转移单票制(STV)更为普遍。

在“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 PR)下，各政党的席位分配以政党名单的得票数为

基础，投票箱中的得票率大致相当于立法席位的相同百分比。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 PR)有不同的实施方式。在“封闭名单”(closed-list)制中，选民只能投票给政党名单，不能对个体候选人表达任何偏好。在“开放名单”(open-list)制中，选民可以对政党名单中的候选人表达偏好，而在“自由名单”(free-list)制中，选民甚至可以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名单之外的候选人表达偏好。

在可转移单票制下，选民对候选人进行排名。获胜所需的得票额度(quota of votes)已确定，任何获得至少该数量选票的候选人都会立即赢得席位。然后，最不成功的候选人将被淘汰，他们的选票将被重新分配。成功候选人超过额度的选票也将重新分配。重新分配一直持续到剩余席位被填补为止。

表 1——独立国家的选举制度

国家	国家立法机构	总统	国家	国家立法机构	总统
阿富汗	其他 (SNTV)	TRS	赤道几内亚	PR (List)	FPTP
阿尔巴尼亚	混合 (MMP)	—	厄立特里亚	T	T
阿尔及利亚	比例 (List)	TRS	爱沙尼亚	比例 (List)	—
安道尔	混合 (PS)	—	埃塞俄比亚	相/绝 (FPTP)	—
安哥拉	比例 (List)	TRS	斐济	相/绝 (AV)	—
安提瓜和巴布达	相/绝 (FPTP)	—	芬兰	比例 (List)	TRS
阿根廷	比例 (List)	TRS	法国	相/绝 (TRS)	TRS
亚美尼亚	混合 (PS)	TRS	加蓬	相/绝 (TRS)	TRS
澳大利亚	相/绝 (AV)	—	冈比亚	相/绝 (FPTP)	TRS
奥地利	比例 (List)	TRS	格鲁吉亚	混合 (PS)	TRS
阿塞拜疆	混合 (PS)	TRS	德国	混合 (MMP)	—
巴哈马	相/绝 (FPTP)	—	加纳	相/绝 (FPTP)	TRS
巴林	相/绝 (TRS)	—	希腊	比例 (List)	—
孟加拉国	相/绝 (FPTP)	—	格林纳达	相/绝 (FPTP)	—
巴巴多斯	相/绝 (FPTP)	—	危地马拉	比例 (List)	TRS
白俄罗斯	相/绝 (TRS)	TRS	几内亚	混合 (PS)	TRS
比利时	比例 (List)	—	几内亚比绍	比例 (List)	TRS
伯利兹	相/绝 (FPTP)	—	圭亚那	比例 (List)	FPTP
贝宁	比例 (List)	TRS	海地	相/绝 (TRS)	TRS
不丹	无	—	洪都拉斯	比例 (List)	FPTP
玻利维亚	混合 (MMP)	TRS	匈牙利	混合 (MMP)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比例 (List)	FPTP	冰岛	比例 (List)	FPTP

国家	国家立法机构	总统	国家	国家立法机构	总统
博茨瓦纳	相/绝 (FPTP)	—	印度	相/绝 (FPTP)	—
巴西	比例 (List)	TRS	印度尼西亚	比例 (List)	TRS
文莱	无	—	伊朗	相/绝 (TRS)	TRS
保加利亚	比例 (List)	TRS	伊拉克	比例 (List)	—
布基纳法索	比例 (List)	TRS	爱尔兰	比例 (STV)	AV
缅甸	相/绝 (FPTP)	—	以色列	比例 (List)	—
布隆迪	比例 (List)	—	意大利	混合 (MMP)	—
柬埔寨	比例 (List)	—	牙买加	相/绝 (FPTP)	—
喀麦隆	相/绝 & 比例	FPTP	日本	混合 (PS)	—
加拿大	相/绝 (FPTP)	—	约旦	其他 (SNTV)	—
佛得角	比例 (List)	TRS	哈萨克斯坦	混合 (PS)	TRS
中非共和国	相/绝 (TRS)	TRS	肯尼亚	相/绝 (FPTP)	TRS
乍得	相/绝 & 比例	TRS	基里巴斯	相/绝 (TRS)	FPTP
智利	比例 (List)	TRS	科威特	相/绝 (BV)	—
中国	无	—	吉尔吉斯斯坦	相/绝 (TRS)	TRS
哥伦比亚	比例 (List)	TRS	老挝	相/绝 (BV)	—
科摩罗	相/绝 (TRS)	FPTP	拉脱维亚	比例 (List)	—
刚果(布拉柴维尔)	相/绝 (TRS)	FPTP	黎巴嫩	相/绝 (BV)	—
刚果(金沙萨)	T	T	莱索托	混合 (MMP)	—
哥斯达黎加	比例 (List)	TRS	利比里亚	相/绝 (FPTP)	TRS
科特迪瓦	相/绝	TRS	利比亚	N	—
克罗地亚	比例 (List)	TRS	列支敦士登	比例 (List)	—
古巴	相/绝 (TRS)	—	立陶宛	混合 (PS)	TRS
塞浦路斯	比例 (List)	TRS	卢森堡	比例 (List)	—
捷克共和国	比例 (List)	—	马其顿	比例 (List)	TRS
丹麦	比例 (List)	—	马达加斯加	相/绝 & 比例	TRS
吉布提	相/绝 (PBV)	TRS	马拉维	相/绝 (FPTP)	FPTP
多米尼克	相/绝 (FPTP)	—	马来西亚	相/绝 (FPTP)	—
多米尼加共和国	比例 (List)	TRS	马尔代夫	相/绝 (BV)	—
东帝汶	混合 (PS)	TRS	马里	相/绝 (TRS)	TRS
厄瓜多尔	比例 (List)	TRS	马耳他	比例 (STV)	—
埃及	相/绝 (TRS)	—	马绍尔群岛	相/绝	—
萨尔瓦多	比例 (List)	TRS	毛里塔尼亚	相/绝 (TRS)	TRS
毛里求斯	相/绝 (BV)	—	瑞典	比例 (List)	—
墨西哥	混合 (MMP)	FPTP	瑞士	比例 (List)	—
密克罗尼西亚	相/绝 (FPTP)	—	叙利亚	相/绝 (BV)	—
摩尔多瓦	比例 (List)	—	台湾	混合 (PS)	FPTP
摩纳哥	混合 (PS)	—	塔吉克斯坦	混合 (PS)	TRS
蒙古	相/绝 (TRS)	TRS	坦桑尼亚	相/绝 (FPTP)	TRS
摩洛哥	比例 (List)	—	泰国	混合 (PS)	—
莫桑比克	比例 (List)	TRS	多哥	相/绝 (TRS)	TRS
纳米比亚	比例 (List)	TRS	汤加	相/绝 (BV)	—
瑙鲁	其他 (MBC)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相/绝 (FPTP)	—
尼泊尔	相/绝 (FPTP)	—	突尼斯	混合 (PS)	FPTP
荷兰	比例 (List)	—	土耳其	比例 (List)	—
新西兰	混合 (MMP)	—	土库曼斯坦	相/绝 (TRS)	TRS

国家	国家立法机构	总统	国家	国家立法机构	总统
尼加拉瓜	比例 (List)	TRS	图瓦卢	相/绝 (BV)	—
尼日尔	相/绝 & 比例	TRS	乌干达	相/绝 (FPTP)	TRS
尼日利亚	相/绝 (FPTP)	TRS	乌克兰	混合 (PS)	TRS
朝鲜	相/绝 (TRS)	—	阿联酋	无	—
挪威	比例 (List)	—	英国	相/绝 (FPTP)	—
阿曼	相/绝 (FPTP)	—	美国	相/绝 (FPTP)	FPTP
巴基斯坦	混合 (PS)	—	乌拉圭	比例 (List)	TRS
帕劳	相/绝 (FPTP)	TRS	乌兹别克斯坦	相/绝 (TRS)	TRS
巴拿马	相/绝 & 比例	FPTP	瓦努阿图	其他 (SNTV)	—
巴布亚新几内亚	相/绝 (AV)	—	委内瑞拉	混合 (MMP)	FPTP
巴拉圭	比例 (List)	FPTP	越南	相/绝 (TRS)	—
秘鲁	比例 (List)	TRS	也门	相/绝 (FPTP)	TRS
菲律宾	混合 (PS)	FPTP	赞比亚	相/绝 (FPTP)	FPTP
波兰	比例 (List)	TRS	津巴布韦	相/绝 (FPTP)	TRS
葡萄牙	比例 (List)	TRS			
卡塔尔	无	—	P/M—Plurality/Majority, 相/绝(相对多数/绝对多数)		
罗马尼亚	比例 (List)	TRS	FPTP—First Past the Post, 领先者当选		
俄罗斯	Mixed (PS)	TRS	TRS—Two Round System, 两轮投票制		
卢旺达	比例 (List)	FPTP	AV—Alternative Vote, 选择投票制		
圣基茨和尼维斯	相/绝 (FPTP)	—	BV—Block Vote, 全额连记制		
圣卢西亚	相/绝 (FPTP)	—	PBV—Party Block Vote, 政党连记投票		
圣文森特	相/绝 (FPTP)	—	SV—Supplementary Vote,		
萨摩亚	相/绝	—			
圣马力诺	比例 (List)	—	PR—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比例代表制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比例 (List)	TRS	List—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名单比例代表制		
沙特阿拉伯	N	—	STV—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可转移单票制		
塞内加尔	混合 (PS)	TRS	Mixed混合制		
塞尔维亚和黑山	转变中	转变中	PS—Parallel System, 并立制		
塞舌尔	混合 (PS)	TRS	MMP—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联立制		
塞拉利昂	比例 (List)	TRS			
新加坡	相/绝	FPTP	Other 其他		
斯洛伐克	比例 (List)	TRS	SNTV—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不可转移单票制		
斯洛文尼亚	比例 (List)	TRS			
所罗门群岛	相/绝 (FPTP)	—	LV—Limited Vote 有限投票制		
索马里	转变中	转变中			
南非	比例 (List)	—	MBC—Modified Borda Count 改良波达计数法		
韩国	混合 (PS)	FPTP			
西班牙	比例 (List)	—			
斯里兰卡	比例 (List)	SV	N—无, 没有关于直接选举的规定		
苏丹	相/绝 (FPTP)	TRS	T—转变中国家(新的选举制度在公布时尚未决定)		
苏里南	比例 (List)	—			
斯威士兰	相/绝 (FPTP)	—	该表是《选举制度设计: 新国际民主和选举协助研究所手册》(2005)中一个内容更广泛的表格的修改版。		

广泛应用于西欧、拉美和非洲的“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 PR)，被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超过了其他任何选举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采用“领先者当选”制的人口数几乎是“名单比例代表制”的两倍(43.5%的人生活在有直选的国家，而23.9%的人生活在没有直选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和美国这样的大国采用了“领先者当选”制。“可转移单票制”(STV)虽然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但只有爱尔兰共和国和马耳他在国家层面上使用。

混合制(Mixed)。在混合制下，有两组当选成员：一组根据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制选举产生，另一组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两组成员的选举可以联系起来产生相对比例的结果(联立制，MMP)，也可以相互独立(并立制，Parallel System, PS)。

最初在二战后的德国发展的“联立制”，目前也被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匈牙利、意大利、莱索托、墨西哥、新西兰和委内瑞拉所采用。“并立制”在全球21个国家使用，包括俄罗斯联邦和日本。

其他制度。其他一些制度，如“不可转移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减额投票制”(Limited Vote, LV)和“波达计数法”(Borda Count, BC)²，并不能完全归入上述任何一类。在将选票转化为席位方面，这些制度的效果往往介于“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之间。2005年，阿富汗在议会选举中采用了不可转移单票制(SNTV)，尽管这一制度备受批评。西班牙采用减额投票制(LV)制来选举上议院，而只有瑙鲁采用波达计数法(BC)制。

表2——选举制度的变化(1993—2004)

旧制度	新制度				
	相对多数 / 绝对多数 (Plurality/Majority)	比例代表制 (PR)	混合制 (Mixed)	其他选举制度	总计 (旧制度)
相对多数 / 绝对多数 (Plurality/Majority)	百慕大 斐济 蒙古 蒙特塞拉特 巴布亚新几内亚	伊拉克 摩尔多瓦 卢旺达 塞拉利昂 南非	莱索托 摩纳哥 新西兰 菲律宾 俄罗斯 泰国 乌克兰	阿富汗 约旦	19
比例代表制 (PR)	马达加斯加		玻利维亚 意大利 委内瑞拉		4
混合制 (Mixed)		克罗地亚 马其顿	墨西哥		3
其他选举制度			日本		1
总计 (新制度)	6	7	12	2	27

选举制度变化的趋势

“国际民主和选举协助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DEA)的《选举制度设计手册》，绘制了1993至2004年间总共213个国家和地区的变化，发现了27种选举制度类型的变化(这27种中不包括吉尔吉斯斯坦，该国做出了改变，然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制度)。上面的表2对此进行了总结。

这些数据显示了从“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制”向“比例代表制”转变的趋势。最常见的变化是从“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制”转向“混合制”(7个国家)。

表2低估了世界各地选举制度安排的变化程度。除了13%的国家和地区改变了其制度类型外，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其现有制度内做出了改变——

例如，改变每个选区选出的议员人数，引入或改变政党或候选人获得代表权必须达到的最低票数水平，或者在基于政党名单的制度中引入或限制选民在候选人之间的选择。虽然这些变化在性质上看起来是技术性的，但它们可以对谁当选从而对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出现代表性的重大危机时，制度类型本身才会发生变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2002年议会选举中超过一半的获胜者得票率不到20%，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这些当选者合法性的质疑。随后在2003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从“领先者当选制”（FPTP）制改为“多选投票制”（AV），也就并不令人意外。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危机也可能发生。在新西兰连续两届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却发现自己成了反对党；最终，经过1990年代的两次全民公投，新西兰的选举制度从“领先者当选制”改为“联立制”。在意大利和日本，普遍的腐败丑闻导致人们对整个政治体系失去信心，也导致了选举制度的改变；意大利于1993年从“名单比例代表制”改为“联立制”，日本于1994年从“不可转移单票制”转为“并立制”。

制度变革也会发生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当转型是和平的、国内推动的，有时会发生变革；而当转型是在暴力冲突之后由国际推动的，则几乎总会发生制度变革。伊拉克就是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君主制时期使用的“两轮投票制”议会选举制度，也充当萨达姆·侯赛因时代虚假选举的框架，在2004年被“名单比例代表制”取代——这一变革由联合国提议并被伊拉克临时政府采纳。³

在拉丁美洲，转向“联立制”的趋势日益明显，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墨

西哥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苏联解体后，前苏联集团的许多国家，如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转向了“名单比例代表制”。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则引入了“混合制”，即至少一半的议会席位通过“领先者当选制”(FPTP)选举产生，其余席位通过“比例代表制”(PR)选出。

如何解释这种转向更大比例性的总体趋势？在需要真正反映种族、经济或社会多样性的国家，或者为了确保不仅是支持者众多的政党在民选议会中有代表、相对较小的群体也要有代表，“比例代表制”可能特别有价值。一般来说，在比例选举制下，会有更多的妇女和少数民族被选入立法机构。

许多选择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的欧洲国家，包括北欧国家和荷兰，都发展出了强大的民主政体。1922年，爱尔兰共和国采用了“可转移单票制”(STV)，对于爱尔兰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起了促进作用。

在(选举制度)转向更大比例性的总体趋势中，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尤其是阿富汗，它与这一趋势相反。根据定义，比例性要求有可识别、能按比例分配代表的政党或团体才能进行比例代表。在阿富汗，由于担心与军阀有关联的政治团体参选，再加上政党概念的负面含义(共产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导致总统选举以无党派方式进行。所有总统候选人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两轮制”选举。2005年，在249名成员组成的人民院(Wolesi Jirga，阿富汗立法机构中直接选举产生的下院)议会选举的筹备阶段，为决定采用哪种选举制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终，选择了“不可转移单票制”(SNTV)。新当选的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致力于维持政治体系中

的非党派性。249个席位中的68个是为女性保留的。不允许有任何政党，所有候选人均以独立身份参选。⁴

彻底改变一种选举制度，是很难实现的。大多数国家的选举制度由普通法律管理，因此可以在立法机构内对选举制度进行修改。然而，一些国家以某种方式将选举制度的细节纳入宪法，而宪法通常比普通法律更难修改。尽管如此，无论选举制度是由宪法还是普通法律控制，要改变选举制度都需要精英的政治意愿，而政治精英通常不会认真考虑对选举制度进行重大改变，除非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

即使相关的政治行为者认识到选举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但在选择最佳选举制度以取代旧制度时也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在墨西哥，1994年建立的“并立制”导致了该国“混合制”选举有史以来最比例失调的结果(该制度后来再次改为“联立制”)。此外，由于选举制度非常复杂，因此很难评估选举制度变革的长期效益。

选举制度变革的影响

实施新的选举制度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选择选举制度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其对选举管理的影响。在特定国家的选举制度下，如何实际开展选举？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举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考虑实施哪种选举制度以及如何在一个国家有效管理这一制度时，必须考虑许多因素。五个关键因素是：1)选区划分；2)选民教育；3)选举设备的现代化；4)选票和计票；5)长期可持续性。

1)选区划分。划定选区边界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政治任务：所有选区分界都会产生政治赢家和输家。在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制中，选区设计的任务尤其具有挑战性、艰巨微妙。许多采用领先者当选制(FPTP)的国家，如加拿大和英国，都需要定期调整单一议员选区的边界。如果这项工作必须在每次议会选举之前完成，那么这个过程既昂贵又耗时。如果不那么定期，则可能导致选区规模的巨大差异。例如，在美国，国会选区的边界由50个州的立法机构根据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定。这些选区边界的划定一直是一个不稳定且政治敏感的问题。

任何划定选区边界的过程，如果要被选举参与者认为是公平的，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协商。这就意味着，在民主转型期间几乎不可能确定新的选区，因为这种时候的政治势头和转型的兴奋感会产生几乎不可抗拒的压力，迫使选举快速进行。此外，几乎所有参与新体制框架谈判的政治参与者都知道，越晚做出的让步越有价值；因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用于划定选区的时间——以及用于组织选举的其他方面的时间——都将被蚕食。

2)选民教育。在新生民主国家，立法者并不总是能很好地理解“选民”这一概念。同时，选民可能也不完全理解他们选举立法者是为了代表他们和他们的社区。在阿富汗等文盲率较高的国家，如果不开展充分的选民和公民教育工作，这些概念就尤其难以传达。在识字率较低的国家，如果选择较为复杂的制度，试图解释投票方法可能会具有挑战性。

3)选举设备的现代化。随着投票设备现代化的国际趋势日益明显，选举制度的选择也是一个会对选举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在印度，电子投票机的引入帮助选举取得了成功。印度目前的议员选举领先者当选制(FPTP)，使

印度选举委员会有可能开发出一套非常有效且成本低的电子系统；而在其他一些选举制度下，开发一套成功的电子投票系统要困难得多。

2004年，爱尔兰共和国选举管理机构斥资数百万美元，为议会选举引入了新的电子投票系统。然而，爱尔兰采用的是“可转移单票制”(STV)，这种制度要求选民在选票上表达一系列对候选人的偏好。由于担心电子投票系统对选民不够方便，爱尔兰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使用这一系统。这样，爱尔兰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恢复了传统的纸质选票。

4) 选票和计票。 尽管选举管理者只能在宪法和选举法的限制内开展工作，但组织对选民方便的选举，至关重要。投票设备的易用性和投票程序的简便性，有助于提高选民心目中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并为未来奠定积极的基础。斐济就是一个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例子。立法机构的选票允许选民在选票的一个部分投票给某一政党(并让他们的选票根据该政党提交的偏好转给其他候选人)，或在第二个部分投票给单个候选人。如果选民选择投票给个体候选人，则必须对选票上至少四分之三的候选人表达偏好、排序。迄今为止，在这个制度下举行的前两次选举中，超过10%的选票无效。

在伊拉克2005年12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共有996个政党和政治实体参选，候选人总数达7655人。选民们面对的是床单大小的巨大选票，在做出最终选择和投票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由于选票上的政治实体数量众多，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IECI)不得不购买专门设计的投票箱，来容纳这些超大选票。计票过程缓慢而繁琐。结果，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计算完所有选票、公布最终结果。选举制度的设计增强了包容性，但在方便投票和及时计票方面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例子

很好地说明了，选举制度的理想品质有时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选举制度的设计最终涉及一系列选择：设计者必须选择哪些理想品质是价值最高的，哪些是次要的。

5)长期可持续性。需要考虑选举程序的长期可持续性，尤其是相对复杂的选举制度。当首次民主选举是由国际性过渡机构来组织，或得到大量国际技术援助和资金时，几乎任何事情都会顺利。而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选举中，当外部资源不再那么免费流入时，组织一个可持续的选举进程，就取决于国家预算内可用的财政资源和国家的人力资源——这两种资源都可能是有限的，并受制于其他紧急需求。转型中选举制度设计若过于简单，可能会忽略一些对政权建构有潜在积极意义的方式，但是从长期来看，过于复杂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承认选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选举制度提供了一个框架，保障人民有权对如何自我治理发表意见。一个国家在选择选举制度时，需要考虑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并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以提高选民接受选举合法性的可能性。选择选举制度的标准可以包括：建立稳定高效的政府；促进立法机构有效的反对和监督机制的发展；支持对政府和当选议员个人的问责；发展有活力的政党；以及为缓解冲突提供激励。与加强公民社会和鼓励新闻自由等其他设计目标一起，选举制度的选择对于奠定民主文化的基础至关重要。

设计不周的选举制度会削弱民众对民主治理的支持，而设计良好的选举制度则有助于确立鼓励民众参与的制度，确保民主的长期成功。正如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曾说过的：“政府可以更迭，但人民

永存。当我们建立有效且自由的选举制度时，我们所崇敬的是人民力量的庄严。”

注释

- 1 安德鲁·雷诺兹、和本杰明·赖利和安德鲁·艾丽丝，《选举制度设计：新国际民主和选举协助研究所手册》（Andrew Reynolds, Ben Reilly and Andrew Ellis,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The New International IDEA Handbook* (Stockholm: IDEA, 2005) , 可在 www.idea.int 在线获取。
- 2 在波达计数法投票制度下，投票人按喜好排列候选者，如果候选者在选票上排第一位，它就得某个分数；排第二位得一个较小的分数……如此类推。总分最高的候选者取胜。
- 3 有关伊拉克选举制度变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美国《民主季刊》本期第 89-103 页阿迪·达维沙（Adeed Dawisha）和戴雅门（Larry Diamond）撰写的文章。
- 4 有关阿富汗“不可转移单票制”（SNTV）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安德鲁雷诺兹（Andrew Reynolds）在美国《民主季刊》本期第 104-117 页上的文章。

读书

夏明

作者夏明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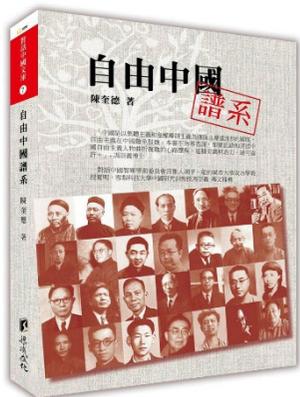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从思想到制度： 陈奎德《自由中 国谱系》

题记：“而受难之后，复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自由民主体制遇到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的挫折。不仅世界总体民主国家的数量从2016年的97个下降到2021年的89个，而且据“自由之家”2023“世界自由”报告，全球自由指数在过去17年连续下降。全球自由民主的挫折，在第三世界表现在频繁的内战和军事政变上，在欧美发达国家表现在民主治理质量下降、政治狂人和极端主义大行其道。人类自由民主的倒退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头份额：占有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是二战以后仅有的从未举行过全国大选的四个国家之一，这个世界史上最庞大的极权主义政权还自诩为“全过程的民主”，并且还要在全球推广中国模式，甚至暗中破坏和公开挑战成熟的民主政体。在中共高科技极权主义喧嚣尘上的大背景下，陈奎德推出了体现其学术辉煌的专著《自由中国谱系》。这是十年磨一剑的佳作，凝聚的不仅是学术智慧和政治远见，还有个人勇气和道德坚守。



在《自由中国谱系》尚未面世前，我已经有幸得近水楼台之利，通读了该书的清样。我的推荐语也收入出版的书中。一年多以后，我再次仔细阅读了纸版成书，不仅有了新的体悟，手握20万字、400多页，更感觉到本书的厚重。好书值得反复咀嚼回味。在社交媒体快餐阅读的时代，我这个全职读书人再花上半个星期复读陈奎德的著作，感觉到的还是新奇和深邃。四十多年前，在复旦大学欧风美雨席卷燕园的时代，我就成了陈奎德的追

星族的一员。那是一个人性复苏、个性张扬、自由叩门的激动人心时代。我十六岁时负笈东游，经历1980年代初校园里由哲学系毕业研究生举办的“告别演说”，它成为中国最自由时代最自由开放的大学里的最自由的事件，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核爆炸。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带有点淡淡四川乡音的人，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第一位西洋哲学博士陈奎德。在未来的学术苦旅、浮浮漂游的人生中，我们走得更近。他的《海耶克》评述20世纪经济学自由主义大师，帮助我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煮酒论英雄》提出“自我放逐”蕴藏的“隔离的智慧和效应”也引导了我的人生选择，远离各种测试人性弱点的诱惑。我们一起主编《自由荆冠》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让我人生受益，从学兄言谈举止中看到为学之道。得了佳品，不忍独乐，所以在此分享细读《自由中国谱系》的收益。

开宗明义，作者界定：“本书所讲的自由主义，取其广义，即经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繁衍发煌而逐渐弥漫全球的政治思想主流。本书所谓自由中国谱系，指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脉络。自由主义之进入中国，仅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1949年国运丕变，该思潮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几近泯灭。直至1976年毛泽东驾崩，方重新冒芽出土，蜿蜒潜行。”从内容上讲，作者梳理、凸显的是有别于近现代史上主宰国运的国共两党的第三势力——自由民主派，它也曾组建过“中国民主党”、“民盟”等组织。从时间段上，作者选择的是中国在近代与西方文明发生直接全面碰撞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从发生学来讲，作者明确了自由主义的外来（西方）思想根源。因为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谱系，作者以近代、现代、当代时间线为主轴，完成28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串珠。

对于还在专制黑暗中奋斗的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于试图为中国寻找自由民

主路径的华人来说，跟随作者学习、回顾、反思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史，不仅可以找回本土自由思想的接纳、转换、再造和升华，帮助人们避免重造轮子的低层次循环，更可以驳斥中共以举国之力打造的中国特色论、中国独特主义等种种谬论。最重要的是，作者的终极目标是要唤醒、培育中国人的自由意识，催生、设计自由中国的民主宪政体系，那么，一个自由的中国首先会在思想观念上诞生，而后理想成为现实。这一历史逻辑演绎已经在中华民国台湾结出正果。作者在论述几位自由主义大师时，例如胡适、张君勱、傅斯年、梁实秋、徐复观、殷海光、雷震、张佛泉等，自然讨论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他们辗转来台，为台湾的的民主化立下汗马功劳，为世界华人保留了自由民主的火种。明白作者的苦衷，不由想起泰戈尔在《飞鸟集》描写的花与果实的对话：“果实啊，你离我有多远？”果实回答：“就藏在你心里。”对于不断追问“自由民主，你离中国有多远？”的人们，作者给予了泰戈尔式的回答：自由中国蕴藏于渴望自由的人心中。

当然，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思想层面的启蒙，他也在讨论自由思想的传播演变中，不断检审和总结自由主义运动的洪流，展示了中国人为民主自由不惜舍身取义的悲壮行动。例如，书中写到“百日维新”失败后，“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菜市口，不成功则成仁。清末立宪请愿运动，学生牛广生、赵振清各在腿臂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宋教仁抵制袁世凯篡权、捍卫责任内阁制被刺身亡。面对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兴兵发动“护国战争”。书中又提到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诸如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和陈寅恪等，在中共统治下遭遇悲惨，却能坚守“士不可以不弘毅”的风骨。最为可歌可泣的是，在中共所谓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林昭、遇罗克，面对排山倒海的红色专政，不畏强权，在人生风华正茂之

际，被中共政权处决，成为“自由殉道者”。进入21世纪，中共暴政暂时有所收敛，但书中描述的最后五位自由主义代言人（李慎之、杨小凯、王小波、陈子明和刘晓波）无一不被中共政权在思想上判处死刑。他们的肉身之死，也多多少少和他们遭受的牢狱之灾及各种迫害分不开。

这个在人类追自由、争人权的曲折漫长历史上都可谓铁骨铮铮的群芳谱，一昭示了中国人并非人类共同体中不谙尊严的另类，国情论、生态环境论、低素质论都站不住脚；二显示了中国本土、本土文化与人类主流文明对话、沟通、交融的天然冲动；三证明了“自由鸽”也是“不死鸟”，“中国自由主义顺理成章也继承了屡仆屡起的‘不死鸟’特征”。这本书和本书作者本身，也让我们清晰地听到了当下的自由中国谱系的强劲脉动。

在书中讨论的自由主义高原上，作为读者，我观察到了几个特征：

第一，清朝末期自由主义在中国滥觞，自由思想的“盗火者”严复和知行合一的宪政倡导者梁启超耸入云霄，建立两座丰碑。在民国时期，无论从思想还是政治架构来观察，胡适和张君勱把自由宪政推向高峰。作者给了胡适多个定位：“自由主义的旗帜”、“反集权的中流砥柱”，最重要的是，作者把胡适奉为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简言之，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建设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胡适精神的普遍化。”对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勱，作者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从长程眼光看，平心而论，当代中国，第三势力的复兴已成触目事实，其生命力正在开始焕发光彩，中国政治运行的轨迹正在向张君勱的理念靠近。它令人不由不客观公正地说，张君勱先生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难以找到可以与之并列的高峰。但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推出了“中国的圣女”林昭。

她是本书中唯一被单列出的女性，这不仅显示她在共产党统治下对强权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留给当下的重要意义，而且作者对女性将在未来自由中国的争取和运作过程中的重要性给予期盼。

第二，在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作者以威权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来界定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意无意之间把国共两党分放在右-左的对比，而这又牵扯到执政党和反叛党、在野党的区别，使得“第三势力”的定位变得复杂困难。作者也明确意识到，中国的自由派内部也可以继续分成三大流派：“从外缘影响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体上有三条基本支系，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拉斯基、杜威和罗素等观念影响的、赋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另一条则是上世纪后期受海耶克等影响的、赋右翼色彩的自由主义，第三条则是受罗尔斯影响的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

在西方自由主义最简明的讨论中，启蒙运动成为轴心，洛克、卢梭和康德成为三巨匠。尽管三人都以个人主义的自由为原点，洛克强调财产权，卢梭偏重平等，康德则看重个人作为能动体的自治。如果再把历史长城延申，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道德法则，也可以是一种财产/财富/生产的经济哲学；和民主共和联系在一起，它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宪政反映。我们不难从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文明、《圣经》文化和教会团契中找到源流。把自由主义仅仅放置在任何一个文明点、或者归于任何一条完整的线性历史长河，都会伤害自由主义的精髓：整合多元差异性的普世价值。

以此观察，作者做了极大的努力囊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派重要人物，但在落笔着墨的细微处。可以感到作者的自由主义讨论，如果以英国的费边/工党社会主义、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民主党自由主义为一

端，以海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共和党的里根经济学/自由至上论（自由意志主义）为光谱的另外一端，作者的心理天平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这些原因，尤其是对“国家主义”的过度恐惧，作者在强力批判共产主义学说/运动/政权时毫不留情（从当下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回溯，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但当国民党也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还是几十年的执政党（在1949年前大陆和台湾）时，所谓亲共的左翼民主党派，受到了更多的贬抑。不难理解，鲁迅在书中多处论及，但并未给予一席之地。如果中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在不遗余力，甚至用政治食人主义的绞肉机来清除党内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人道主义和自由化，那我们对中共体制内部是否有立宪主义的“清流”也该探讨。至少，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被囚禁的黄昏岁月拥抱了“议会民主制”和“反对党的合法性”。也因为相似的原由，作者落笔之处，让我隐隐感到左翼民主党派因为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的不信任选择滞留大陆，成为了“责怪被牺牲者”的某种托词，这是中共内心乐于看到的。

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歧义？我以为，如果我们把国共都放在党国军三位一体的执政党和反叛党（未来的执政党）的光谱上，在这光谱之下存在左右两翼自由主义，后者都是没有武装力量、也不主张暴力革命的第三力量、第四力量，这样的四元、嵌入相交的博弈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思考大陆自由主义、民主建设的挫折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最文明、最进步、最平和的力量都成为国共两大政党势不两立、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牺牲品。正是秀才遇到兵，讲理的输给了弄枪的，数人头的选举体制未能建立，砍人头的党国天下大行其道（只是在台湾到了蒋经国开禁后就已寿终正寝）。

第三，自由中国谱系上悲剧连连、白骨累累，国共两党针尖对麦芒在同构

体中互相激化，教训在哪里？陈奎德的著作也给我们许多启发。掩卷思考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似乎看到了三个甲子的循环往复：鸦片战争到清朝立宪失败，民国建立到1960年代大陆/台湾的红色/白色恐怖，1980年代开启复兴期。在第三个我们还在经历的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台湾和大陆彻底分道扬镳，台湾修得自由民主正果，大陆求得极权专制。为何有这种中华文化基因无法解释的差异？陈奎德在书中区分了威权主义和共产极权主义，也论述了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思考为什么从1989年的天安门到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再到2020年围绕川普主义全球两岸五地（大陆、台湾/香港、北美、欧洲、澳洲）华人的大分裂，都可以看到不宽容的、狂热主义的幽灵。在如何做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平衡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而在使用何种手段达成平衡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温和、渐进、妥协的“你活我也活”的政治对应暴力、激进、斗争的“你死我活”的政治，也是民主自由主义对应毛主义/施密特主义。不幸的是，在前面两个甲子中，中国传统、激进和自由三种势力都没有摆脱狂热主义的同构陷阱。在大陆中国人经历的最近三轮传统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纠缠中，不仅三方无法建构出一个共赢的新政治、新天地，而且相互还在加剧对“敌手”的厮杀和完成自己的自杀。

最能斩断这种三角死结的非自由民主派系莫属。在中道政治的大框架下，中偏左的和中偏右的自由主义两翼如何能在我说到的四元、相互嵌入的政治博弈中找到战略智慧，相互守望，和而不同，磨合竞争，才能在动态中守护“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两大目标，并通过政治多元竞争、政党轮替来调试平衡两端，避免激进暴力革命性的颠覆。这是当下中国自由

主义者/民主人权人士必须在意识上和行动上都有待提升的。挖掘自由中国思想和运动史上的遗产，我们后人应当汗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我们还没有长出可以与前两个甲子并驾齐驱的高原和山峰。尤其让我不安的是，在政治学、法学、政治哲学三门自由主义的原生地，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大师级人物。这当然有中共的国家罪错使然，比如过去二十年我们看到的自由殉道者英年早逝；但当下中国民主自由的落寞，也挑战着自由民主运动的努力和智慧。

总体而言，《自由中国谱系》是本世纪华人思想界的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一位融贯东西方学问、文言现代汉语都斐然成章的政治哲学家的必传之作。在书中，作者为我们刻画分析了数位实现了“三立”（立功、立言、立德）或“四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由主义大师。我深信，坐言起行的陈奎德博士的著作也有此功效。如果这部著作不是由他来写，如果这部自由主义的谱系能够采纳尼采“为生命书写历史”而不是“死亡的历史”，我想本书作者、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胡平、改革开放第一政治学家严家祺等我们熟知的当代思想家都会被大书特书，把自由中国的谱系延展和光大下去。

在前言中，作者“祝愿读者诸君”能想象和贴近自由先驱们的心灵，“展开一场跨越两个世纪的精神对话，再续慧流”。站在巨人的肩头，读者诸君（包括我自己）可以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有与自由主义对接的思想基础，比如，除去孟子的民本思想，老子的无为、小政府大社会、阴阳平衡互补、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是否可以与西方自由主义对接；读者也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思想大师并放置在自由中国谱系的圣人祠里，比如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自由思想和民主建设成就就值得发扬光大；读者还可以以自由运动和民主宪法构建为主轴，书写浩浩荡荡的民主化潮流；民主运动

领袖和积极分子更可以总结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开天辟地，打通“思想自由的中国”进入“制度自由的中国”的路径。

当代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深度贫穷可能减弱民主化的动力，高速增长的经济成长也会减弱民主化的压力。然而，经过一段持续高速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会把这个国家送入民主化的门槛。而突发的经济停滞或危机（也就是J曲线带来的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强化）会极大提高民主化的机率。中国正站在民主化的门槛上。作者写下的书中最后一句话是：“而受难之后，复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而那个复活的日子，就是自由中国从思想空间降临到华夏大地。

自由民主尚未成功，中国儿女仍需努力。在我们经历的第三个甲子60年，我们力争能为自己和我们的后人建立一个自由中国。

商
榷

海山

本文作者海山（笔名）为中国大陆学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国家主义还是党国主义

题记：专制国家是不可能出现国家主义的。

在《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3期笔谈）中，荣剑说：“新左理论庞杂宏大，在‘三观’上与欧美左翼有许多交集，汪晖在欧洲多次获大奖，是欧洲左翼对其理论认可的证明。但欧洲左翼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国家主义的支持，其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表述已经转化为反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立场，中国新左派已经完全背离了欧洲左翼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堕落为国家主义的附庸**”。¹

我认为，荣剑没有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大陆中国实行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党国主义。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党国主义”的支持，堕落为“党国主义”的附庸。

我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宪政民主国家和党国专制国家为例，通过事实分析证明我的观点。

主导国家者决定国家性质

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首要看“谁”在主导国家。主导国家者决定国家性质。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主权在君主，君主主导国家，掌握着国家

最高权力。他（她）的意志就是法律。

中国自秦朝始即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

宪政民主国家

宪政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国民主导国家，拥有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参与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信仰、言论、出版等自由。

美国、英国及西欧国家皆是宪政民主国家。

党国专制国家

党国专制国家，主权在党，执政党主导国家，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党国一体化，党政一体化，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执政。

大陆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和老挝皆是党国专制国家。

从暴力到能力

人类的历史是从暴力到能力的进化史，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史。

领地特性是动物重要特性之一。为了生存繁衍，动物必须拥有领地，常常用暴力占有和保卫领地。

早期人类具有动物的领地特性。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熟悉罗马帝国的领土征战史，但是对于中国从商、周、秦直到明、清，历代王朝“打天下，坐江山”还是比较熟悉的。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君主通过暴力占有土地，成为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垄断了国家最高权力。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君主用暴力占领领土，用暴力统治臣民。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自此，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由于国民利益诉求不同，英国国民组建了具有不同政治纲领的政党。各政党向国民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展示自己的公共服务能力，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权力。

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制定和通过了美国宪法，美国成为宪政民主国家。代表国民不同利益诉求的政党，向国民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展示自己的公共服务能力，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权力。

自此，英国和美国完成了从暴力到能力的进化，从“动物”到人的进化。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灭亡。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法令，释放政治犯；修改刑法、民法和诉讼程序；宣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撤销出版事务委员会，取消书报检查等。临时政府准备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决定国家管理的形式和宪法，将俄罗斯建设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党国专制国家。苏共垄断了国家权力，以党代国。国家军队成为苏共党军，用于镇压国民的反抗。苏共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建立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国民的思想。“十月政变”致使俄国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被终止。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与党国专制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用暴力夺取和维护国家统治权力。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君主即是国家，实行君主主义。党国专制国家，执政党即是国家，实行党国主义。

宪政民主国家与党国专制国家不同处在于：宪政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允许不同利益诉求的国民组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实行多党制。党国专制国家主权在党，为了维护执政党利益，实行一党制。

宪政民主国家可能出现国家主义

1910年8月，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新国家主义，主张联邦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保护劳工权利、保护自然资源等。美国是宪政民主国家，允许不同的主义存在。

民国初年，共和党政纲宣称“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²中国青年党的宗旨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³

荣剑曾指出：“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实现五族共和，国家取代了朝廷成为新的权力机构，同时也成为高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在许多人看来，民族复兴取决于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孙中山与康有为代表着民国初期的两种对立的建国路线，前者的‘三民主义’规划，主张从民族革命转向实现民权的政治革命，必须经历‘军政’时期，而‘军政’的实质是依靠国家暴力统一全国的军令和政令，然后再向‘训政’和‘宪政’过渡。后者鉴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状态，主张‘救中国为最要之图，则国重而民轻，先于为国而后于为民矣，重于为国而轻于为民矣’。两者在民国的政治转型时期实际上都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⁴

中华民国国民可以主张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等等。

专制国家不可能出现国家主义

专制国家是不可能出现国家主义的，以中国为例。

梁启超说过，“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利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⁵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君主就是国家。历朝历代，朝廷乃皇族的

私产，没有臣民之公产——国家也。

中共建政后，实行一党制，集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力于一身，建立了党国不分，党政一体的党国专制国家。对于当下的中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党国耳”！党国也者，共党之私产也。没有国民之公产——国家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国专制国家

无论毛泽东执政时期，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还是习近平独裁统治时期，中共是国家主人，国民是中共之臣民。

1954年，在大陆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⁶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⁷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⁸

习近平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⁹

2018年，新华网发文《让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了中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党国专制国家，政府是党政府，军队是党军队，经济是党经济，文化是党文化，实行党国主义。

中国新左派口中是什么主义

荣剑讲：“在中国新左派参与的国家主义的多声部大合唱中，参与者从他们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背景出发，唱出了同一个主题：国家决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是各民族的主宰。……强世功的‘施米特主义’论、‘党国意志就是国家意志’论，汪晖的‘超级政党’论、‘党国合一’论，潘维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执政集团”论……，等等”。¹⁰

强世功的“党国意志就是国家意志”论，是地地道道的“党国主义”腔调。汪晖的“党国合一”论则更是赤裸裸的“党国主义”论！潘维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执政集团”论则丝毫不掩饰，他是“党国主义”的附庸！毫无疑问，中国新左派大合唱中的所谓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党国主义”！

行文至此，可以明确，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党国主义”的支持，堕落于“党国主义”的附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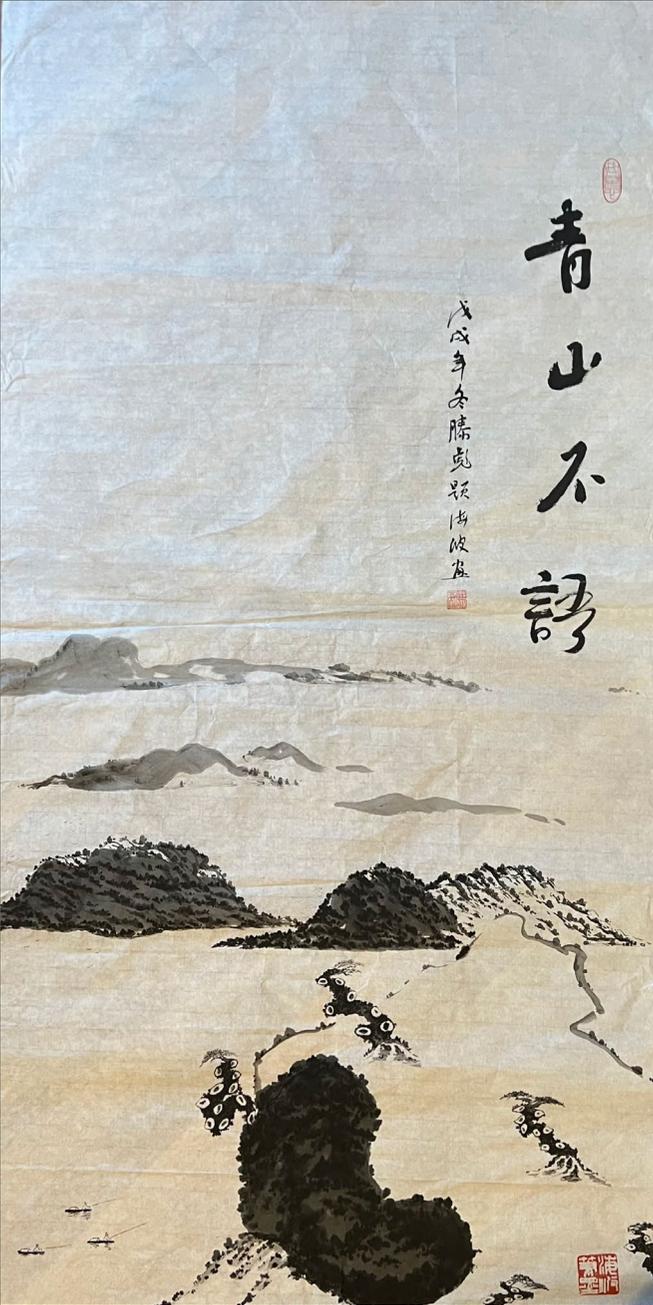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利益；党国主义主张执政党至上，个人利益完全服从执政党利益，两者不可混同。

注释.....

- 1 荣剑：《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中国新左派的政治归宿》，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2023年 <https://chinademocrats.org/?p=1604>。
- 2 杨德洲：《民初政党的离合》，辛亥革命网2010年。
- 3 曾琦：《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代国共两党而起之新革命党》，中华文库1929年。
- 4 荣剑：《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中国新左派的政治归宿》，见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https://chinademocrats.org/?p=1604>。
- 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古诗文网 https://m.gushici.com/t_18781。
- 6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见参考网 <https://m.fx361.com/news/2022/1223/13353831.html>。
- 7 罗平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由来与发展》，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0/1113/c85037-31929488.html>。
- 8 倪德刚：《邓小平晚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论断》，见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719-30920962.html>。
- 9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人民网-人民日报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ivk_sa=1024609w&wd=&eqid=8610aa00000269990000004642e7453。
- 10 荣剑：《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中国新左派的政治归宿》，见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https://chinademocrats.org/?p=1604>。

青山不語

戊戌年冬滕彪景海跋



简
记

祢正平

作者祢正平为中国留美学生、青年社会运动行动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全球民主 人权事件

1. 以色列遭恐袭与加沙人道危机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名为“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3,000枚弹道火箭弹，同时约2,500名武装分子突袭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地区，并在犹太屯垦区实施屠杀平民和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政府声称，至少1,400名以色列人和外国公民在10月7日的袭击中遇害，200名以色列平民和战俘被劫持作为人质。

这次突袭促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Netanyahu)政府启动了“铁剑行动”(Operation Swords of Iron)。以色列国防军空袭了声称有哈马斯占据的设施，并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北部发布撤离警告，给予当地居民24小时时间迁移到南部。10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对北加沙进行了大规模地面进攻。哈马斯任命的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的攻势已在加沙造成近22,000人死亡。

11月22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决定“休战”4天，释放哈马斯关押在加沙的50名人质和被以色列监禁的大约150名巴勒斯坦女性和青年囚犯。

巴以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10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立即停火，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袭击。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12月29日，南非向联合国所设国际法院提告，指控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是种族灭绝性的，要求下令停火。

自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几十个国家先后爆发了支持巴以双方的示威，不同立场的示威者对峙。其中仅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就已超过700场，且大多集中于美国、欧洲等政府支持以色列的北约国家。

2. 伊朗人权活动家获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奖

10月6日，正在狱中的伊朗人权活动家纳尔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她在伊朗女性权益斗争中的杰出贡献。12月10日，她的子女出席了颁奖典礼。她也成为继刘晓波之后，又一位因为身陷牢狱而无法亲自领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穆罕默迪自大学起，就关注女性权利运动。她经历过13次逮捕、5次定罪，总计判刑31年。2022年9月，她报道了伊朗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违反强制戴头巾的法律被捕并遭警方虐待致死的情况。2023年5月，她因此获得了联合国新闻自由奖。在颁奖典礼前夕，穆罕默迪的胞弟和丈夫透露她正在埃文监狱绝食抗议，声援被囚禁的巴哈伊教徒少数派。

同月19日，已去世伊朗库尔德女青年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和“妇女、生命、自由”运动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阿米尼的家人因被伊朗政府禁止离境而无法代为领奖。

欧洲议会主席罗伯塔·梅索拉(Roberta Metsola)表示，阿米尼的去世标志着

一个转折点，引发了一场由女性领导的历史性运动，代表着伊朗的尊严和自由。

3. 上海万圣节中的行为艺术

10月30日前后，上海的年轻人自发在街头参与万圣节狂欢活动。狂欢者们通过各种别具创意的装扮，将这个西方的传统转化为表达政治不满和社会观点的独特平台。

各种各样的传统装扮如邪恶的巫师、电视名人、不死生物等在庆祝活动中应运而生。一些狂欢者在装扮中融入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讽刺与批评。有人以忍饥挨饿的医学院学生、电商从业者等形象，将就业困难和行业问题搬上了舞台，反映其对经济低迷的忧虑。有人身贴一张不断下跌的股票指数海报，手拿韭菜，比喻“被压榨”的投资散户。

有人穿着防护服，拿着大号的棉签；有位女性穿着全身贴着白纸的衬衫，暗示了中国三年新冠清零政策和去年的反封控运动。也有人打扮成一个摄像头，嘲讽中国的大规模监控政策。有人扮成花圈，和一个打扮成“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的路牌站在一起，让人联想到近日去世的前国家总理李克强。另有一人装扮成电影《霸王别姬》中主角程蝶衣在文革中被批斗的造型。

这些行为艺术触及到中国人平日几乎不可能谈及的公共话题，让万圣节成为一个展示公共议题的平台。警方派出了大量警力在街头维持秩序，并封闭了巨鹿路附近的地铁站，但并未大规模抓捕参与者。

4. 阿根廷、荷兰大选，右翼领导人胜出

11月19日，自称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以压倒性的55.7%的选票赢得了阿根廷总统选举，创下了自1983年该国恢复民主以来总统候选人所获最高选票百分比的纪录。

米莱的胜选标志着阿根廷政治明显向右转。他提出了包括削减政府规模、实施货币美元化和废除中央银行等措施。他还支持保守的社会政策，反对学校性教育和堕胎。米莱对中国和巴西的批评，以及加强与美国联系的政策，为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变革增添了一层不确定性。

在前任政府任内，阿根廷通货膨胀超过140%，贫困加剧，使得民众产生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和对变革的渴望，这加强了米莱的吸引力。

11月25日，荷兰自由党(PVV)在议会选举中赢得戏剧性胜利，拿下了37个议席，成为议会内第一大党，创下25年来最大胜利。PVV以反伊斯兰和民粹主义立场而著称。

该党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内政上，主张限制移民、对抗住房危机和改善健保服务，以吸引选民的关注。他强调PVV为普罗大众发声，但他的言论引发了穆斯林和移民社群的担忧。在外交方面，维尔德斯与西方主流路线相悖，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维尔德斯的胜利也引发人们对欧洲政治风向的担忧，尤其是他倡导荷兰脱欧的立场可能对欧盟领导层构成挑战。

5. 香港警方悬赏海外活动人士

12月14日，香港警方悬赏100万港元，以获取5名亲民主活动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2019年被拘留的前英国领事馆雇员郑文杰(Simon Cheng)，及许颖婷(Frances Hui)、邵岚(Joey Siu)、霍嘉志(Fok Ka-chi)和蔡明达(Choi Ming-da)。他们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面临“煽动分裂”和“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

这一行动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谴责，引发了对香港自治权严重侵蚀和全球活动人士安全的担忧。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谴责了香港警方的举动，称其为“对我们民主和基本人权的威胁”。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威胁、骚扰或伤害英国境内的个人或社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我们拒绝这种威胁和骚扰那些倡导自由和民主的行为。”

2023年早些时候，香港当局也对另外8名活动人士发布了类似的悬赏通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6.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竞选资格

12月1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票数裁定，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排除在该州共和党初选的候选人名单之外。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利用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款取消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支持裁定的法官认为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被冲击的暴乱中及之

前煽动叛乱，从而触发了第3条款。该条款禁止参与反对宪法的叛乱的人担任公职，因此特朗普不适合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首席大法官布赖恩·D·博特赖特(Brian D. Boatright)提出异议，认为宪法问题过于复杂，不适合由州法庭解决。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表示将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推迟了裁决的执行时间，直到2024年1月4日或美国最高法院就此案发表裁决才会生效。1月5日是科罗拉多州印刷总统初选选票的截止日期。

科罗拉多案件特殊之处在于原告首次使用第3条款取消候选人资格。11月，地方法官萨拉·B·华莱士(Sarah B. Wallace)裁定特朗普确实通过煽动2021年1月6日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参与了叛乱”。然而，她裁决应保留特朗普的竞选资格。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不仅涉及特朗普的参选资格，而且还涉及对第3条款本身的解释，为未来涉及该宪法规定的案件设定先例。

7. 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强制同化藏族儿童

12月14日，欧洲议会以477票赞成、14票反对和45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藏地公立寄宿学校中的文化灭绝与种族迫害行为。

决议谴责中国当局强行从藏人家中带走年幼的儿童，要求他们去到公立寄宿学校学习，致使他们与家人分离。这些公立寄宿学校所有课程几乎全部

用普通话授课，并禁止学生学习或讨论藏文化、历史或宗教。

决议呼吁立即废除这些寄宿学校，并倡导建立私立藏人学校。决议还呼吁欧洲各国的立法者效仿美国，在与中国当局进行每一场政治和人权对话中提及藏地寄宿学校问题，并对与寄宿学校有关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强调采纳和执行欧洲议会建议的重要性，其它国家采取类似政策可以对中国政府产生实质性影响。

尽管该决议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宣传官员仁增曲珍(Rigzin Choedon Genkhang)对该决议表示欢迎，并对欧洲议会的及时行动表示赞赏。她表示，该决议聚焦于中国对藏地人民基本权利的持续和严重侵犯，包括儿童权利。

8. 以色列最高法院推翻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

2024年1月1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司法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这一司法改革方案被广泛认为破坏了以色列民主和法治，去年元月公布后触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

在周一的裁决中，最高法院15名大法官中有8名法官投了赞成票，以微弱优势推翻了7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阻止法官推翻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府决定。法官们认为，该法“对以色列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核心特征造成了严重和前所未有的伤害”。

大法官们还以12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表明，最高法院有权推翻所谓的“基本法”。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基本法被认为是以色列宪法的主要立法。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强硬派盟友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称“右派的和左派的士兵在冒着生命危险在 frontline 作战的时候，最高法院公布这一裁决令人遗憾”，“最高法院的决定与人民的愿望尤其是在战争阶段团结一致的愿望背道而驰。”

遠念山河山日滿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主季刊》（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旨在为中文读者提供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新观点、新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民主转型的深入探讨。它注重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敬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美欧、澳洲等广泛地域范围以及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学、历史等专业背景不同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欢迎就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赐稿——

1. 关于中国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问题的研究讨论；
2. 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可能前景、路径、风险、战略等问题的研究讨论；
3. 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经验、教训的研究或介绍；
4. 关于民主理论、宪法设计与民主建构的研究或介绍；
5. 关于民族与国家性问题的研究讨论；
6. 新书与重要著作的推荐、评论。

投稿要求如下：

1. 稿件应为汉语。也欢迎用藏语、维吾尔语投稿，我们将协助译成汉语发表。来稿请标明篇名、关键词、摘要（不超过 200 字）、作者姓名及简介、联系方式。
2. 国内作者：由于是学术刊物，鼓励国内作者用实名，但出于安全考虑，国内作者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用笔名。
3. 稿件字数：论文，以 5000-8000 字为最适宜，建议不超过 10000 字；更长的文章可以考虑分期发表。书评，建议在 2000-3000 字之间。译作，建议在 4000—10000 字之间。
4. 来稿须符合写作规范要求，详细注释体例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上：<https://chinademocrats.org/?p=24>。
5. 投稿邮箱：cjd@chinademocrats.org。您也可以通过此邮箱向我们提出选题策划、建议意见、咨询或者合作方案。
6. 《中国民主季刊》拟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中出版，截稿日期分别为每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9 月 1 日与 12 月 1 日。
7. 稿件刊发后将按字数支付稿酬。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How to Subscribe to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民主季刊》是电子出版物，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免费下载，也可以提供您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们免费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您。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ha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from our website, or you can provide your email address and we will send it to you periodically by email free of charge.

我们也印刷少量纸质版，以满足个人、机构、图书馆收藏需要。纸质版每期价格为 38 美元。

In addition, we print a small number of paper cop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Paper copies are available for \$38 per issue.

下载电子版：请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

To download an electronic copy: Please visi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bsite at <https://chinademocrats.org/>.

订阅电子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或将您的电子邮箱发送至 cjd@chinademocrats.org。

To subscribe to the electronic edi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or send your email address to cjd@chinademocrats.org.

订购纸质版：请电邮 cclassics1994@gmail.com 联系代理商 China Classics Inc.。

To order paper copies: Please contact our agent China Classics Inc. by email atclassics1994@gmail.com, or by phone at 858 229 9677.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回顾历史，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每一次重要努力，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实现民主宪政，为此而探索、写作，以及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责任。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BN 979-8-9875925-0-2



9 798987 592502